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王甜甜 译

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全世界投入使用的核电站已经有441座。
目前还有32座新核电站正在筹建中！
人类已经遭遇过7次巨大的核灾难！
为了彻底杜绝核灾难的肆虐，请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面临的危险！

凤凰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王甜甜 译

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全世界投入使用的核电站已经有441座。
目前还有32座新核电站正在筹建中！
人类已经遭遇过7次巨大的核灾难！
为了彻底杜绝核灾难的肆虐，请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面临的危险！

凤凰出版社

请支持正版

书名：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作者：[白俄罗斯]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译者：王甜甜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ISBN：978-7-5506-0924-2

更新记录：
V1.0(2015.10.11)，制作完成。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历史记录

白俄罗斯境内并没有任何核电站。苏联国土境内仍在运作的核电站中，距离白俄罗斯最近的几座都是由苏联设计的老式石墨减速沸水式核电站。白俄罗斯以北是伊格纳林斯克核电站，以东是斯摩棱斯克核电站，以南则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4月26日，深夜1点23分58秒，一系列的爆炸摧毁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中的反应器。切尔诺贝利事故也最终成为了20世纪破坏力最大的一次技术灾难。

对于面积狭小的白俄罗斯（全国人口总数：1000万）而言，这简直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摧毁了619座白俄罗斯城镇，数以万计的白俄罗斯人惨遭屠杀。几十年后，切尔诺贝利事故使这个国家失去了485座村镇，其中有70座村镇被永远地埋在了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今天，每五名白俄罗斯人当中就有一人仍然生活在受辐射污染的土地上。按照其全国人口数量折算，生活在受污染地区的白俄罗斯人数高达210万，而这其中还有70万是儿童。在所有导致白俄罗斯人口数量下降的诸多因素当中，辐射污染高居榜首。在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最严重的戈梅利和莫吉廖夫地区，当地人口死亡率比新生儿的出生率高出了20个百分点。

5000万居里的放射性核素被释放到了空气之中，其中有70%降落到了白俄罗斯的土地上，从而导致了白俄罗斯23%的国土面积受到了浓度超过1居里／平方千米的放射性核素铯-137的污染。乌克兰受污染的国土面积达到了4.8%，俄罗斯为0.5%。因为这次事故受到污染且污染浓度超过l居里／平方千米的可耕种土地面积超过了1800万公顷，2400公顷的可耕种土地被永久废弃，再也无法从事任何农业生产。白俄罗斯是森林之国，但是其境内26%的林地和靠近普里皮亚季河、德涅波河以及索日河的很大一部分湿地都被认为已经受到了核辐射的污染。由于长期受到小剂量核辐射的侵害，白俄罗斯人当中罹患癌症、智力迟缓、神经紊乱及基因变异疾病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百科全书》）

1986年4月29日，波兰、德国、奥地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仪器监测到了空气中的辐射浓度异常。4月30日，瑞士和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发现了高浓度的放射性微粒。5月1日、2日，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及希腊北部发现辐射。5月3日，以色列、科威特和土耳其检测到辐射异常……在流动的空气的帮助下，放射性物质很快就完成了它们的环球旅行：5月2日，它们抵达日本，5月5日到达印度，5月5日、6日，它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登陆。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切尔诺贝利事故就从一个国家的问题演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

——《切尔诺贝利事故对白俄罗斯的影响》
国际国立生态萨哈罗夫大学，放射生态学
明斯克

在4号反应堆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石棺”——由铅和金属制成的内核中仍然存放着20吨核燃料。谁也不知道石棺内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石棺设计独特，建造精良，来自圣彼得堡的工程师们也许应该为自己的这一杰作感到骄傲。但是，它是在无人操作的条件下建造完成的，人们借助机器人和直升机的帮助，将厚重的钢板拼接在一起，所以迄今为止，钢板衔接处留有不少缝隙。根据某些数据显示，现在，这座石棺上的空塌和裂缝面积已经超过了200平方米，而放射粒子仍然在源源不断地从石棺中泄漏出来……

石棺会坍塌吗？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至今为止，人们仍然无法到达石棺的关键结构及许多连接处，从而无法得知它是否坚固如初。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假如石棺坍塌，其后果一定比1986年的那次事故更加可怕。

——《精神》杂志，1996年4月，第17期

序：一个孤独的声音

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M.马马尔达什维利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死亡、爱？或者，这二者之间本无区别？我到底该说哪一个呢？

当时，我们新婚燕尔。即便是去商店，我们也会手牵着手一同前往。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可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有多深。我不知道……我们住在他工作的消防站的宿舍楼里。我们家在二楼。住在同一层楼的还有其他三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消防卡车就停在我们楼下。红色的消防车。他是一名消防员。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一直都了如指掌——我很清楚他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

一天晚上，我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下床走到窗边，向外面望去。他看到了我："关上窗户，回床上去睡觉。反应堆着火了。我很快就回来。"

我并没有看到爆炸，我只看到了火苗。一切都在发光发热，包括天空在内。汹涌的火苗夹带着黑色的浓烟直冲云霄。空气中袭来令人窒息的热浪，令人感觉很不舒服。他还没有回来。

核电站的屋顶上铺着一层沥青，浓烟就来自于燃烧的沥青。后来，他说走在那上面就像是走在熔化的柏油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扑灭大火。他们用自己的脚去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他们当时并没有穿帆布制服。他们穿着T恤和衬衣冲进了火场。没有人告诉他们需要注意什么。火灾发生，作为消防员，他们应召救火，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4点、5点、6点，按照原计划，我们本该在6点的时候出发，去他父母家种土豆。从普里皮亚季到他父母生活的斯佩利兹耶有40公里的路程。耕地、播种——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他的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希望他搬到城市里去生活，他们甚至还为他建造了一座

新房子。后来，他应征入伍，在莫斯科的消防连队里服役，当他退役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消防员。除此以外，他别无他求！（沉默。）

有时候，我好像会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栩栩如生，听上去就像他在我的耳边轻声呼唤我。即便是照片也无法令我产生这种感觉。可是，他从来都不曾要求过我什么……即使是在梦中也一样。一直都是我在呼唤他，要求他。

7点，7点时，我被告知他在医院里。我闻讯立刻跑到医院，可是警察已经将医院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除了救护车。我听见那些警察冲着人群大叫道：救护车有辐射，大家离远一点！医院门口已经围了很多人，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赶往那里的伤者家属，那天晚上在核电站工作的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已经赶到了医院。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一位朋友，她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当她从一辆救护车上跳下来之后，我立刻冲上去，一把抓住了她的白大褂："让我进去！""不行，我办不到。他的情况不好，所有人都一样。"我死死地抓住她："让我看看他就行！""好吧，"她说，"跟我来。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最多20分钟。"

我看到他了。他全身水肿，皮肤胀得十分厉害。我几乎都看不到他的眼睛。

"他需要牛奶。大量的牛奶。"我的朋友说，"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喝下至少3升牛奶。""可是，他不喜欢喝牛奶。""现在，他会喝的。"那所医院的许多医生和护士最终都会生病，然后死去，尤其是在那儿工作的勤杂工。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早晨10点，摄影师希谢诺克死了。他是事故发生后第一个死亡的伤者。我们得知，还有一个人被压在了爆炸的废墟下——瓦列里·霍捷姆楚科。他们根本无法到达他被掩埋的地点。于是，他们就把他埋在了混凝土下。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第一批走向死亡的人。

我说："瓦斯亚，我该怎么做？""离开这里！快走。你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可是，我怎么能够丢下他不管呢？他对我说："快走！离开这儿！照顾好孩子。""首先，我需要为你找一些牛奶，然后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做。"这时，我的朋友坦尼娅·基贝诺克跑进了病房——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里。和她一同进来的还有她的父亲，他有一辆车。我们随即上了他的车，开到最近的村庄，弄到了一些牛奶。村庄距离市区大约3公里。我们买了许多3升装的牛奶，如此一来，所有人

就都能喝到足够多的牛奶了。可是，他们刚一喝下牛奶就立刻呕吐不止。与此同时，他们还时不时地陷入昏迷状态，医生给所有人都做了静脉注射。医生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燃烧的气体有毒，他们全都中毒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提到过“核辐射”。市区里到处都是军用汽车，军队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车和火车都停止了运行。士兵们用一种白色的粉末清洗街道。目睹此情此景，我开始为明天如何出城买新鲜的牛奶而担忧。直到这时，我都没有听到有任何人谈论任何有关核辐射的话题。整个城市里，只有军队里的人带着防毒面具。人们继续像往常一样，从商店里买面包，然后把买来的面包装在敞口的大袋子里。人们继续吃着装在盘子里的杯形蛋糕。

那天晚上，我没能进入医院。医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他病房的窗户下，他走到窗边，大声地对我说话。那情景简直令人悲恸欲绝！人群中有人听到了他的呼喊——当天晚上，他们就会被送到莫斯科去。所有伤者的妻子立刻组成了一支队伍。我们决定要和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让我们和我们的丈夫在一起！你们没有权力分开我们！我们手握着拳头大声呼喊，同时用力地敲医院的大门。士兵——当时医院里已经由士兵把守——他们将我们的队伍冲散。没过多久，一名医生从医院里走出来，对大家说：是的，他们将会被飞机送往莫斯科，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们带一些换洗衣物。他们之前在核电站工作时所穿着的衣服已经全都烧坏了。当时，城市里的巴士已经停运，于是，我们这群女人就在街道上飞奔，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收拾衣物。可是，当我们带着他们的行李包重新跑回医院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他们欺骗了我们，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一直围在医院四周喊叫和哭泣。

夜幕降临了。街道的一侧停着许多巴士，数百辆巴士——这些巴士都是准备用来疏散城中居民的，街道的另一侧则停满了消防车。他们都来了。所有街道上都覆盖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咒骂他们。城里的电台反复地播放他们的通知：在接下来的三至五天里，城里的市民可能会被疏散到其他地方，在此期间，大家可能会暂时在树林的帐篷里生活几天，所以请大家带上保暖的衣物。听到这一消息，人们甚至有些喜出望外——全城野营！届时，我们还将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五一劳动节。人们准备好了烧烤的用具和食物，很多人还带上了自己的吉他、收音机。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只有那些当晚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的妻子们在哭泣。

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如何赶到了父母所在的村庄，那情景

就像是我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妈妈："妈妈，瓦斯亚现在在莫斯科。他们用一架特殊的飞机把他接走了！"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开始播种土豆。（一个星期后，生活在这个村庄的人们也被撤离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会这样！天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开始呕吐。当时，我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我觉得很不舒服。那天晚上，我梦到他在睡梦中大声呼唤我："柳西娅！柳西娅！"可是，在他死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他呼唤我的名字。一次也不曾有过。（说到这儿，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早晨，我醒来后就一直在想：我必须去莫斯科。我一个人去。我的母亲哭着对我说："你要去哪里？你怎么去？"于是，我拉上父亲和我一同前往。临走前，爸爸去了一趟银行，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旅途中的情景，就好像这段回忆从未在我的记忆中存在过一样。到达莫斯科以后，我们拉住在路上见到的第一名警察，问他，他们把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立刻把地址告诉了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惊讶万分，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言之凿凿地威吓我们说，这属于最高机密。"第六医院，就在地铁站斯库金斯卡亚站。"

那是一所治疗特殊疾病的医院——专攻放射医学，必须凭通行证进入。我给了看门的那个女人一些钱，她这才说："进去吧。"接着，我不得不挨个地哀求其他人。最后，我终于坐在了放射学科管理者——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像一名失忆症患者，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我必须要见到她。她一见到我立刻就问道："你们有孩子吗？"

我应该怎么对她说呢？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隐藏我已经怀孕的事实。他们不会让我见他！幸好我很瘦，没想到瘦也是一件好事。从外形上，其他人几乎看不出我和普通人有何区别。

"有。"我说。

"有几个？"

我暗自思忖，我得告诉她我有两个孩子。如果我说只有一个孩子，她一定不会让我进去。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既然如此，你们也不再需要第三个孩子了。好吧，听着：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已经彻底瘫痪，他的大脑也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好吧，我心想，那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烦躁不安。

“还有，你记住：如果你哭，我立刻就会把你赶出去。你不能抱他，也不能亲他，甚至不能距离他太近。你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这个时候，我早已打定主意，绝不离开这里。假如我离开，那也一定是和他一起离开。我发誓！我走了进去，他们正坐在床上打牌，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

“瓦斯亚！”见到他们，我立刻冲着他大叫起来。

他转过身：“噢，好吧，我不玩了！没想到她竟然找到了这里！”

出现在我眼前的他看上去十分滑稽。他一向都穿52号的衣服，但是此刻他身上却穿着一件48号的睡衣。袖子和裤子都短了一大截。不过，他的脸已经不肿了。面部表情看起来也自然了很多。

我说：“你打得怎么样啊？”

他想冲上来拥抱我。

医生制止了他：“坐下，坐下，”她说道，“这里不准拥抱。”

我们听了，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就像听到了一个好笑的笑话。接着，所有人都从其他病房里赶了过来，所有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人都到齐了，总共28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城里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们，那些人已经开始疏散城里的居民，在三到五天的时间里，城市里所有的居民就都会被撤离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听了，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伤员——在转移到莫斯科的伤者中，有两名女性——开始呜呜地哭了起来。事故发生时，她正在核电站里值班。

“噢，天啊！我的孩子们还在那里。他们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其他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编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病房，去了隔壁的大厅。当他们离开后，我终于拥抱和亲吻了他，但是，他很快就闪到了一边。

“不要坐得离我太近。你拿把椅子。”

“这样做太愚蠢了。”我一边说，一边挡开了他递过来的椅子，“你看到爆炸了吗？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们是第一批赶到事故现场的人。”

“这次事故很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破坏活动，是人为蓄意破坏造成的。我们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当时，人们都这样说，他们也全都是这样认为的。

第二天，他们被限令只能待在各自的房间里，躺在床上，不准站在走廊上，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指关节敲打墙面，嗒、嗒嗒，嗒嗒、嗒。医生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个人身体的耐受性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在接受核辐射后的反应都不一样。医生们甚至还测量了他们病房墙壁的辐射强度。所有的墙壁都接受了测量，包括天花板和地板在内。原本住在他们楼上和楼下的病人都被转移到了其他病房。他们成为了那栋大楼里唯一的病人。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朋友不断地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水壶、盘子，尽管拿去。我为住在医院里的六个大男孩——他们都是消防员——做了六人份的火鸡汤。他们和他被排在了同一个小组，那天晚上正好轮到他们的小组值班。他们分别是：巴舒克、基贝诺克、提特诺克、普拉维科和提斯库拉。我给他们买了一些牙膏和牙刷，医院里根本就没为他们准备这些洗漱用品。我还给他们买了些小毛巾。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为朋友当时的表现感到吃惊：他们都很害怕，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怎么可能会不害怕呢？毕竟外面已经有一些风言风语了，可是他们仍然不断地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就拿，尽管拿！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们那些人呢？他们能活下去吗？一定要活着！（说到这儿，她陷入了沉默。）那时候，我遇到了许多好人，现在，有很多人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她是一名看门人，她曾经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必须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

每天一大早，我都会赶往市场，然后再去我朋友家，在那里给他们做汤。我必须把所有的食材都磨碎，碾碎，压成粉。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给我带点苹果汁来喝吧。”于是第二天，我就带着六个半升的装满苹果汁的瓶子赶到了医院。我准备的食物永远都是六份。早晨，我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然后在那儿一直待到晚上。太阳下山后，我再横穿整座城市，回到位于城市另一边的住处。我不知道如此下去自己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三天后，院方通知我，我晚上可以住在医生的宿舍里，而宿舍就在医院的大院里。上帝啊，这真是太好了！

“可是，宿舍里没有厨房。我怎么做饭呢？”

“你再也不需要做饭了。他们已经无法消化食物。”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人。之前的烧伤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伤口首先出现在他的嘴里，接着是他的舌头、脸颊——最开始，那些伤口还十分细小，但是很快就迅速扩大、蔓延。伤口处开始变得层层叠叠——看上去就像一层层白色的薄膜……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也……蓝色……红色……灰褐色。看着他，我的心都碎了！我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出当时的情景，也无法用文字把它们写下来！那情景只会令你感到生不如死！唯一能够将我从这一致命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快得让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更没有时间去哭泣。

我爱他！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他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才刚刚结婚。我们肩并肩走在街道上——他会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拥入怀中，然后亲我，不停地亲我。人们微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

那是一所特殊的医院，专门收治那些受到严重辐射感染的伤者。14天。14天后，一个人死了。

就在我住进医生宿舍的第一天，医生们用放射量测定器对我进行了严密的检测。我的衣服、手提包、钱包和鞋子——它们全都“烫”得厉害。他们收走了我所有的东西，除了我的钱，就连我的内衣内裤都被收走了。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套病人服装——56号——和一双43码左右的拖鞋。他们说，他们也许会把我的衣服还给我，也许不会，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洗衣房来“清洗”它们。当我穿着这一套衣服去见他的时候，他被我吓了一跳：“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不过，我还是想办法给他做了一点汤。我先用一个玻璃罐把水烧开，然后再往里面加了一些鸡肉——切得很碎很细的鸡肉。后来，有个女人给了我一个水壶，我想她大概是这里的清洁工人或门卫。我又从另一个人那儿得到了一块切菜板，用来切碎芹菜。因为身上穿着病人的服装，我无法去市场买菜，人们就给我带蔬菜。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已经咽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液体也喝不去了，就连顺滑的生鸡蛋他都咽不下去。但是，我仍然想做一些可口的食物给他吃，就好像这样做能对他有所帮助一样。我跑到邮政局。“姑娘们，”我对她们说，“我需要马上给住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父母打电话！我的丈夫快不行了！”她们立刻就意识到我的丈夫是什么人，以及我来自哪儿，并且很快就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爸爸、妹妹和弟弟当天就坐飞机赶到了莫斯科。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些行李，还有钱。当时已经是5月9号。他过去经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在胜利日，当他们燃放烟花的时候！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一看那美丽的景色。”

我坐在他身边，他睁开眼睛，问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现在是晚上9点。”

“打开窗户！他们马上就要点燃烟花了！”

我打开窗户，他的病房在八楼。从窗户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我们面前！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

“快看那儿！”我说。

“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

我扭过头，看到他的枕头下放着三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她帮他买了这些花。

我转身跑到他的床边，亲吻着他。

“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他开始低声抱怨道：“你忘了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吗？不准抱我，也不准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好，然后给他铺好床，给他量体温。接着，我端起尿盆，出去洗干净，然后回到房间里。那天晚上，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我开始感到有些眩晕，幸亏当时我正在走廊上，而不是在房间里。我死死地抓住窗沿，从而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一名医生从我身边经过。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立刻矢口否认：“不！我没有怀孕！”当时的我吓坏了，生怕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

“不要对我撒谎，”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第二天，我被叫到了负责人的办公室里。

“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她问道。

“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把我送回家。这是一个神圣的谎言！”

“你在这里能做什么呢？”

“至少，我能在他身边陪着他……”

我十分感激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我这辈子都对她感

激不尽！其他伤者的妻子也都赶来了，但是医院不准她们进来。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瓦洛佳·普拉维科的母亲不停地哀求上帝：“请带我走吧，不要带他走。”一位被大家称为盖尔医生的美国教授——他就是那位为他做骨髓手术的医生——尝试着安慰我。他说，虽然希望十分渺茫，但是毕竟还是有希望的。他的肌体是那么强壮，而他又是那么坚强！他们打电话叫来了他所有的亲人：住在白俄罗斯的两个妹妹以及住在列宁格勒的弟弟，他曾经在那里当过兵。娜塔莎是他们姊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还只有14岁，她十分害怕，一直哭个不停。然而，她的骨髓却是最适合他的。（她再度陷入沉默。）现在，我终于能够开口谈论这件事情了，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谈论这一话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从没提起过这件事情。（又是一阵沉默。）

当他发现他们要从他最小的妹妹身上植取骨髓为他骨髓手术的时候，他二话没说就拒绝了：“我宁愿死掉。她还那么小，不要碰她。”他的大妹妹柳达当时28岁，她自己就是一名护士，所以她十分清楚这一抉择意味着什么。“只要能让他活下去就行。”她说。我目睹了手术的全过程。他们俩躺在两张桌子上，彼此靠得很近。手术室上方有一扇大窗户。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柳达的情况甚至比他还糟糕。他们在她的胸部扎了18个小孔，她差一点就没能从麻醉药中苏醒过来。手术后的她十分虚弱，就像一个患重病的病人，而在此之前，她曾经是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孩。柳达终生未婚。手术后，我穿梭于他们俩的病房之间。他已经从普通病房转移到了特殊的观察病房，病房里有一张透明的门帘，他的病床就在门帘后面。任何人都禁止入内。

他们在病房里安装了仪器，如此一来，医生们就能在不越过帘子的情况下为他注射药物和置换导尿管。帘子是用尼龙搭扣拴起来的，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不过，我一把拉开帘子，走进房间。我看到他的病床旁边有一把小椅子。他的情况糟透了，我一见到他就知道我再也不能离开他，哪怕一秒钟也不行。他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柳西娅，你在哪里？柳西娅！”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其他受伤的男孩们都被安置在隔壁的观察病房里，因为勤杂工拒绝照顾他们——他们要求医院配发防护性的服装——所以只能由士兵们负责照料他们的起居。那些士兵为病人清洗尿盆，擦地板，更换被褥。他们什么都做。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找来的这些士兵？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但是，他——他——每天，我都会听到死亡的信息：他死了。他也死了。提斯库拉死了。提特诺克也死了。死亡。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就觉得有一把大铁锤在狠狠地敲打我的头。

每天，他都要进行25到30次大便，每次的大便里都夹带着鲜血和浓稠的黏液。他胳膊和腿上的皮肤开始破裂，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当他转动脖子，将头扭向一侧的时候，枕头上就会留下一大把头发。为了宽慰他，我开玩笑说："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你再也不需要梳子了。"很快，医生们就剃光了他们的头发，而他的头发是我帮他剪的。我想亲手为他做每件事。假如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我愿意一天24小时都陪在他身边。我不想离开他，哪怕是一分钟也不愿意。（说到这儿，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我的弟弟来了，他被这里的情形吓坏了，他说："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可是，我的父亲对他说："你认为你能够阻止她吗？她会从窗户里跳出去！她会从消防通道里逃走！"

我回到医院，一走进病房，我就看到他病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橘子。那个橘子很大，皮是粉红色。他笑着对我说："我收到了一件礼物。你把它吃了吧。"就在他和我说话的同时，站在帘子那一侧的护士也对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不能吃。那个橘子就放在他身边，靠得很近，事实上，那个橘子不仅不能吃，而且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去碰它。"来吧，吃了它。"他说。"你喜欢吃橘子的。"我伸出手，把橘子握在手心里。这时，他闭上眼睛，睡着了。护士一脸惊恐地望着我。而我呢？我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不会想到死亡，不会意识到他的死亡是那么可怕，更不会认为他会令我感到害怕。回想当时的情景，我只能隐约回忆起一些谈话的片段。有人说："你必须明白：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也不再是一个受人关爱的人，他只是一个带有高浓度毒素的放射性物体。你不要自取灭亡，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很喜欢一个已经近乎崩溃的女人说过的话："可是，我爱他！我爱他！"当他睡觉时，我会轻声地对他说："我爱你！"当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会轻轻对自己说："我爱你！"当我拿着他的尿盆向厕所走去的时候，我会低声说："我爱你。"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家时的情景。他只有握着我的手才能安然入睡。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睡觉时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不松开。所以，在医院里，每当他睡觉的时候，我也会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松开。

一天晚上，周围一片寂静。病房里只有我们俩。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道：

"我很想见见我们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我们给他起什么名字呢？”

“你决定吧。”

“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拿主意呢？这是我们俩的孩子。”

“那好吧，如果是个男孩，我们就叫他瓦斯亚，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爱他……只爱他。我就像是一个瞎子，什么也看不到！我甚至感觉不到肚子里孩子的小心跳，但是当时的我其实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我以为，我的小宝贝就在我的身体里，而他也会得到应有的保护。

没有医生知道我每天都在观察病房里过夜，是护士让我进去的。一开始，她们也劝我不要进去：“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核反应堆。你这样做只会和他一起灭亡。”我就像一条狗一样，锲而不舍地跟在她们身后。我站在她们办公室的门口，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哀求。最后，她们说：“那好吧！你就下地狱去吧！你这个疯子！”每天早晨，8点之前，她们会在医生查房之前，隔着帘子对我说：“快走！”这时，我就会跑回宿舍．一个小时后再回去。我有一张通行证，凭着它，我可以从早上9点一直在病房里待到晚上9点。我两条腿膝盖以下的部位都变成了蓝色，又蓝又肿，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时的我有多累。

当我在病房里陪着他的时候，她们不会给他拍照，可是当我离开后，她们就会给他照相——他不穿任何衣服，赤条条地暴露在闪光灯下。他身上盖着一条很薄的小毯子。我每天都会为他更换这条毯子，到了晚上，这条毯子就会变得血迹斑斑。每当我扶他坐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上都会留下许多细小的皮肤碎片——那些都是他溃烂后的皮肤。在与他发生肢体接触的过程中，它们粘在了我的手上。我对他说：“亲爱的，帮帮我。尽量用你的胳膊和手肘把你的身体支撑起来，这样我就能帮你铺平床单，清理掉那上面的线头和褶皱了。”任何一个细小的线头都会在他身上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我把指甲剪得非常短，一直剪到流血为止，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在不经意间划伤他那异常脆弱的皮肤。没有护士能够接近他，所以如果她们需要什么就会叫我。

他们继续给他拍照。他们说是为了科学。我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我冲着他们大吼大叫！甚至还打了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爱人——我真希望自己能把他们统统挡在外面。

我从病房里走出来，沿着走廊走了一圈，然后转过身，向他的病床走去——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们。我告诉当班的护士："他快死了。"她对我说："你以为他能活着吗？他接受了1600伦琴的核辐射。400伦琴的辐射就已经足以致命。你现在就坐在一个核反应堆旁边。"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爱人。当所有人都死了以后，他们对医院局部进行了重建。他们推倒了墙壁，撬开了铺在地上的木地板。

最后——我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一瞬间，一切都没了。

晚上，我就坐在他床边的小凳子上。8点时，我对他说："瓦申卡，我要出去走一走。"他睁开眼睛，然后又闭上，示意我可以去。我走出病房，径直回到我的宿舍。一进门，我就瘫倒在地板上。我不能躺在床上，我全身都疼得厉害。不知躺了多久，我突然听到负责打扫卫生的女人在拼命地敲我的门："快！快去他那儿！他在找你，发疯似的找你，叫你的名字！"第二天早上，坦尼娅找到我，哀求道："陪我去墓地吧，我一个人根本去不了。"他们安葬了维特亚·基贝诺克和瓦洛佳·普拉维科。他们都是我亲爱的瓦斯亚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朋友。在爆炸的前一天，我们还一起在大楼前照了一张相片。我们的丈夫是那么英俊、那么高兴！那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最后一天。那时，我们所有人都是那么快乐！

从墓地回来后，我立刻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他15分钟前去世了。"什么？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晚上，只不过才离开了三个小时而已！我跑到窗户边，歇斯底里地大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抬起头，望着天空大声喊叫。整栋楼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叫声。他们都害怕我，不敢靠近我。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必须再见他一面！我一定要再见他一面！于是，我冲下楼梯。他还躺在他的那间观察病房里，他们还没有把他送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柳西娅！柳申卡！""她刚才出去了，马上就会回来。"护士告诉他。他听后，叹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说话。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半步，直到他下葬，用于安葬他的并不是普通的棺材，而是一个塑料袋。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个袋子。

在停尸房里，他们问我："你想看一看我们给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吗？"我当然想！他们给他穿了一套礼服，还给他带了一顶军帽。因为他的双脚肿得厉害，所以他们找不到合适的鞋子给他穿上。同样，为了给他穿衣服，他们也不得不把衣服拆开。他的身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伤口。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天里，我曾经轻轻地抬起他

的一只胳膊，就在这时，我感到他手上的骨头在颤抖，那感觉就仿佛他身体里的骨头都在左右摇摆，摇摆中，他的身体开始分裂。细小的肺和肝脏的组织碎片开始从他的嘴里向外涌。这些细小的内脏器官碎片让他咳嗽不止，有时甚至会令他窒息。我把绷带缠在手上，然后伸进他嘴里，把这些堵塞他气管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掏出来。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出当时的情景，更无法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任何人都无法忍受这一切。但是，我就在那儿，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是我的爱人。他们根本找不到适合他穿的鞋子，所以只能让他赤脚下葬。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他——穿着礼服的他——抬起来，装进一个用玻璃纸做成的袋子里，然后把袋子捆起来。接着，他们把这个袋子放进一个木棺材，随后又用另一个袋子把棺材套了起来。套在棺材外的塑料袋是透明的，但是很厚，看上去有点像桌布。最后，他们把这个大塑料袋塞进了一个用锌制成的棺材里。他们硬生生地把那个大袋子塞进了棺材里，只有帽子塞不进去。

所有人都来了——他的父母，还有我的父母。他们来莫斯科时候带了许多黑手帕。特别委员会的人接见了我们。他们对每个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我们无法把你们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归还给你们。遗体带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所以我们将会采取特殊的方式把他们安葬在莫斯科的一处墓地里。我们会用密封的锌棺材来盛放遗体，然后在上面铺设水泥砖。你们需要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如果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愤怒地想要将棺材带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此人，正如你已经看到的，死者现在已经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们不再属于他们的家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英雄，他们属于国家。

我们坐在灵车里。除了死者的亲属，还有一些军人。在场的还有一位上校和他的士兵。他们告诉士兵：“原地待命！”我们乘坐的灵车沿着环形公路，绕着莫斯科开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我们会重新回到莫斯科市内。他们对士兵们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地。已经有一些外国媒体试图闯入墓地。再稍等一会儿。”我的父母们一句话也没说。妈妈的手里握着一方黑色的手帕。我感到眼前有些发黑。“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丈夫藏起来？他是——什么？杀人犯吗？罪犯吗？我们要埋葬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的母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安静，安静，女儿。”上校见状，开始下达命令：“进入墓地。死者妻子的情绪已经开始失控。”到达墓地后，我们立刻被一群士兵围了起来。他们像卫队一样，一直护送我们进入墓地，几名士兵随即将棺材抬下了车。墓地被封锁了，任何人都不得入内，除了

我们。士兵们飞快地用泥土掩埋了棺材。“动作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名军官一直在旁边敦促干活的士兵。下葬前，他们甚至都没让我抱一抱他。随后——我们就被他们带上了汽车。整个过程都显得格外神秘。

葬礼刚刚结束，他们立刻就给我们买好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个便衣士兵紧跟着我们。他甚至不允许我们外出购买返程旅途中所需的食物。他们禁止我们与他人谈及此事——尤其是我。事实上，当时的我根本就无法谈论这一话题，我甚至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当我们离开时，值班的那个女人清点了我们用过的所有毛巾和毯子，然后把它们叠起来，塞进了一个塑料袋。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它们都烧掉。我们自己支付了医院宿舍的住宿费。我在那儿住了14晚。那是一所专门针对辐射中毒患者的特殊医院。14个夜晚。一个人从生到死，只需要14天的时间。

回到家，我就睡着了。我走进房间，随即就倒在床上。我睡了整整三天。家人们叫来了救护车。“没关系，”医生说，“她会醒的。她只是睡着了而已。”

我当时才23岁。

我想起了之前做过的一个梦。我梦到了已经去世的奶奶，她身上穿的正是下葬那天我们给她穿的那套衣服。梦中的她正在装饰新年树。“奶奶，这里为什么有一棵新年树？现在明明是夏天。”“因为你的瓦申卡马上就要来找我了。”后来，那棵树就在树林里长大了。我想起了当时做的一个梦——瓦斯亚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向我走来，口中呼唤着娜塔莎的名字。那是我们还没出生的女儿的名字。梦里面的她已经长大了。他抱起她，向天花板抛去，他们父女俩顿时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我望着他们，心想，幸福——原来如此简单。我还在睡梦中。我们俩在河边散步，一直往前走。他好像还劝我不要哭。从那时开始，这个梦就成为了一个征兆。

（说到这儿，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两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莫斯科。从火车站出来后，我直奔墓地。我要去看他！就在那个墓地里，我出现了分娩的征兆。我才刚刚开始和他说话，我的肚子就开始疼——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我又回到了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所在的那家医院，并在那里生下了我的孩子。她之前就对我说过，要我回去生产：“你需要回到这里来

生下这个孩子。”当时距离我的预产期还有两周的时间。

他们把孩子递到我眼前——是一个女孩。“娜塔申卡，”我轻声说道，“你爸爸给你起名叫娜塔申卡。”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被查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性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你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一不把她给我？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我不会把她给你们！你们想用她来做科学研究。我讨厌你们的科学！我讨厌它！

（她又陷入了沉默。）

我一直在给你错误的信息。一切都错了。自从中风以后，我就不应该再高声喊叫，也不应该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那些话都是错误的原因。但是，我要说。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最后，他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小木盒，并且对我说：“她就在这里面。”我望着那个木盒。他们已经将她火化。她变成了一片灰烬。我开始放声哭泣。“请把她埋在他的脚边。”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在墓地里，她甚至连一块墓碑都没有。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他们没有把她的名字——娜塔莎·伊格纳坚科——刻上去。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幼小的灵魂。我把她埋在了那儿。每次去那儿，我都会买两束花：一束放在他的墓碑前，另一束放在墓碑旁的一角——献给我的女儿。我跪在他们的墓地前，缓缓地绕着墓地转了一圈——我一直都是跪着的。（她的话开始变得杂乱无章，难以理解。）我杀了她。我，得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体上所有的辐射，她就像是一根荧光棒。她还那么小，她小得可怜。（她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她救了……可是，我爱他们，两个都爱。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去杀人，对吗？况且我的爱还是那么深！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撞到一起了呢——爱和死亡，在一起了。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跪在墓地前，慢慢地爬。

（这一次，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他们在基辅给我分了一套公寓。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从核电站迁来的人都住在这儿。公寓很大，有两个房间，正是我和瓦斯亚梦寐以求的那种公寓。站在公寓里，我觉得我简直要崩溃了。

后来，我再婚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我告诉他，我曾经有一个爱人，一个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爱人。我把我们

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们在一起了，但是我从没邀请他去我家，那是瓦斯亚的家。

我在一家糖果店里工作。当我做蛋糕的时候，眼泪会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不想哭，可是眼泪却不断地往下流。

我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安德烈。我的安德烈卡。朋友们试图阻止我。他们说："你不能生孩子。"医生也吓唬我："你的身体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后来——后来他们又告诉我，他少了一只胳膊，右胳膊。这是仪器显示的结果。"那又怎么样呢？"我心想。"我会教他用左手写字。"可是，我生下的是一个健全的孩子，一个漂亮的男孩。他现在已经上学了，成绩很好。我的生命里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个人——一个让我继续活下去、继续呼吸的人。他照亮了我的生活。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妈妈，如果我去看望奶奶，在那儿住两天，你能呼吸吗？"不，我而能！我害怕自己有一天会不得不离开他。有一天，我们走在街上。我感到自己慢慢倒了下去。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妈妈，你想喝点水吗？""不，我只想让你站在我身边。哪儿都不要去。"说完，我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被送进了医院，但是自始至终，我的手一直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以至于医生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扳开我的手指。他的胳膊也因此淤青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他会对我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了。我哪里也不去。"后来他也病了，他上两个星期的学，然后在家待两个星期，接受医生的治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她站了起来，向窗边走去。）

这里住着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切尔诺贝利斯卡亚，或者说切尔诺贝利区。这里的人在核电站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会回到那儿做一些临时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不过，那里已经再也没有人居住。这里的人都患有很严重的疾病，有的甚至已经残疾，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只要一想到反应堆会被关闭就会心生恐惧。除了核电站，还有谁会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呢？死亡常常会降临在这些人身上，有时候，死亡就发生在一瞬间。他们就那么倒下了——有的人刚刚还在走路，转眼间就倒下了，睡着了，然后再也没有醒过来。有的人带着花去探望自己的护士，在路上，他的心脏就突然停止了跳动。他们死了，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地询问过我们这一切。没有人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没有人问我们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愿意倾听

死亡，倾听那些令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事情。

但是，我要和你谈一谈爱，谈一谈我的爱人……

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
罹难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妻子

第一部分

逝者的国度

为何我们要记住这一切

你已经决定了要把这些都写下来吗？你已经决定要写了吗？可是，我并不想让人们知道关于我的这些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经历过的一切。一方面，我心中一直都藏着一种想大声说出这一切的欲望，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样做就像是把自己的疮疤暴露在众人眼前，而我并不想这样。

你还记得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情节吗？战争刚刚爆发时，皮埃尔·别祖霍夫震惊不已，他认为战争会永久性地改变自己，以及整个世界。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观点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他对自己说："我会像以前那样继续冲着马车夫大吼大叫，我会像以前一样抱怨、发牢骚。"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要记住这一切呢？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判断出什么才是事实？还是为了公平？抑或是为了解放自我，尔后忘却？还是因为记忆可以让他们的目光永远都停留在过去？不管怎样，人们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记忆是脆弱的、短暂的，它并不是确切的知识，而只是一个人对于自身所做出的一种猜测。记忆不是知识，它更像是一种情感。

我的情感……我挣扎着，深入地挖掘我的情感：我想起来了。

对我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童年时期——战争。

我还记得当年我们一群男孩子玩"妈妈和爸爸"游戏时的情景——我们会把年纪小的孩子的衣服脱掉，然后把他们放到另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孩子是战争后出生的第一批婴儿；在战争时期，孩子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被遗忘的一群人。我们等待生命的出现。我们玩"妈妈和爸爸"的游戏。我们想看一看生命是如何出现的。当时，我们不过八九岁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企图自杀的女人，就在河边的灌木丛中。她手里拿着一块砖，不断地用砖砸自己的脑袋。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占领这座村庄的部队里的一名士兵，全村的人都恨他。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目睹了许多小动物出生的过程。我帮助过妈妈把一头小牛从牛妈妈的肚子里拉出来，我让我们家的猪和野猪交配。我记得——我记得他们把我爸爸的尸体抬回来时的场景。当时，他身上穿着一件毛衣，那是我妈妈给他织的毛衣。他被机关枪的子弹打中了，鲜

红的血液徐徐地从伤口往外冒，浸湿了那件毛衣。他躺在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床上，除此以外，我们找不到其他地方来安放他。后来，他被埋在了我们家前面的空地上。门前的土地是那种硬邦邦的陶土，并不松软。挖土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甜菜根。战斗还在继续。路上堆满了人和马的尸体。

对于我而言，这些回忆极其隐私，我从没和任何人谈到过这些回忆。

那时，在我的意识当中，死亡和出生是一回事。当我看到一只小牛从妈妈的肚子里钻出来的时候——以及我目睹其他小动物诞生的时候——我的感受和我看到灌木丛中的那个女人试图用砖头杀死自己时的感受并没有任何不同。出于某种原因，在我看来，死亡和出生就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从童年时开始，我就一直清楚地记得家里宰杀野猪时的那股气味。你才刚刚见到我，但是我已经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个噩梦之中。陷入了一种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惧中，无法自拔。我是自愿飞向那里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女人们带我们去桑拿房时的情景。我看到女人们的子宫（即便是在当时，我们已经知道那就是子宫）都垂了下来，她们用布带将它们捆住。我看到了。她们的子宫之所以会下垂完全是因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当时，村子里没有男人，男人们不是已经上前线作战，就是加入了游击队。村子里也没有马，所以女人们只能自己完成所有的农活和家务。她们自己犁地——自家的土地和集体农庄的地。当我长大后，我和一个女人发生了亲密的关系，我会记住这一切——记住我在桑拿房里看到的一切。

我想忘记，忘记所有的事情，而我也真的做到了。我以为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战争。我以为自己会受到保护。我以为会受到保护。

可是后来，我去了切尔诺贝利地区。我已经去过那里很多次了。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无助，身边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我彻底崩溃了。我的过去已经不能再保护我。没有答案。在此之前，它们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但是现在它们已经做不到了。摧毁我的是将来，而不是过去。

彼得.S
心理学者

面对生者和逝去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

夜晚，一只狼闯进了庭院。我从窗户望出去，看到它就站在院子里，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就像两盏照明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一个人独自生活了七年。自从七年前人们离开后，我就一直一个人住在这里。夜晚，我有时候会一个人坐着，思考或回忆，直到天亮。这天夜里，我没有睡觉，我坐在床上，然后，我走出房子，站在院子里眼看着太阳升起来。我应该告诉你什么呢？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的纠缠。所有人最终都将回归泥土——善良的人、残忍的人、有罪的人，除了死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公平的。我辛勤工作了一辈子，诚实待人，但是我并没有获得任何公平的回报。上帝会在某个地方将事情分割开来，当那条分割线降落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就变得一无所有。年轻人有可能会死，老人则不得不死……起初，我还等着人们回来——我以为他们会回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自己再也不会回来，当初，他们都只是说暂时离开一段时间。现在，我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死亡并不难，却令人恐惧。这里没有教堂，牧师也不会来。没有人能够帮我完成临终前的忏悔，解除我的罪恶。

当他们第一次告诉我们，我们都受到了核辐射的污染时，我们以为：那就是一种疾病，任何得了这种病的人很快就会死。不——他们说，那不是病，而是一种存在于地面上的物体，它能够钻进地里，但是你们却看不见它。动物也许能够看到或听到它，但是人类不能。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就看到了它。当雨水从天而降的时候，我在我工作的院子里看到了铯。它是黑色的，像墨水一样黑。它就在那儿，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了一种像油滴一样的东西。我从集体农庄跑回家，刚一进门就看到我的花园里也有一大片，只不过出现在花园里的铯是蓝色的。在距离花园200米的地方也有一片，其面积就和我头上的方巾一样大。我叫来了邻居，还有村子里其他的女人，我们四处奔走，在村子里寻找类似的痕迹。我们找遍了所有的花园和附近的土地——其面积加起来大约有两公顷——在那里发现了四块大面积的彩色痕迹。其中有一块是红色的。第二天一大早又开始下雨，等到中午的时候，那些彩色的痕迹已经全都消失了。警察来了，可是他们什么也没看到。我们就把自己看到的情景告诉他们。有这么大一片。（她用

手比划出了那些彩色痕迹的面积大小。）就像我的方巾，蓝色的、红色的……

对于这种辐射，我们并没有感到十分害怕。在我们没见到它，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也许还有那么一点害怕，可是当我们见过它的真面目之后，我们就不那么害怕了。警察和士兵们随后在村子里竖起了一些标志牌。有的就立在人们生活的房子旁边，有的则埋在街道上——他们在上面写着：70居里、60居里。我们这里的人一直都以土豆为生，结果突然之间——我们被禁止食用土豆！对某些人而言，这实在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坏消息，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个消息则显得滑稽可笑。他们建议我们在花园里工作时要戴上面具和橡胶手套。后来，有一个大科学家来到我们这里，他在会议厅里对我们说，我们需要冲洗庭院。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命令我们必须清洗我们的床单、毯子和窗帘。可是，那些东西全都被收在储藏室里！好好地放在箱子和柜子里。那里根本就没有辐射！辐射能够穿透玻璃吗？他们说，辐射能够穿透紧闭的大门！辐射几乎无处不在，树林里、土地上。他们封闭了水井，用锁把井盖锁了起来，最后用玻璃纸把水井包裹得严严实实。他们说，井水是"脏"的。那么清澈的井水怎么可能会是脏的呢？他们对我们说了一大堆没有意义的废话——你们会死。你们必须要离开。所有人都必须撤离。

人们吓坏了。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恐惧。晚上，人们连夜收拾行装。我也找出了自己的衣服，把它们叠好。我还找出了我因为诚实劳动而获得的红色勋章，以及我的幸运铜板。望着那些东西，我只感到悲痛欲绝！假如我说谎，就让我立刻死在这儿。接着，我听说了士兵们之前疏散其他村庄时的情景，也听说有老头和老太太最终留在原地，哪儿也没去。清晨，人们起床后就被陆续送上了车，有的被疏散的村民还带着自己的奶牛一同走进树林，在那里等待下一步的行动指示。随后，士兵们就放火烧毁了整座村庄，那情形就像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我们的士兵为什么要驱赶我们？（她开始哭泣。）我们失去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我其实不想哭。

哦，看那儿——有一只乌鸦。我不会去驱赶它们，哪怕有时候乌鸦会钻进谷仓，偷我的鸡蛋。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会驱赶它们。我不会驱赶任何人！昨天，有一只小兔子跑了进来。这儿附近还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女人和我一样，选择留下来。有时候，她会来我这儿。也许，这对我们有好处，也许没有，但是，至少有人能陪你说说话，不是吗？一到晚上，我全身就疼得厉害。我的两条腿像被针扎了一样，那感觉就像是有一群小蚂蚁在你身体里爬来爬去。我知

道，那是我体内的神经在作祟。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把镊子在我身体里四处拨弄，又像是有一架碾子在碾压我的身体，就像我们平时磨面粉一样。过一会儿，我身体里的神经就会逐渐镇定下来。我已经辛苦劳作了一辈子，也经历了太多令人悲哀的事情。我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不想再承担任何附加的负担或劳碌。

我有女儿，也有儿子……他们全都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哪儿也不去！上帝让我多活了这么多年，但是他并没有让我享受到公平的对待。我知道，人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变得惹人厌，久而久之，年轻人就会对老人失去耐性。我从孩子们那儿得到的乐趣少得可怜。那些已经搬到城里去住的女人们总是会泪流满面地向人诉苦：不是她们的媳妇对她们不好，就是她们的女儿伤害了她们。她们都想回来。我的丈夫在这里，他被埋在了这儿。如果他不在这儿，他一定会去其他的地方生活，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跟他走，和他在一起。（她的情绪突然振奋起来！）我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呢？这里多好啊！万事万物都在生长，到处都生机勃勃。从最小的苍蝇到树林里的动物，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我会把我能够想起来的一切都告诉你。飞机在天上飞。每天都有飞机从我们头上经过。它们飞得很低很低，几乎就从我们的头顶掠过。它们全都是飞往反应堆的。核电站就是它们的终点。当村子里的人被疏散的时候，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从天空呼啸而过。它们把我们带出村庄，然后一把火烧光了村子里的房子。人们都躲了起来。牲口在不停地叫唤，孩子们则哇哇大哭。那情形简直就像重新回到了战争年代！就连太阳都躲了起来了……我坐在自己的小木屋里，虽然我并没有锁门，但是我也没有走出去。士兵们走到我家门前，敲门，问道："女士，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我回答说："你们是不是想把我的手和脚都绑起来？"他们什么也没说，一个字也没说，然后就离开了。他们都还很年轻。他们还是孩子！年纪大的女人跪在自己的房子前，苦苦哀求。士兵们二话不说，伸出手，把她们拽起来，然后拖进汽车。可是，我告诉他们，谁要敢碰我，我就对他不客气！我诅咒他们！我的诅咒生效了。我没有哭。那一天，我没有哭。我坐在自己的房子里。起初，不断有喊叫声传入我的耳朵。尖利的喊叫声。但是很快，外面就安静下来。非常安静。那一天——第一天，我没有离开我的家。

后来，他们告诉我，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出村庄，跟在人的队伍旁边的是一列长长的牲口队伍。这和战争年代有什么区别？我丈夫过去经常说，开枪射击的是人，但是传递子弹的却是上帝。每个人都

有他自己的命运。在那些离开村庄的年轻人当中，有些人已经死了。他们死在了自己的新家，而我还活着。当然，我也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无聊，这时，我就会放声哭泣。整个村子空无一人。这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鸟，它们在村子里飞来飞去。这里还有麋鹿，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说到这儿，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记得所有的事情。村子里的人全都走了，但是他们留下了自己的猫和狗。在最初的几天里，我在村子里四处溜达，给那些猫的碗里倒上牛奶，在狗的食盆里放几片面包。它们全都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等待主人归来。它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些猫饿了什么都吃，黄瓜、西红柿等。我一直细心地打理着邻居家的草地，直到秋天。她们家的篱笆倒了，我就用锤子把它重新钉起来。我在等人们回来。我的邻居养了一条狗，名叫祖霍克。“祖霍克，”我对它说，“如果你看到有人来，就大叫两声，让我知道有人来了。”

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也加入到了即将被疏散的人群中。警察冲着我大叫道：“女士！这里马上就会被统统烧光，然后被埋进土里。快出来！”接着，他们开车把我们送到了某个地方，一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地方。那里既不像是城镇，也不像原来的村庄。它甚至不在地球上。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我给它起名叫瓦斯卡。那年冬天，老鼠们因为饥饿而变得异常疯狂且极具攻击性。它们和我一样，都已经没地方可去。于是，它们就蜷缩在一些掩护体下面。我在谷仓里储存了一些粮食，它们发现了，就在谷仓的墙壁上挖了一个洞。但是最后，瓦斯卡救了我。假如没有它，我一定会饿死。我会和它说话，和它一起吃饭。后来，瓦斯卡不见了。也许，它被那些饥饿的狗吃掉了。我不知道。那些狗总是饿着肚子跑来跑去，直到死去。村子里的猫也饿得厉害，以至于猫妈妈常常会把自己的孩子当成食物。当然，这样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冬天，夏天，食物相对较为充足。上帝，请原谅我。

现在，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在这里生活下去。对于一个年迈的老太太而言，即便是在夏天，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我也会觉得冷。警察时不时会来这里检查，每次来，他们都会给我带一些面包。可是，他们来这儿检查什么呢？

这里只有我和我的猫。我已经换了一只猫。当我们听到警察的声音时，我们就会变得很高兴。我们会跑上前去。他们丢给它一根骨

头，然后问我："要是强盗来了，你怎么办？""他们能从我这儿抢走什么？我这儿还有什么值得他们抢呢？我的灵魂？因为除此以外，我已经一无所有。"他们都是些不错的大男孩。听了我的话，男孩们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还给我带来了一些收音机电池，我现在还在听收音机。我喜欢柳德米拉·芝基娜，可是她现在很少出来唱歌。也许，她也老了，就像我一样。我丈夫过去经常说——他常常这样说："舞曲结束了，把小提琴收起来吧。"

我会告诉你我是如何找到我的小猫的。我失去了可爱的瓦斯卡。我等着它回来，一天、两天，我足足等了一个月，可是，它始终没有出现。于是，我知道它不会回来了。我又变成了一个人，身边甚至连个说话的对象也没有。我在村子里四处溜达，我走进别人家的院子，大声呼唤它的名字：瓦斯卡，瓦斯卡！一开始，村子里到处都是四处闲逛的小猫、小狗，后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们就慢慢地消失了。对此，死神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土地会慷慨地接纳所有人。我就这样在村子里走着，漫无目的地走着。我走了两天．第三天，我在商店门口看到了它。它也看到了我。它看起来显得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但是，它并没有出声。"那好吧，"我说，"我们一起回家吧。"可是，它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喵喵直叫。我又对它说："你在这儿有什么好处呢？狼会把你吃掉的，它们会把你撕成碎片。走吧，跟我走吧。我有鸡蛋，还有一些猪油。"可是，我跟它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猫听不懂人的语言，既然如此，它又怎么可能听得懂我说的话呢？于是，我转身，向前走去，它突然跑过来，跟在我身后，喵喵地叫个不停。"我会让你尝尝猪油的味道。"喵！"我们俩一起相依为命。"喵！"我叫你瓦斯卡。"喵！它陪我度过了两个冬天，我们俩就这样一起生活到了现在。

晚上，我会做梦，我梦到有人在叫我。那是我邻居的声音："吉娜！"随后，一切就恢复了平静。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吉娜！"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无聊，每当这时，我都会一个人哭泣。

有时候，我也会去墓地看一看。我的母亲就埋在那儿，还有我的小女儿。她死在了战争年代，死于斑疹伤寒。就在她下葬之后，太阳突然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刺眼的阳光照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照亮了墓地里的每一寸土地，似乎是在对我们说：你们应该把她挖出来。当时，我的丈夫费佳也在那儿。我和他们所有人一起坐在墓地旁，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你可以对着一个死人说话，就像你和那些活着的

人说话一样。对我而言，和谁说话都一样。我都能听到对方的回答。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当你悲伤的时候，当你极度悲伤的时候，你就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伊凡·普罗霍洛维奇·加夫里连科的家就在墓地旁边，他是一名老师。他后来搬到了克里米亚，他的儿子住在那儿。彼得·伊万诺维奇·米尤斯奇耶就住在他隔壁。彼得驾驶着一辆大卡车。他是一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当时那个年代，所有人都想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他有一双巧手，他甚至能够用木头做出蕾丝花边。全村就属他的房子最大最漂亮。当他们将他的房子夷为平地的时候，我伤心极了，我觉得全身热血沸腾，恨不得冲上去阻止他们。他们放火烧了它。警察在一旁大叫道："别想啦，女士！这栋房子上沾满了核辐射，就像火锅一样烫手！"就在他的房子被烧毁的同时，彼得喝醉了。我走到他身边——彼得哭了。"走吧，女士，没关系。"他要我离开那儿。彼得的隔壁是米沙·米卡廖夫家，他是农场的一名锅炉工，他很快就死了。离开村子后没多久，他就死了。动物学家斯泰帕·别克霍夫的房子就在他家隔壁。斯泰帕家的房子也被烧光了，坏人趁着夜色的掩护烧掉了他的房子。斯泰帕也没活多久，他死后被安葬在了莫吉廖夫地区的某个地方。战争时期——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瓦西里·马卡洛维奇·科瓦廖夫、马克西姆·尼克夫任科。他们过去都活着，都很快乐。节日来临时，他们会一起唱歌、跳舞、吹口琴。现在，这里就像一所监狱。有时候，我会闭着眼睛穿越整座村庄——我会和他们说话、聊天。辐射？哪里有什么辐射？蝴蝶在空中自由地飞翔，蜜蜂也嗡嗡地飞个不停，而我的瓦斯卡则专心致志地捉老鼠。（她开始哭泣。）

哦，柳博吉卡，你能听得懂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吗，你能明白我内心的苦闷吗？你会把这一切都公之于众，也许，到那时，我已经不在了。我会躺在地下，在深深的树根之下……

季娜伊达·耶夫朵基诺夫娜·科瓦连科
定居者

写在门上的一生

我要成为见证这一切的证人……

事情发生在十年前，但是对于我而言，同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就住在那个名叫普里皮亚季的小城里。就生活在那座城市里。

我不是作家，描绘不出当时的情景。事实上，我甚至无法想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连我的大学证书也无法帮我弄明白这一切。这就是你：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你和其他人都一样——你去上班，然后回家。你拿着和大多数人一样多的薪水。每年，你都会外出度假。你就是一个普通人！然而有一天，你突然变成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一只动物，一件所有人都感兴趣，但与此同时却一无所知的东西。你想像以往那样，继续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但是现在，你却做不到了。人们看你的目光都变得与众不同。他们会问你：你觉得那一切可怕吗？核电站到底是怎么着火的？你看到了什么？还有，你也知道的——你还能生孩子吗？你的妻子是不是已经离开了你？一开始，我们所有生活在那儿的人都变成了动物。“切尔诺贝利”就像是一个贴在你身上的标签、一个符号。所有人都会侧过头来看着你——“他就是从那儿来的！”

事情发生之初，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城市，我们失去了全部的生活。事故发生的第三天．我们就离开了那儿。反应堆着火了。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说过这样的话——“这闻起来就像反应堆”。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你根本无法用语言将它描述出来。但是眨眼间，它已经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尽管这些报道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卡通漫画，但事实上，它们把切尔诺贝利变成了一个极度恐怖的地方。在这里，我只想说一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情，说一说我看到的真相。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在广播里通告全城居民——你们不能带走自己的猫。所以，我们就把小猫塞进了行李箱，但是它并不想走，从箱子里爬了出来，抓伤了大家。他们说你们不能带走自己的东西！那好吧，我不会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我只带一件。唯一的一件！我要把

我公寓的大门拆下来，带走。我不能离开这扇门。我会用一些木板把房子的入口封住。我们家的大门——它是我们的护身符，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的父亲曾经躺在那上面。我不知道这是从哪一辈流传下来的传统；这个传统有些特别，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死去的人必须被放在自家的大门上。他一直躺在那扇门上，直到他们取来棺材。那天晚上，我一直守在父亲身边，而他就躺在这扇门上。整个晚上，房子的大门都是敞着的。这扇大门上有一些细小的划痕。那些都是我成长的痕迹：一年级、二年级……七年级、入伍前。在这些痕迹旁边的那些则是我儿子的成长足迹，然后是我女儿留下的痕迹。我的一生都写在这扇门上。我怎么可能把它留在这儿，不带走它呢？

我向我的邻居寻求帮助，他有一辆车："帮帮我吧。"他轻轻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说：你疯了吗？但是，我还是带走了那扇门。趁着夜色的掩护，我骑着一辆摩托车，带着我的门，开进了树林里。两年后；我们的公寓早已被洗劫一空，警察跟在我身后，大叫："站住，不然我们就开枪了！我们要开枪了！"他们以为我是一名小偷。我就是这样偷走了我家的大门。

我带女儿和妻子去医院。她们全身都长满了黑色的斑点。这些斑点长出来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其大小和五分钱的硬币差不多，但是长在皮肤上却没有任何感觉，不痛也不痒。他们给她们做了一些检查。我向他们索要体检报告单。他们答道："不是给你的。"我反问道："那你们会给谁？"

当时，所有人都在说同样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死掉，我们就快死了。等到了2000年，白俄罗斯人就会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的女儿当时才六岁。我把她放在床上，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爸爸，我想活下去，我还这么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

一间病房里住着七个剃光头的小女孩，你能够想象得出那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吗？在那间病房里，住着七个这样的小女孩……可是，这已经足够了！我受够了！每当我说起此事，我都有一种感觉，我的良心对我说——你背叛了她们。因为我需要用平和的口吻来描述这一切，就像自己只是一个陌生人。我的妻子从医院回来，她已经无法再承受这一痛苦："我宁愿她死，也不愿让她受到这样的折磨。或者，干脆我死掉好了，这样一来，我就再也不用目睹这一切了。"不，我受够了！真的受够了！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再看着她们受苦了。不！

我们把她放在那扇门上……放在那扇我父亲曾经躺过的大门上，

直到他们送来一副小棺材。那副棺材很小，看上去就像是用来盛放大洋娃娃的盒子。

我要成为见证这一切的证人：我的女儿死于切尔诺贝利事件。而他们想要我们忘记这一切。

尼古拉·弗米奇·卡卢金
一位父亲

那些归来的人们

贝利·贝莱格小镇位于戈梅利州的纳洛夫里杨思科地区。

独白者：安娜·巴甫洛夫娜·阿特尤申科、伊娃·艾达莫芙娜·阿特尤申科、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阿特尤申科、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莫洛兹、娜德斯达·鲍里索芙娜·尼古拉延科、亚历山大·费德洛斯维奇·尼古拉延科、米哈伊尔·马丁诺维奇·里斯

“我们经历了这一切，并且活了下来……”

“噢，我真想忘了这一切。太可怕了。他们把我们赶了出来，那些士兵驱逐了我们。他们带着大型军事器械一窝蜂地涌进了我们的村庄，都是那种全地形设备。一位老人——他躺在路旁的地上，奄奄一息。他要去哪儿？‘我会爬起来，’他流着眼泪说道，‘自己走到墓地去。我会安顿好自己的。’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家园，而他们又给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什么？你看看，这儿多美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这片美景，可是又有谁会赔偿我们呢？这是一片风光秀丽的观光胜地！”

“飞机、直升机——到处都是闹哄哄的一片。还有带着拖车的卡车、士兵。当时，我还以为又要打仗了，和中国人或美国人。”

“集体农庄会议结束后，我的丈夫回到家中，他说：‘明天，我们就会被强迫撤离。’我说：‘那我们的土豆怎么办？我们还没把它们挖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挖土豆。’这时，我们的邻居来敲门，我们邀请他们进来喝东西，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开始诅咒集体农庄的主席。‘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好不容易从战争中活了下来，现在，又有辐射了。’哪怕我们会死在这儿，我们也不走！”

“起初，我们还以为两三个月后我们就会死掉。当初，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们到处宣扬死亡信息，恐吓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最终全都活了下来。”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没有人知道另一个世界里有什么。现在，这里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变得更加熟悉了。”

“我们就要离开了——我从妈妈的墓地前抓了一把土，装在一个小袋子里。我跪在妈妈的墓地前：‘我们要离开你了，请你原谅我们。’我是在晚上去的墓地，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人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房子上，刻在木头上、篱笆上，有的还把名字刻在了马路上。”

“士兵们大肆屠杀我们的狗。他们用枪瞄准它们，然后开枪射击。啪——啪——啪！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听那种活生生的惨叫声。”

“我是集体农庄里的生产队长，当年45岁。我为人们感到难过。我们曾经带着我们的鹿去莫斯科参加展览，是集体农庄派我们去的。我们带回了一枚别针和一张红色的证书。人们用充满敬意的口吻和我说话。‘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耶维奇。’而现在，我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老头，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死在这儿。有个女人会来给我送水，他们会来给我点炉子。我为人们感到难过。一天晚上，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女人从地里回来，一边走一边唱歌。我知道他们什么也没得到，最多在发工资的日子里得到几根木棍。可是，他们依旧会唱歌……”

“哪怕它已经被辐射污染了，这里也是我的家。再也没有其他地方会需要我们。就连小鸟都热爱自己的巢穴……”

“我会告诉你更多事情：我住在我儿子家，他家在七楼。我走到窗边，向下看，两只胳膊紧紧地抱在胸前。我觉得我听到了马的嘶鸣声，还有公鸡的打鸣声。我感觉糟糕透了。有时候，我会梦到自家的院子：我把奶牛拴好，然后不停地给它挤奶、挤奶，直到我从梦中惊醒。我不想起床。我的心还在那儿。有时候，我住在这儿，有时候我会回那儿去看看。”

“白天，我们住在自己的新家里，到了晚上，我们就能回家——在梦里。”

“这里的冬天很长。我们会围坐在火边，有时候，我们会默默地数数：都有谁死了？”

“我的丈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他什么也没说，我和他说话，他也不理我。他疯了。我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回到他床边：‘老头，你感觉怎么样？’听到我的声音，他微微抬起眼睛，看我一眼。他的情况已经好多了。对我而言，只要他还在这所房子里就行。当一个人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能哭。否则，你就会扰乱他离去的步伐，使他不得不挣扎着多活一些时候。我从壁橱里拿来一根蜡烛，放

在他手心里。他握住了它，他还在呼吸。我看到他的眼睛已经变得有些浑浊。我没有哭。我只对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和我们的女儿，还有我亲爱的妈妈打个招呼吧。’我祈祷我们能一起离开。我希望能够有神灵听到我的这一祈祷，但是他没有让我死。我还活着……”

“女孩们，不要哭！我们总是冲在第一线。我们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们从残酷的战争中活了下来，也挺过了严酷的斯大林时期。如果不是因为我始终微笑着面对一切，不断地安慰自己，我早就上吊自杀了。”

“我妈曾经教过我，仅此一次——你可以拿一张肖像画，把它倒过来，在墙上挂三天。无论你在哪儿，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我有两头奶牛、两头小牛、五头猪，还有一些鹅和鸡。我养了一条狗。我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围着院子转圈。苹果，好多的苹果！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一切就像那些牲口一样，全都不见了！”

“我冲洗了房子，擦净了炉子。临走前，你需要放一些面包和一些盐在桌子上，还要放一个小盘子、三把勺子。一把勺子代表生活在这个房子里的一个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来。”

“因为受到了辐射，公鸡的鸡冠都变成了黑色，不再是原先的红色。你不能做奶酪。我们过了一个月没有奶酪也没有干酪的日子。牛奶不会变酸——牛奶全都凝固成了粉末，白色的粉末。这全都是因为辐射的缘故。”

“我的院子受到了辐射的污染。整个院子都变成了白色，就是那种白得不能再白的白色，看上去就像是覆盖了一层东西。一大块一大块的东西。我想，这些辐射大概是有些人从树林里带回来的。”

“我们不想离开。男人们全都喝得烂醉，他们连滚带爬地钻到了汽车下面。村里的负责人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地走访，哀求人们离开。当时，人们接到的命令是：‘不准带走你们的东西！’”

“整整三天，那些牛没有喝过一滴水，也没吃过一点东西。这就是事实！村子里来了一名报社派来的记者。那些挤奶女工一拥而上，他差一点就被她们打死了。”

“那个长官带着他的士兵，在我的房子旁边走来走去，试图想恫吓我：‘快出来，不然，我们就放火烧了这栋房子！男孩们，准备动手！把瓦斯枪递给我！’当时，我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手紧紧地抓着一张毯子，一手则拿着一个枕头。”

“在战争年代，你常常会整晚整晚地被外面的枪声吵得睡不着。我们在森林里挖了一个洞，他们则在外面不停地轰炸。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烧光了——不仅仅是房子，还有院子、田地和樱桃树，一切都烧光了。当时我们想，只要没有战争，怎么样都行。这也正是我所害怕的。”

“他们问美国的广播公司：‘切尔诺贝利还有可能长出苹果吗？’‘当然，但是你们必须首先把核反应堆埋得足够深。’”

“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新家，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家。可是，你知道吗，七年来，我们没有在这个家里钉过一个钉子。这不是我们的家。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我的丈夫一直哭，一直哭。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开着集体农庄的卡车，拼命地干活，等待星期天的到来。当星期天真的来临时，他又一个人靠在墙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们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愚弄，我们哪儿也不搬。这里没有商店，也没有医院，还没有电。月光下，我们围坐在一盏煤油灯旁边。可是，我们就喜欢这样。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

“在城里的公寓里，我的儿媳妇一直跟着我，擦拭我碰过的门把手和椅子。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用我的钱买的——所有的家具，还有日古力汽车——全都是用政府赔偿给我的抚恤金买的。政府也因此而夺走了我的房子和牛。只要这笔钱一用完，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

“我们的孩子从我们这儿拿走了一些钱。剩下的则全部被通货膨胀抢走了。政府征收了我们的房子，然后赔给我们一笔钱。你可以用这笔钱买一公斤上等的糖果，但是现在，这些钱很有可能已经不够了。”

“我在外面走了两个星期。我一直都带着我的牛。他们不准我进家门。我就睡在树林里。”

“他们都很怕我们。他们说我们有传染性。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们？难道他疯了吗？我们不能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我们永远都不能再按照他所规定的方式那样生活。这就是人们会彼此残杀的原因。”

“我的孙子们会在夏天时到我这儿来看我。第一年夏天，他们没有来，他们全都很害怕。但是现在，他们来了。他们还给我带来了食物。‘奶奶，’他们说，‘你读过《鲁滨孙漂流记》吗？’他和我们一样，也是独自一人生活，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带来了半捆火柴，还有一把斧子和一把铁锨。现在，我不仅有猪油，还有鸡蛋和牛奶——它们

都属于我。我唯一缺少的东西就是糖——地里长不出糖来。但是，我们拥有自己想要拥有的土地！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100公顷的土地上随意种植农作物。不受政府的限制，也不受任何领导者的约束。没有人能够阻止你。”

“那些猫也跟着我们一起回来了，还有狗。我们一起回家了。士兵们不让我们进屋。我们就组成了一支队伍与他们对抗。于是，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穿越树林来到这里——就像当年的游击队。”

“我们不需要政府为我们提供任何东西。别管我们，让我们独自生活——这是我们的全部要求。我们不需要商店，也不需要巴士。我们可以走路去买面包——去20公里外的面包店。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别管我们。我们自己会生活得很好。”

“我们一起回来了，我们三个家庭一起回到了这儿。这里已经被洗劫一空：炉子里一片狼藉，窗户玻璃被砸得粉碎，他们甚至还把门都拆掉了。电灯、电灯开关，还有电源开关他们把能拿走的东西都带走了，什么也没留下。我们用自己的双手让一切恢复原状。不然，我们又能怎样呢？”

“当野鹅开始尖叫时，这就意味着春天来了。时间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岁月的痕迹，而我们则坐在空无一物的房子里。至少屋顶还是坚固的。”

“警察冲着我们大吼大叫。他们开着汽车闯进村子，而我们则一窝蜂似的躲进树林里，就像当年我们对付德国人一样。有一次，他们带来了检举人，他对我们大喊大叫，软硬兼施，他们甚至打算以第十法案起诉我们。我说：‘就让他们把我关进监狱里去吧。我在里面待一年就出来了。出来后，我还会回到这里。’他们的工作就是冲着我们大喊大叫，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安静。我有一枚勋章——我曾经是集体农庄里效率最高的收割员。而他竟然想用十号法案来恐吓我们。”

“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我的房子。我要回去：在花园里种地，或是把床铺好。每一次，我都有新的发现：一只鞋，或一只小鸡。而且在梦里，所有的事物都井然有序，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很快就会回家……”

“晚上，我们向上帝祈祷；白天，我们向警察祈祷。如果你问我：‘你为什么要哭？’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感到很幸福。”

“我们经历这一切，并且活了下来……”

“我去看病。‘亲爱的，’我说，‘我的腿不能动了，而且关节很疼。’‘老奶奶，你需要放弃自己的奶牛。从它身上挤出来的牛奶是有毒的。’‘噢，不，’我说，‘我的腿疼得厉害，我的膝盖也很疼，但是我不会放弃我的奶牛。它养活了我。’”

“我有七个孩子。他们全都住在城市里。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我开始感到有些孤单，于是，我就坐在他们的照片下。偶尔，我也会说说话，和自己说话。我自己粉刷了房子。粉刷这栋房子总共用了六罐油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养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的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现在，我独自一个人生活。”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头狼。它就站在那儿，我站在它对面。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后来，它向道路的一侧跑去，我立刻也扭头就跑。当时，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吓坏了。”

“所有的动物都怕人。如果你不碰它，它就会围着你转圈。在过去，当你走在森林里的时候，如果你听到人的声音，你就会顺着声音跑过去。现在，人们互相躲着对方。上帝救了我，他让我在森林里没有遇到任何人！”

“《圣经》上所写的一切都将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圣经》中的文字也成了我们集体农庄和戈尔巴乔夫的真实写照。一个生来就带有领导人胎记的领袖将会出现，而一个浩大的王国也难逃覆灭的厄运。审判日终将到来。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会死去，只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人能够活下来。当他在地上发现人的脚印时，这个人感到十分高兴！然而，留下脚印的不是和他一样的人，而是他自己！”

“我们有一盏灯用来照明。那是一盏煤油灯。啊哈，那些女人想必已经告诉你了。如果我们猎杀了一头野猪，我们就会把它拖进地下室，或是自己动手把它埋起来。埋在地下的肉能够存放三天。我们还自己酿伏特加。”

“我有两袋盐。没有政府，我们一样能过得很好！我们有足够的圆木——树林就在我们身边。房子里很暖和。煤油灯已经点亮。这真棒！我有一只山羊、一个孩子、三头猪、14只鸡。还有土地和青草——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井里有水。最重要的是，我们享有自由！我们都很开心。再也没有什么集体农庄了，我们和周围邻居的关系密切而融洽。我们还需要再买一匹马，除此以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了。只要再买一匹马就行。”

“这是一位记者曾经说过的话：我们不仅仅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们等于回到了一百年前。我们用锤子来收割成熟的庄稼，用镰刀来割草。我们直接在沥青马路上碾麦子。”

“战争年代，他们放火烧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只能住在地下或碉堡里。他们杀死了我的一个兄弟和两个侄子。我们失去了17位亲人。我的妈妈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有一位年迈的老太太穿梭于各个村庄之间，四处捡东西。‘你正在服丧吗？’她问我妈妈。‘不要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悲哀了。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给予了别人，这样的人是神圣的。’为了我的祖国，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唯独不愿杀戮。我是一名教师，我教育我的学生们要爱其他人。我告诉他们：‘最终取得胜利的总是美好的事物。’孩子们还很小，他们的灵魂都很纯洁。”

“切尔诺贝利事件就像一场超越所有战争的战争。你根本就无处可藏。无论是地下、水下，还是空中，你都无处可藏。”

“我们马上就关掉了收音机。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的生活很平静。我们不会感到沮丧。人们来到这儿，给我们讲各种故事——战火已经蔓延到了各个地方，有的说什么社会主义已经终结，我们现在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沙皇时代又回来了。这都是真的吗？”

“有时候，野猪会闯进我们的花园，有时候闯进来的是狐狸。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人的踪迹。到这儿来的只有警察。”

“你应该去看看我的房子。”

“还有我的。我们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过客人了。”

“我双手抱胸，祈祷道：亲爱的上帝！警察已经来过两次了，他们砸坏了我的炉子，把我拖上了一辆拖拉机，带我离开了这儿。但是，我又回来了！他们应该让人们进来——他们全都跪在地上哀求他们。他们将我们的悲哀扩散到了全世界。现在，回来的只有死人。他们只允许死了的人回到这里。活着的人只能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过树林，偷偷地回家。”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回来收割粮食。情况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地里的粮食收回来。警察列了一个清单，单子上列的是经他们许可能够回来的人的名字，但是未满18岁的孩子一律不准回去。人们都来了，当他们站在自己的房子旁边时，他们简直高兴坏了。他们站在自己院子里的苹果树下。一开始，他们会在墓地里号啕大哭一番，阵后，他们回到自己的院子里，默默地流泪、祈祷。他们留下了

许多蜡烛。他们把蜡烛挂在自己的篱笆上，就像当初他们在墓地的小篱笆上挂满蜡烛，哀悼逝者一样。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在家里留下一个花圈，然后在大门上挂一条白色的毛巾。一位年纪大的老太太宣读祷文：‘兄弟们，姐妹们，请大家耐心一点！’”

“人们带着鸡蛋和面包卷，以及任何他们能带去的东西前往墓地。每个人都坐在自己亲人的墓边。他们轻轻地呼唤自己的亲人：‘妹妹，我来看你了。你吃点东西吧。’或是说：‘妈妈，亲爱的妈妈。爸爸，已经去世的爸爸。’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呼唤，将远在天堂的亲人的灵魂呼唤下来。有些人的家人今年才刚刚去世，这些人往往会哭着呼唤亲人的名字，而那些亲人已经去世多年的人们则通常不会哭泣。他们会和去世的亲人聊天，回忆往事。所有的人都会祈祷，就连那些不知道该如何祈祷的人都加入到了祈祷者的行列中。”

“只有到了晚上我才不会哭泣。你无法在夜晚哀悼死者。太阳下山后，我便停止了哭泣。噢，上帝，请你记住他们的名字，还有他们的灵魂，愿你的国降临。”

“如果你不玩，你就输了。市场里有一个卖大红苹果的乌克兰女人。‘快来买苹果！切尔诺贝利的苹果！’有人告诉她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苹果做广告，因为没有人会买那儿的苹果。‘别担心！’她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买。有的人买回去是为了孝敬自己的婆婆，有的人则是为了讨好自己的老板。’”

“有一个人，他出狱后就回到了这里。他是被特赦放出来的。他就住在隔壁的村子里。他的母亲已经死了，他们家的房子也被烧掉了。他来找我们：‘女士，请给我一些面包和猪油。我可以为你劈柴火。’我答应了他。”

“整个国家都乱成了一团——而人们又回到了这里。他们背着其他人来到了这儿。有的甚至是犯了法的罪犯。他们独自住在这儿，彼此间就像陌生人。他们脾气粗暴，你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友善的光芒。如果他们喝醉了，他们很有可能就会放火烧东西。每天晚上睡觉时，我们都会在床下面放一把斧子或干草叉。我们还在隔壁的厨房里放了一把锤子。”

“春天时，这里的狐狸就像得了狂犬病一样，彻底失去了控制——当它们发疯时，这些狐狸也会变得很脆弱，十分脆弱。但是，它们不能看见水。这时候，你只须放一桶水在院子里，你就安全了。它们看到水以后自然就会离开。”

“这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望着窗外。当然，你还可以祈祷。过去，社会主义曾一度取代了上帝，但是现在，这里只有上帝。所以我们祈祷。”

“我们这代人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奉献了一生。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我在游击队里打过一年仗。当年我们打败德国人的时候，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把我的名字刻在了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上：阿特尤申科。”

“战争开始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蘑菇和浆果。你相信吗？就连土地都感到灾难已经降临。那是1941年。我永远都不会忘了那一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战争年代时的情景。有传闻说，他们会带来所有的战俘，如果你从中认出了自己的家人，你就能把他带走。所有的女人都跑来了！那天晚上，有些女人带着自己的男人回了家，有些人则带走了其他男人。但是，这其中有一个无赖……他过着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他告诉指挥官，我们收留了乌克兰人。瓦斯科、萨什科。第二天，德国人开着摩托车冲进了村子。我们哀求他们，我们跪在地上恳求他们，可是德国人还是把他们带出了村子，然后用机关枪杀死了他们。九个男人，而且他们都还那么年轻。他们全都是好人！瓦斯科、萨什科……”

“管事的人来了，他们不停地大喊大叫，可是我们装聋作哑。我们经历了一切，最后活了下来……”

“可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我想了很多。在墓地里，有的人会大声地祈祷，有些人则始终保持沉默。有些人说：‘黄土地，请你裂开一条缝。黑夜啊，请你睁开眼。’森林也许会开眼，但是沙子永远不会。我轻声问道：‘伊凡，伊凡，我怎么能活着呢？’可是，他并没有回答我——无论是有声的答案，还是无声的，我都没有听到。”

“我并没有需要为之哭泣的人，所以我就为所有人哭泣。我为陌生人而哭。我要走进坟墓，我要和他们说话。”

“我什么人都不怕——不怕死人，也不怕动物，我谁都不怕。我的儿子从城里来，我的所作所为令他十分生气：‘你为什么要坐在这儿？要是那些强盗冲进来杀了你怎么办？’可是，他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房子里有一些枕头。在一个简单的房子里，枕头就是你的主要家具。如果小偷想进来，就在他刚把头从窗子里伸进来的那一刻，我就会用斧头让他人头落地。这里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也许，这里根本就没有上帝，或者，这里有其他神灵，但是这里住着一些人，

而我还活着。”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什么会爆炸？有些人说，这全都是科学家们的错。他们从上帝的手里抢面包，而现在，上帝在天上哈哈大笑。我们却成为了科学家们的替罪羔羊。”

“我们住得一点都不好，从来就不好。我们过得并不太平。我们总是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一切就像回到了打仗之前，他们到我们这儿来抢人。他们开着黑色的汽车冲进村子，从地里拖走了三个男人，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们心中总是充满了恐惧。”

“可是现在，我们自由了。近年的收成很好，大丰收。我们过着男爵一样的富裕生活。”

“除了一头奶牛，我已经一无所有。假如他们不发动另一场战争，我愿意把这头奶牛上缴。我恨透了战争！”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一场超越一切战争的战争——切尔诺贝利。”

布谷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喜鹊也啾啾地直叫唤，玫瑰花开得异常灿烂。它们还能繁殖下一代吗——谁知道呢？一天早上，我透过窗户，向院子里望去，几只野猪正在拱地。它们全都是野生的。你可以让人在某个地方重新定居，但是你却不能限制麋鹿和野猪的生活范围。水也从来都不会接受堤岸的束缚，它会沿着土地四处流淌，一直流到地下。

“我很疼，姑娘们。哦，真的很疼！让我们保持安静吧。他们会静悄悄地把棺材抬到你的床边。一路上，他们都很小心，尽量不让它碰到门、床等任何东西，以免发出碰撞声。不然，你就必须等到下一个人死。上帝啊，请你记住他们的名字吧。愿你的国降临。请让祈祷者在他们下葬的地方为他们祈祷。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缺——包括坟墓，到处都是坟墓。笨重的卡车正在工作，和它一起工作的还有体积庞大的推土机。那些房子正在倒塌。掘墓者正在卖力地干活。他们埋葬了学校、指挥部和浴池。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但是这里的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人。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没弄清楚：人们还有灵魂吗？如果有，又是哪一种呢？还有，他们是如何适应另一个世界的呢？我的爷爷用了两天的时间才离开这个世界，而我则一直躲在壁炉后，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他的灵魂会从他的身体里飞出来吗？我跑出去给奶牛挤奶——然后，又跑回来，大声地叫他。他躺在那儿，眼睛还睁着，可是他的灵魂已经飞走了。又或者，其实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如

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见面呢？”

“有一位年迈的老太太曾经许诺说，我们都将获得永生。我们祈祷。上帝啊，请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战胜生活中的苦难，坚强地活下去。”

什么是辐射

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一连好几天早上，我们都在自己家的花园和地里发现了一些窒息而死的鼹鼠。谁杀死了它们？这些小动物通常都只待在地下，很少到地面上来活动。它们是被某种东西赶出来的。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我的儿子从戈梅利打来电话：“那些五月金龟子出来了吗？”

“没有。我们什么虫子都没看到，甚至连蛆都看不到了。它们全都藏起来了。”

“蚯蚓呢？”

“如果你能在雨天发现一条蚯蚓，你的小鸡们一定会非常高兴。但是，地里一条蚯蚓也看不到。”

“这就是最初的迹象。如果你既看不到五月金龟子，也找不到蚯蚓，那就意味着你那儿的辐射很强。”

“辐射是什么？”

“妈妈，那是一种能致命的东西。告诉姥爷，你要离开了。你会和我们住在一起。”

“可是，我们还没有给花园播种。”

如果所有人都很聪明，那么，谁来扮演那些愚蠢的角色呢？核电站着火了——是的，着火了。大火只是暂时的，当时，没有人为此而感到害怕。他们对原子能一无所知。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而我们就住在核电站旁边，鸟儿们从核电站飞到我们这儿只有30公里的路程，即便是驾车走高速公路也才不过40公里。对此，我们一直都很满意。你可以买一张车票，然后乘车去那儿——那里什么都有，繁华得就像莫斯科。便宜的萨拉米香肠，商店里总是摆满了肉。无论你想要什么，你都能在那里买到。当时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有时候，我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他们不断地恐吓我们，用辐射恐吓我们。但是，自从有了辐射之后，我们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好了。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看看周围：他们带来了橘子、三种萨拉米香肠，各种物资，应有尽有。最难得的是，他们把这些东西都送到

了村子里！我的孙儿孙女生活在世界各地。最小的那个才刚刚从法国回来，拿破仑曾经从那儿发动了对全欧洲的进攻——“奶奶，我看到菠萝了！”我的侄子和他哥哥带他去柏林看病。当年，希特勒正是从那儿开始构筑他的纳粹王国。这是一个新世界，一切都不同了。难道这些全都是辐射的错？不然，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呢？

辐射是什么？也许，他们曾经在电影展示过它？你见过吗？它是白色的？它是什么颜色的？有人说辐射是无色无味的，还有人说它是黑色的，就像土地一样。如果它真的没有颜色，那么，它就和上帝一样。上帝无处不在，但是你却看不到他。他们威吓我们！苹果还挂在花园里的苹果树上，树叶也都还长在树上，土豆依然在土里，还没挖出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一切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他们在欺骗人民。我妹妹和她丈夫一起离开了，但是没走多远，他们搬到了距离这儿只有20公里路程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儿才住了两个月，结果有一天，他们的邻居跑来说：“你们的牛把辐射传给了我们的牛！它现在越来越虚弱。”“它是怎么传给你们家牛的？”“通过空气，就像灰尘一样。辐射是会飞的。”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童话故事！而我们听到的故事也越来越多。

但是，以下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情。我爷爷是个养蜂人，他养了五巢蜜蜂。足足有两天的时间，那些蜜蜂始终都窝在蜂巢里，不飞出来，你看不到一只蜜蜂。它们在等待。我爷爷并不知道核电站发生了爆炸，焦急的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自然出什么问题了吗？我的邻居是一名教师，他告诉我们蜜蜂的身体体系比人体发达，也更敏感，能够接收到更加细微的信息。所以爆炸刚一发生，它们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响声。当时的广播里什么也没说，报纸上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新闻，但是这些蜜蜂却知道了一切。第三天，这些蜜蜂终于从蜂巢里飞了出来。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黄蜂——我们家门外的走廊上有一个黄蜂巢，从来没有人碰过它，但是就在核电站发生爆炸的那天早上，蜂巢里的黄蜂全都不见了——我们既没有看到一只黄蜂的尸体，也没有看到一只活的黄蜂。直到六年后，这些黄蜂才重新回到了这个巢穴里。辐射——它令人们望而生畏，也让动物们纷纷退避三舍，包括天上的小鸟在内。就连那些树都对此心存畏惧，只不过，它们只能保持沉默，无法开口说话。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任何一个人都在劫难逃。不过，那些科罗拉多甲虫并没有藏起来，它们像以往那样在田地里四处徘徊，啃噬我们的土豆，把一株土豆啃得只剩下叶子。它们已经习惯了有毒的食物，就像我们。

然而，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就会想起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每个家庭都有人因此而死亡。住在河对岸那条街上的所有女人都成了寡妇，你在那条街上看不到一个男人。所有的男人都死了。在我生活的这条街上，只剩下了我爷爷和另一个男人。上帝把男人们先带走了。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原因。不过，你想一想——假如男人们都活了下来，但所有的女人都死了，只留下他们独自生活，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会喝得酩酊大醉，噢，他们一定会变成酒鬼！为了暂时忘记悲伤，他们只能借酒浇愁。现在，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女人都十分空虚，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女人甚至说，自己的女性特征已经几乎完全消失殆尽。无论是年迈的老太太，还是年轻的小姑娘，情况都是如此。她们中的一些已经错过了生育年龄，而有些人则已经无法受孕。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都会无比悲伤——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就像一切都从未发生过一样。

我还能说点什么呢？你必须要活下去。没了，就这些。

哦，我还有一些话要说。在此之前，我们全都是自己搅拌黄油，自己做黄油、乡村奶酪和普通奶酪。我们还会自己做乳面团。城里的人们也吃乳面团吗？做乳面团其实很简单：你把水倒进面粉，充分地拌匀，这样你就能得到一些细碎的小面团，然后你再把这些面团放进盛满开水的容器里，把加入面团的水烧开，再倒一些牛奶进去，乳面团就做好了。妈妈向我演示了制作乳面团的流程，并且对我说："孩子，你一定要学会它。我就是从我妈妈那里学到这一方法的。"我们喝的是加入了白桦树和枫树树汁的果汁。我们把豆子放进烤箱里烤熟。我们还自己做加了糖的蔓越橘。战争年代，我们四处收集扎手的荨麻和鹅掌。因为饥饿，我们得了水肿病，看起来反倒比以前胖了不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活了下来。那时候，树林里长着许多浆果和蘑菇，可是现在，它们全都不见了。我曾经一直以为自己菜锅里的食物永远都不会改变，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现在，你不能喝牛奶，也不能吃豆子。他们不允许你吃任何蘑菇或浆果。他们说所有的肉类在烹饪前都必须在水里浸泡三个小时；他们说，当你煮土豆的时候，前两次烧开的水都必须要倒掉。是啊，你不能和上帝作对。你必须要活下去。他们恐吓我们，就连我们的水也不能喝了。可是，没有水，你还能做什么呢？每个人的体内都有水。也许，水就是永恒？水是所有生命的源头。你能问谁呢？没有人能回答你。人们向上帝祈祷，但是从来不会向上帝提问。你需要做的就是必须活下去。

一首无言的歌

我会跪下来求你——求求你，请你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安娜·萨什科。她以前就住在我们这个村子里，住在科祖斯基。她名叫安娜·萨什科。我会告诉你她的长相，你可以把我们说的都记下来。她一生下来就是个哑巴，而且还有一点驼背。她一直一个人住，现在已经60岁了。转移时，他们把她送上了一辆救护车，然后就把她送走了。她没上过学，不会写字，所以我们从没收到过她的信。他们把那些孤寡老人和病人都送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他们把这些人藏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请你把这些都写下来……

整个村子的人都为她感到难过。我们一直把她当成是一个小姑娘，悉心地照顾着她的饮食起居。村里的人会主动地帮她劈柴，有的人则会定期给她送牛奶，还有人会一整夜都坐在她的房子里，陪着她，为她点炉子。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住了两年，然后才重新搬回到这里，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请你告诉她，她的房子还在，屋顶和窗户也全都完好无损。不管她的房子里少了什么东西，或是有什么东西坏了，我们都能帮她修好，让一切恢复原状。如果你甚至只需要把她的地址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她住在哪儿受苦，我们就会循着地址找到她，然后把她带回来。这样一来，她就不会在痛苦和悲哀中死去。我求求你一定要找到她。一个无辜的灵魂正在受苦，而她的身边全都是她不认识的陌生人……

还有一件关于她的事情，我刚才忘了告诉你。当她觉得难受或不舒服的时候，她就会唱歌。她唱的歌没有歌词，只有曲调——她的声音。她不会说话。当她觉得难受或不舒服的时候，她就会唱：“啊——啊——啊。”她的歌声会让你心痛、让你难过。

玛丽亚·沃尔楚科
邻居

关于祖国

独白者：K.一家——妈妈和女儿，以及一个自始至终没说过一个字的男人（女儿的丈夫）。

女儿：

一开始，我没日没夜地哭。我只想做两件事：大声地哭出来，和人说话。我们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我们离开时，那里正在打仗。

我现在其实不应该谈论这些。我还有期待——我怀孕了。但是，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有一天，他们走上汽车，检查我们的护照。他们看上去和普通人一样，只不过他们全都配备了自动武器。他们逐一翻看手中的文件，然后把一些男人赶下了车。紧接着，就在车门旁边，他们开枪杀死了那些男人。他们甚至都没有把那些男人带到一旁去，躲开众人的视线。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目睹了一切。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两个男人拖出去，其中的一个还那么年轻、那么英俊，他用塔吉克斯坦语和俄语冲着那些人大声喊叫。他说他的妻子才刚刚生下一个孩子，他家里还有三个幼小的孩子需要照顾。可是，那些人听了立刻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其实也很年轻，非常年轻。看起来，他们和普通人真的毫无区别，除了他们身上带着自动武器。他跪了下来，逐一亲吻他们的鞋子。车厢内一片寂静，全车的人都没有说话。车子启动了，随后，我们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射击声。当时，我害怕极了，根本不敢往后看。（她开始哭泣。）

我真的不应该谈论这些。我马上就要有孩子了。可是，我会告诉你一切，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不要把我的姓写出来。我的名字叫斯威特拉娜。我还有亲人在那里生活，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杀了他们。以前，我还以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再遭遇战争。我想，我们亲爱的祖国这么大，我们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时代，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之所以会过这种贫瘠的生活，那是因为我们曾经遭受过一场惨烈的战争，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人民才会受苦受难，但是现在，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谁再敢侵犯我们。没

有人能够打败我们！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互相残杀。这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这次的战争不同于我爷爷记忆中的战争——他曾经英勇无畏地抱着刺刀，冲向德军。现在，邻居们互相开枪射击，那些曾经一起上学的男孩们也开始互相残杀，并且强奸上学时就坐在他们身边的女孩。所有的人都疯了。

我们的丈夫都保持沉默。这里的男人们全都默不作声。他们不会和你说一个字。当他们离开时，人们冲着他们大叫，说他们像女人一样临阵脱逃，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简直就是胆小鬼。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呢？面对同胞开不了枪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我的丈夫是一名塔吉克斯坦人，他本应该冲在前面，像其他塔吉克斯坦人一样去杀人。可是，他说："我们走吧。我不想加入战争。我也不需要自动枪。"那里是他的国家，但是他离开了，因为他不想杀死另一个塔吉克斯坦人——和他一样的塔吉克斯坦人。但是，在这里，他十分孤单，他的兄弟还在塔吉克斯坦，还在那里拼杀。其中有一个已经在厮杀中丧生了。他的妈妈还住在那儿，还有他的姐妹们。我们坐火车离开了杜尚比，火车上的玻璃都是破的，车厢里没有暖气，很冷。没有人对火车开枪，但是人们不断地向火车扔石块，石块砸碎了车窗玻璃。那些人大叫："俄国佬，滚蛋！该死的占领者！休想再侵犯我们！"可是，他是一名塔吉克斯坦人，却不得不忍受这些谩骂。而且，我们的孩子也听到了这些话。我们的女儿已经上一年级了，她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孩，他也是一名塔吉克斯坦人。她从学校回来后问我："妈妈，我是什么人，塔吉克斯坦人，还是俄罗斯人？"你该怎么向她解释呢？

我不应该谈论这些……可是我会告诉你的。帕米尔的塔吉克斯坦人正在和库利亚布的塔吉克斯坦人作战。他们都是塔吉克斯坦人，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信奉相同的《古兰经》，但是库利亚布人杀死了帕米尔人，帕米尔人也从来不对库利亚布人手下留情。一开始，他们冲进城市里的广场，众人围在一起叫嚷、祈祷。我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也去了。我问其中的一个老人："你们抗议是为了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向国会提出抗议。他们告诉我们这一届的国会主席是一个大坏蛋。"没过多久，广场上就变得空无一人，然后他们就开始射击。突然之间，这个国家就彻底变了样，便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我不认识的国家。一切都来自于东方！在那之前，我们以为根据苏联法律，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里埋葬了不计其数的俄罗斯人，但是再也没有人会为他们而哭泣。人们在俄罗斯人的墓地里放牧，饲养家禽。年迈的俄罗斯老人四处游荡，在垃圾堆里

翻找食物……

当时，我还是一名护士，在产房里工作。那天，我正好值夜班。有一个女人正在产房里生孩子，生产过程并不顺利，她疼得大声叫唤——突然，一个老太太跑了进来，她既没有戴手套，也没有穿医生的制服。发生了什么事？她怎么可以这样就闯进产房？“女孩们，外面来了好多人！他们全都戴着面具，手里还拿着枪。”就在这时，他们闯了进来：“把药给我们！还有酒！”“这里没有你们要的药，也没有酒。”他们一把将医生顶在墙上——就在产房里！就在这时，那名正在生产的女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我们的耳边随即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孩子出生了！我略微侧了侧身，向产床望去。现在，我已经想不起那究竟是个女孩还是男孩了。他才刚刚出生，连名字都没有。这时，那些强盗逼问我们：他是什么人？库利亚布人，还是帕米尔人？我问的不是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问的是，他是库利亚布人还是帕米尔人？我们什么也没说。他们开始咆哮：“说，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依旧什么也没说。结果，他们一把抢过那个婴儿——他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待了大约五分钟，最多十分钟的时间——直接将他扔出了窗外。我是一名护士，在此之前，我从没目睹过婴儿的死亡。但是，在这里，在产房里——我现在本不应该回想这些事情。（她开始哭泣。）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你该怎样生活？作为一个女人，你还怎么生孩子？（她大哭起来。）

从那之后，我只要一进入产房就会尽量让自己变得冷血无情。我的血管开始膨胀，对于任何事任何人，我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早晨，我根本就不想起床。（她又哭了。）我会走到医院门前，然后掉头就走。随后，我自己也怀孕了。我根本无法在那样的地方生孩子，所以我们来到了这儿，来到了白俄罗斯的纳洛夫里亚。这是一个安静的小城。什么都别问我。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你。（哭声。）等一等，我想要你知道的是，我不怕上帝，我只害怕人类。起初，我们问人们：“什么是辐射？”“看到你们所站的位置了吗？辐射就在这儿。”那就是说，辐射无处不在。（哭声。）这里有许多空房子。人们都走了。他们被吓走了。

但是，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不像当初的塔吉克斯坦一样，令我害怕，令我我感到恐慌。我们离开了自己的故土，我们不属于任何国家。德国人最终都回到了德国，鞑靼人在获得允许后也回到了克里米亚，可是没有人需要俄罗斯人。我们还能希冀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等什么？俄罗斯从来都不管自己的人民，因为她太大了，她的疆土简直无边无际。坦白说，我并没有把俄罗斯当成自己的祖国。我们是在完

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苏联才是我们的祖国。现在，你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拯救自己。不过，至少这里没有人端着枪跑来跑去，这就很好了。在这里，他们给了我们一栋房子，还为我丈夫提供了一份工作。我们给家里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他们昨天刚刚抵达这里，再也不回去了。他们抵达这里时已经是晚上，他们不敢走出火车站，于是他们就在车站里待了一夜——坐在他们的箱子上。他们也不让孩子跑出车站。后来，他们看到：人们在街道上散步，开心地哈哈大笑，有人还抽着烟。街上的人们为他们指出了我们家所在的街道，然后一直把他们送到我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地方，这种和谐的正常生活早已不复存在。在这里，早上，当他们起床后，他们走进商店。在商店里，他们看到了黄油和奶酪——它们就摆在商店里。于是，他们买了五瓶奶酪，然后站在那儿，一口气喝光了所有的奶酪——这都是他们自己告诉我们的。人们惊讶地望着他们，以为他们疯了。但是，他们已经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没有见过黄油或奶酪了。在塔吉克斯坦，你根本就买不到面包。那里正在打仗。那些没有到过那里、目睹过当地惨状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切。

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已经死了。我将会在没有灵魂的情况下生下我们的孩子。住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少，许多房子都空了。我们就住在一片树林旁边。当这里住满了人的时候——就像火车站，熙熙攘攘——我并不喜欢这里。我也不喜欢那些充满战争的地方。（说到这儿，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她的独白因此而结束。）

母亲：

战争——我只能谈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为什么要来切尔诺贝利？因为没有人会把我们从这儿赶走。因为没有人会把我们驱逐出境。现在，这里不属于任何人。上帝接管了这里。人们都走了。

在杜尚比，我是火车站的副站长。除我以外，车站还有另外一名副站长，他也是一名塔吉克斯坦人。我们的孩子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假期时，我们，两家人还一起外出度假：新年假期、五一劳动节。我们一起喝啤酒，一起吃泡芙。他叫我“妹妹，我亲爱的妹妹，俄罗斯妹妹”。有一天，他走进来——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办公——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冲着我嚷嚷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滚回你的俄罗斯去，啊？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想，当时我一定是疯了。我跳起来，冲着他大叫一声。

“你的外套是从哪儿买的？”

“列宁格勒。”他说。我的话让他有些惊讶。

“那你还不把这件俄罗斯外套脱下来，你这个狗娘养的！”刚一说完，我就把那件外套从他身上扒了下来。“你头上的帽子是从哪儿来的？你不是曾经向我吹嘘过，这是他们从西伯利亚给你寄来的吗？你给我把它摘下来！还有这件衬衣！裤子！这些都是在莫斯科加工出来的！它们全都是俄罗斯货！”

我扒光了他身上的衣服，只剩下内衣内裤。他身材高大，我站起来只到他的肩膀，但是我扒光了他的衣服。人们已经围了上来。他大声叫道：“离我远一点，你这个疯子！”

“不！把这些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这些全都是俄罗斯人的！我要把它们全都带走！”

当时的我已经近乎疯狂。

“把你的袜子给我！还有你的鞋！”

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所有的火车都超载了。人们在四处奔走。许多俄罗斯人都离开了——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像逃难一样离开了塔吉克斯坦。不过，还有一名俄罗斯人没有走。深夜两点，我目送着一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离开了车站，大厅里仍然有许多从库尔干秋别赶来的孩子，他们没能挤上火车。我掩护了他们，我刚把他们藏起来，随后就有两个带着枪的人来找我。

“噢，孩子们，你们怎么进来了？”说话的同时，我的心也紧张得怦怦直跳。

“这全怪你自己。你这儿的大门全都敞开着。”

“我刚送走了一列火车，还没来得及关门。”

“这里的那些孩子是什么人？”

“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从杜尚别来的。”

“也许，他们来自于库尔干，你说呢？他们是不是库利亚布人？”

“不，不是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

听了我的话，他们就离开了。如果他们打开大厅的门，那些孩子会怎样？他们曾经……还有我，刚才他们在这儿的时候，他们完全可

以一枪打烂我的脑袋。在这里，只有一个政府——带枪的人。清早，我把那些孩子送上了一辆开往阿斯特拉罕的火车。我让列车长像以往运送西瓜一样，把这些孩子送走，我还叮嘱他千万不要开车厢门。（这时，她陷入了沉默。随后，她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人更可怕的东西吗？（说完，她又陷入了沉默。）

当我已经来到这儿以后，有一次，我正在街上行走，走着走着，我开始不断地回头看，因为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想到死亡。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我都会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刚刚洗好的衬衣、漂亮的裙子，还有干净的内衣裤，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我被杀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现在，我可以一个人穿越树林，我谁都不怕。树林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灵魂。我在那里面散步，一边走一边想：我所经历的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还是这一切都只是幻觉？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猎人。他们身上背着来复枪，牵着狗，还带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他们也有枪，但是他们和那些人不同，他们不会向人开枪射击。如果我听到枪响，我知道那是他们正在猎杀乌鸦或追赶兔子。（沉默。）因此，在这里，我一点也不害怕。土地和水不会令我感到害怕。我只害怕人。在那里，人们会跑到市场里，花100美元买一支自动步枪。

我记得有一个人，他也是塔吉克斯坦人。我亲眼看着他举着枪，跟在另一个人身后。他在追击另一个人！他跑步的方式和他呼吸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我能够感觉到他想杀了那个人。但是最终，那个人还是跑掉了。他躲了起来。这个人只得打道回府，在路上，他从我身边经过，问道：“女士，这附近哪儿有水喝？”他看起来是那么自然，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车站里有一桶水，我指了指水桶的位置，然后问道：“你为什么要追那个人？你为什么要杀人？”听了我的话，他看上去显得有些惭愧：“拜托，女士，请不要那么大声。”可是，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当时他们有三个人，或者说哪怕只有两个人，他们都定会把我死死地按在墙壁上。当你们单独面对时，你还是能和对方讲道理的。

我们从杜尚比到了塔什干，但是这里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直到抵达明斯克。根本就买不到火车票——一张都买不到！要想坐上飞机，你必须行贿，不然就会麻烦不断，而他们索取贿赂的方式也十分巧妙：这太重了，抑或是这里面的容积超标了，你不能带这个，你必须扔掉那个。他们让我称了两次行李，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立刻给了他们一些钱。“你早就该这么做了，而不是和我们争论不休。”一切竟然如此简单！我们的集装箱重

达两吨，他们让我们把它卸下来：“你将会穿越一片战争地带，也许，你这里面藏有一些武器？或者，这里面有大麻？”由于他们的阻拦，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个晚上。最后，我决定去见站长，但是在等候室里，我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人，她向我解释了一切：“在这里，你哪儿也去不了。你可以向他们要求公平对待，与此同时，他们会把你的集装箱扔到野地里，然后拿走你的全部行李。”既然如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挑拣自己的行李：衣服、一些床垫、一台旧冰箱、两箱子书。“你要托运这些珍贵的书吗？”我们看了看——这里面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们都笑了。“你们有多少台冰箱？”“只有一台，而且那一台也坏了。”“你们怎么没有报关文书？”“我们怎么知道还要这个？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战争，也是我们第一次逃难。”在那一刻，我们顿时就失去了两个祖国——塔吉克斯坦和苏联。

我穿越树林，边走边想。其他人总是在看电视——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近况如何？可是，我不想看电视，也不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我们曾经过着另一种生活……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那时候，我是其他人眼中的重要人物，我有军衔，我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里的陆军中尉。在这里，在成为市政委员会的清洁工之前，我一直失业在家。现在，我的工作就是冲洗地板。我已经适应并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改变它，迎接另一种生活。有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为我们感到难过，另一些人则耿耿于怀——“难民们偷走了我们的土豆，晚上，他们偷偷溜进地里，把土豆挖走了。”我的妈妈说过，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当中，人们互相怜悯，更加深切地为彼此感到难过。最近，他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匹疯了的马。它已经死了。在另一个地方，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兔子。没有人杀它们，但是它们都死了。这件事让所有人都感到忧心忡忡。然而，当他们发现一名已经死了的流浪者的时候，大家又突然不担心了。不知为何，这里的人已经开始习惯自己的身边不断有死人出现。

莉娜·M.——她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前，那姿势就像是在照相。她的五个孩子坐在她旁边，还有他们从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的猫，梅捷利察。

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战争中逃难。我们紧紧地抓着自己的东

西，向火车站跑去，这只猫一直跟着我们，于是，我们就收留了它。我们坐了整整12天的火车。最后两天里，我们的粮食只剩下了一些罐装的卷心菜沙拉和一些开水。我们一直守护着大门——手里握着一把铁锹，一柄斧头，还有一把锤子。这样说吧——有天晚上，一些强盗袭击了我们。他们差一点就杀了我们。现在，他们能够为了一台电视机或一台冰箱而杀人。尽管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已经很少听到枪声，但是在当时，当我们从那儿离开时，我们真的有一种逃离战争的感觉。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那里的大屠杀也从未停止过——就在奥什，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相互屠杀对方，不过现在，他们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协议，不再互相攻击。许多吉尔吉斯人都害怕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我们是俄罗斯人。当你排队买面包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冲着你大声嚷嚷："俄罗斯人，滚回去！吉尔吉斯斯坦是吉尔吉斯人的国家！"紧接着，他们就会把你推出队伍，同时大声地斥责你，用吉尔吉斯语说一些诸如"我们自己的面包都不够吃，为什么还必须得养活你们"之类的话语。我不太懂他们的话，我只学了一些简单的词语，从而使我可以在市场里买东西时和他们讨价还价。

我们曾经有一个祖国，但是现在没有了。我是什么人？我妈妈是乌克兰人，我爸爸是俄罗斯人，而我却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生和长大的。长大后，我嫁给了一名鞑靼人。谁能告诉我，我的孩子是什么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我们全都是混血儿，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都是混合了多民族血液的鲜血。在我们的护照上——我和我孩子的护照上——国籍一栏写的都是"俄罗斯"，可是我们并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苏联人！可是，这个国家——这个我出生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那个被我们称之为"祖国"的国家现在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就连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也随着她一起消失了。现在，我们就像一群蝙蝠。我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已经上八年级了，而最小的那个还在幼儿园里。我把他们全都带到这儿来了。我们的国家不存在了，可是我们还活着。

吉尔吉斯斯坦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曾经帮助他们建造了一间工厂，后来，我就在那家工厂里工作。"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这里是属于我们的。"除了我的孩子，他们什么都不准我带走。"这里是属于我们的。"可是，我又属于哪里呢？人们都在逃跑。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加入了逃难的队伍。不，应该说是苏联人。没有人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在等待他们的归来。

我也曾经快乐过。我的五个孩子全都是在关爱中诞生的。他们出生的次序依次为：男孩、男孩、男孩、女孩、女孩。我不想再说了。

我要哭了。（可是，她又补充了几句。）我们会在切尔诺贝利等下去。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切尔诺贝利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国。（突然，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这里的鸟和其他地方的一样，而且这里还有一座列宁的雕塑。（当我们已经走到门口，准备说再见的时候，她又说了一些事情。）一天清早，我的邻居就开始在他们的房子里敲敲打打，拆除钉在窗户上的木板。我看到了一个女人。我说："你们从哪儿来？""车臣。"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说话，只是开始呜呜地哭泣……

人们对我的做法感到十分惊讶，也很不理解，他们经常问我："你为什么要谋杀自己的孩子？"噢，上帝，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令你总是能够坚强地面对未知的明天，你的力量究竟源自于何处？我这样做不是在谋杀自己的孩子，我是在挽救他们。你看看我，我今年才40岁，可是我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他们都对我的做法感到很惊讶，也很不理解。他们说："你会带你的孩子去一个发生霍乱或瘟疫的地方吗？"可是，那就是瘟疫，那就是霍乱。对于切尔诺贝利，他们全都充满了恐惧心理，可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脑海里没有这些可怕的记忆。

邪恶是如何使一个人变聪明，而后升华的

我要逃离这个世界。一开始，我一直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我喜欢那里的一切：那里有很多人，而你只有一个人。后来，我就来到了这儿，这里有自由。

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生活。不要问我关于我生活的事情。我记得自己读过什么书，记得书中的内容，也记得其他人对我说过什么话，可是，我偏偏忘了自己的生活。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做了错事。但是，只要我真诚地忏悔，上帝就会宽恕我所有的罪过。

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幸福的。他本不应该孤身一人。上帝看到亚当很孤单，就给了他一个夏娃。上帝赐予他夏娃是想让他幸福、开心，而不是让他犯错。但是，男人缺乏幸福的能力，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不喜欢黄昏，我也不喜欢黑暗。这条走廊和现在一样，介于光明和黑暗之间。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我在哪儿——以及一切情况如何——不过，这也没关系。我可以活下去，也可以死掉，我都无所谓。男人的生活就像草：茁壮成长，干枯，然后一把火烧尽。我喜欢上了沉思。在这里，你可能会被动物咬死，或是被冻死，两者的概率是均等的。这附近方圆几十公里内都没有人烟。你可以通过禁食和祈祷将魔鬼从你身边赶走。禁食是为了锤炼你的肉体，祈祷则是为了陶冶你的灵魂。可是，我从来没感到过孤单，一个有信仰的男人是永远都不会感到孤单的。我骑着马在周围的村子转悠——过去，我经常能在村子里找到一些意大利面和一些面粉——甚至还能找到一些植物油、水果罐头。现在，我会去墓地——人们会给死去的亲友留下一些食物和饮料。可是，死人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也不会介意。田地里有野生的稻谷，树林里有蘑菇和浆果。这里有自由。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神父写的一本书——“毫无疑问，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因此，这个世界不可能毁灭。”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地承受历史，直到最后”。另一位思想家说——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邪恶并不是一件实际存在的物质。它的出现只是因为善意的缺失，这就好比黑暗会出现只是因为光明消失了”。在这里，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书。现在，你想要找一个空的陶罐、汤匙或叉子也许不太容易，但是要找书一点都不难。到处都是书。有一天，我还找到了一卷《普希金文集》。我还记得那本书里有

这么一句话：“一想到死亡，我的灵魂就会品尝到一丝甜蜜。”是啊，“一想到死亡”。在这里，我一个人住，我常常会想到死亡。我已经渐渐喜欢上了思考。而且，沉默可以帮助你做好准备，迎接未知的未来。人一直和死亡生活在一起，却从来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不过，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这儿。昨天，我把一头公狼和一头母狼从学校里赶跑了，它们就生活在那里。

问题是这个世界真的像现实世界里所描述的那样吗？那些关于这里的话语其实介于人和他的灵魂之间，亦真亦假。

我要说的是，现在，小鸟、树木和蚂蚁——它们和我之间的距离变得前所未有地近。思考时，我也会想到它们。人类令它们心生畏惧，而且也很陌生。但是，我不想屠杀这里的任何生灵。我会在这里钓鱼，我有一根鱼竿，但是，我不会射杀动物，我也从不设置猫腻。在这里，你不会想夺取任何人的生命。

梅诗金王子说：“有没有可能看到一棵树，心中却并不高兴？”是啊……我喜欢思考，但是不管怎样人总是会抱怨，却从来不思考。

关注邪恶有何意义呢？当然，邪恶很重要。罪过不是一种切实存在的物质。但你必须承认它的存在。《圣经》里说：“对于那些行走于光明之中的人而言，这是一条路；对于剩下的人而言，教诲不可或缺。”你抓住一只鸟——或其他任何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听不懂它们的语言，因为它们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别的。是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只能说：周围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

所有靠四条腿行走的动物都注视着地面，头也低垂着。只有人靠两条腿直立行走，从而解放了双手，使得人可以举起手，抬起头注视天空。正是因为如此，只有人才能祈祷，向上帝祈祷。教堂的一位老太太祈祷说：“请宽恕我们每个人的罪过。”然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或士兵，他们谁都不会承认自己有错。他们心想：“我没有需要忏悔的罪孽。我为什么要忏悔呢？”是啊，为什么……

我的祈祷很简单。我为自己祈祷。噢，上帝，我呼唤你！请你倾听我的祈祷！只有邪恶才能让人变聪明，让人升华。当一个人说出如此诚实的充满爱意的话语时，他是多么简单且值得同情啊！即便是哲学家，他所使用的词语也只能近似地表达出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只有祈祷时的语言才能精确地反映出祈祷者灵魂深处的想法。我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噢，上帝，我呼唤你！请你倾听我的祈祷！

还有，人也一样。

我害怕人，但与此同时，我也想见到人。我想遇到一个好人。没错，在这里，你要么做一名四处躲藏的强盗，要么就做一个像我这样的受难者。

你想问我的名字是什么？我没有护照。警察把我的护照收走了。他们还打了我。“你在这附近徘徊是为了什么？”“我没有徘徊——我是在忏悔。”之后，他们狠狠地揍了我一顿。他们用力地敲打我的头。所以，你应该这样写：“上帝的仆人尼古拉。现在，他自由了。”

士兵们的话

二等兵：阿尔焦姆·巴赫季亚罗夫，清理人；奥列格·列昂季耶维奇·沃罗贝，司机兼侦察兵；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古希诺维奇，警察；根纳季·维克托罗维奇·德门耶夫，清理人；维塔利·鲍里索维奇·卡巴列夫斯基，司机兼二等兵；瓦伦丁·科姆克夫，直升机飞行员；爱德华·鲍里索维奇·柯诺克夫，清理人；伊戈尔·里特文，二等兵；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卢卡舒克，盖格操作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列维奇，直升机飞行员；奥列格·列昂纳多维奇·巴甫洛夫上校，警卫团指挥官；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瑞拜克，二等兵；维克托·桑科，清理人；格里戈利·尼古拉耶维奇·科赫尤罗斯特，警察；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申科维奇，上尉；弗拉季米尔·彼得罗维奇·舍维德，警察；亚历山大·米哈列维奇·亚辛斯基

我们军团在收到警报后立刻出发。不过，直到我们抵达莫斯科地铁的白俄罗斯站时，他们才将此行的目的地告知我们。军中有一个人闻讯后当场就表示抗议——我想，他应该来自于列宁格勒。他们告诉他，他们完全可以把他拖上军事法庭受审。指挥官当着我们所有士兵的面，清楚无误地说道："违令者，要么进监狱，要么就地正法。"但是，我的想法和那个人完全相反。我想当英雄，想留下一些英勇事迹。也许，这样的想法很幼稚，但是，我们部队里有我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我们的士兵来自于苏联各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这次的任务有些可怕但不知为何，我们觉得这也很有趣。

于是，他们就把我们送到了那里，他们直接把我们送到了核电站。他们发给我们一些白色的罩衣和白帽子，还有蒙着纱布的手术面罩。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事故现场。我们首先在下面清理了一天，然后又爬到反应堆的屋顶上继续清扫。我们带着铁铲到处走。我们把那些蹿到上面去的人叫做鹤。机器人在这里根本无法作业，它们的系统完全崩溃了。但是我们能够照常工作。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

我们坐车进入了那里——那里有一块标志牌，上面写着：隔离区，限制入内。我从没打过仗，但是进入那里后，我有了一种类似于

打仗的感觉。我该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开始回忆呢？因为某种原因，只要一想起它，我就会想到死亡……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疯狂的狗和猫。它们的行为举止十分怪异：它们没有把我们当成人，一见到我们，它们立刻就跑开了。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想不通它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直到他们让我们开枪射杀它们……所有的房子都被封死了，农用器械被遗弃得到处都是。这真是有趣的一幕场景。这里除了我们和坐在警车上巡逻的警察，一个人也没有。你走进一间房子——房间的墙壁上还挂着照片，但是房子里没有人。各种文件散落在地上：共青团团员证、其他证书及奖状。在一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一台电视机，我们搬走了它，使用了一阵——我们说，我们只是借用而已——但是，我从没见过部队里有人把这里的东西带回家。这是因为首先，一来到这里，你就会有一种感觉，这里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会回来；其次，不管怎样，这里的一切都或多或少与死亡相关。

人们会开车前往核电站——核反应堆的所在地。他们想在那里拍照，然后带回去给家里的人看。他们都很害怕，但也十分好奇：这是什么？我自己是不会去的，我的妻子还很年轻，我不想冒险，可是那些男孩们全都跑去了，拍了几张照片，回来后翻来覆去地看照片。嗯……（沉默。）

乡村公路上、田地里、高速公路上——这些地方全都空无一人。高速公路已经荒置，电线杆上的电线也早已成为了摆设。一开始，那些房子里的灯还是亮的，可是后来，他们把灯全都关了。我们开着车在村子里转悠，一只野猪会突然从学校里冲出来，向我们的汽车猛扑过来，或者，一只小兔子会突然从某个地方钻出来。在所有的地方，动物都已经完全取代了人的位置：房子里、学校里，以及酒吧里。之前张贴的海报还在那里："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人类都获得幸福"、"工人阶级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列宁思想永垂不朽"。在这里，你仿佛回到了过去。集体农庄的办公室旁边还插着红旗，崭新的旗帜迎风飘扬，办公室外面的墙壁还画着一系列标语和伟人的头像。办公室里面的墙壁上则挂着领导者的画像，桌子还摆着领导者的半身像。在这里，你能看到战争纪念馆、小镇教堂、急匆匆被关上门的房子、灰色的水泥牛栏、卡车修理店，还有装载着遇难者的墓地。看起来这里就像是一个被某个部落匆忙间遗弃的定居点，而原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现在全都藏起来了。

我们互相询问对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像这样？这是我们第一

次以局外人的身份来打量和思考自己的生活。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里的一切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感觉就像被人在脑袋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部队里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块产自基辅的蛋糕的半衰期为36个小时。那么……我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从这里面走出来？三年，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切尔诺贝利一行唤醒了我。它使我获得了自由。

这栋被废弃的房子就在那里。房门是关着的。窗台上趴着一只猫。我想，那一定是一只陶瓷猫。走近后，我才发现那是一只真猫。它把房子里的花——天竺葵全吃光了。它是怎么进去的？是他们把它留在这儿的吗？

房子的大门上写着一些字："亲爱的好心人，请不要在这里搜寻值钱的东西。我们从来就没有值钱的东西。你可以使用房子里的任何物品，但是请不要毁了这儿。我们还会回来。"我在其他房子上也看到了一些不同颜色的字——"亲爱的房子，请原谅我们！"人们和自己的房子道别，就像和人道别一样。或者，他们会这样写："我们早上就要离开了"或"我们将在晚上离开"，而且他们还会把离开的日期，甚至时间都写在房子上。学校的一个作业本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不要打猫，不然，那些老鼠会吃光所有的东西。'下面还有一排孩子稚嫩的笔迹："请不要杀死我们的祖卡。它是只好猫。"（他闭上了眼睛。）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我只记得我曾经到过那里，在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我全都忘了。我想不起来了，统统想不起来了。我不能数钱。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医生们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从一间医院转到另一间医院，心里始终想着，房子是空的，你打开门，那里有一只猫。还有，还有那些孩子们留下的字迹。

我收到了部队传下来的命令。我的任务就是不让那些原来住在这里的居民回到已经被疏散一空的村庄里去。我们设置了路障，创建起了执勤岗点。因为某种缘故，他们把我们称为"游击队"。现在是和平年代，而我们站在这儿，饥肠辘辘地执行军事任务。农民们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譬如说，我们不准他们从自家庭院里拿走任何东西——桶子、罐子、铁锯或斧子，统统不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收割自家地里的庄稼。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就是：道路的一侧站满了士兵，他们正在督促人们离开这里，而就在道路的另一侧，奶牛们正在吃草，田里的收割机不断地发出嗡鸣声，粮食被收割下来后立刻就被装船运走了。年迈的妇女们走过来，哭着说道："孩子们，让我们进去吧。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在这里。"她们带着鸡蛋、熏肉和自制的伏特加。他们

为失去的土地——已经被污染的土地——而痛哭流涕。他们为失去自己的家具，以及他们的所有财产而难过。

在那里，你的思想会发生转变。事物原有秩序全被打破了。一个女人正在给自家的奶牛挤奶，而她的身边就站着一名士兵。这名士兵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个女人在挤完奶后，一定会把所有的牛奶都倒掉。一位年迈的妇女手里挎着一篮子鸡蛋，在路上行走，一名士兵紧随其后，因为他必须确保她会把这篮鸡蛋埋进地里。农民们高高地举起珍贵的土豆，他们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收割地里已经成熟的土豆，但实际上，这些土豆刚被挖出来就又会被深深地埋入地下。最糟糕的就是——同时，这也是最难以让人理解的——这里的一切都美极了！这就是整件事当中最糟糕的一点。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动物、这里的房子——这里的一切都很美。我再也不会见到这样的人。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很怪异，像个疯子。他们的表情很奇怪，我们的也一样。

我是一名士兵。如果我受命做某事，我就必须服从命令。但是，我也渴望成为英雄。你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政治工作者会发表演讲。只要打开广播或电视，你经常能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节目。对此，不同的人反应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希望能借此被领导人接见，能够上电视，有的人则只是把这当成一份工作，此外还有第三类人——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英雄的工作。我们的工资待遇很好，但是这好像都无关紧要。我的工资原来是400卢布，但是在那里我每个月都可以拿到1000卢布（而且是苏联卢布）。后来，人们说：“他们得了很多钱，现在他们回来了，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第一套家具。”当然，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的身体也会疼，因为毕竟这其中也含有英雄的要素。

在去之前，我也很害怕。不过，这种恐惧心理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到了那里之后，我突然就不害怕了。我们不断地接到命令，然后就开始工作，完成一项又一项的任务。我想从上面，从直升机上看一眼核反应堆——我想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做法是被明令禁止的。在我的医疗卡上，他们写道：我吸收了21伦琴的辐射，但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整个过程非常简单：你坐飞机直接飞到省会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很小，整座城市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恢弘庞大，只是一座很小的省会城市）。随后，你会看见一个男人，他站在距离核电站大约10至15公里的地方，手里还拿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他正在测量我们周围的辐射量。这种测量的次数将会随

着我们每天飞行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我会坐飞机从那儿前往核反应堆，有几天，从我身上测出的放射量为80伦琴，有几天又是120伦琴。有时候，我会在晚上的时候在核反应堆周围巡逻，每次两个小时。我们借助红外线照明设备给核电站拍照，冲出来的胶卷上总是会有一些散射状的黑色痕迹，那应该就是辐射——但是在白天，你看不到它们。

我和几位科学家谈过。有一位科学家告诉我："我都能伸舌头去舔你们乘坐的直升机，而且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另一位科学家则说："你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必须把你们自己保护起来！"我们在直升机的座位上铺了一层铅垫，还为自己缝制了一些铅质背心，但是这些防护措施只能挡住一方面的辐射，却不能挡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所有辐射。我们乘坐飞机在空中飞行，从早上一直飞到晚上。其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特殊的事情。大家都在工作，卖力地工作。晚上，我们会看电视——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所以当时足球成了我们主要的话题之一。

过了很久，我们才开始思考当时的事情——我想，那一定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了。当时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一个人病了，紧接着，又有一个人病了。有的人已经死了。还有一个人精神失常，最终自杀了。正是从这时起，我们才开始思考当时发生的一切。然而，直到二三十年后，我们才真正弄清楚并想明白这一切。对我而言，我在阿富汗（我在那里待过两年）以及后来的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驻守了两个月）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

我没有把我曾去过切尔诺贝利的事情告诉我的父母。有一天，我的兄弟碰巧读到了《信息报》上的一篇文章，看到了我的照片。他把这份报纸拿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个英雄！"我的妈妈看后什么也没说，开始默默地哭泣。

我们开着车往前走，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就在马路边，在一束光线的照耀下——就是那种细细的银色的光芒——有东西像水晶一样，闪闪发光。这些……当时，我们正打算穿过莫济里，前往卡林科维奇。我们看到有东西闪闪发亮。我们也曾谈论过这件事——就在我们之前工作过的村子里，我们全都注意到，那里的树叶上有许多细小的窟窿，尤其是樱桃树的树叶上，这种小窟窿尤其多。我们摘了一些黄瓜和西红柿——它们的叶子上也有这种黑色的小窟窿。我们一边咒骂，一边吃掉了它们。

我去了切尔诺贝利。其实，我并不是非去不可，我是自愿去那儿工作的。起初，你会觉得那里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直到后来，你才会注意到他们的眼神中全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可怕的空虚，而他们似乎也已经完全适应了对方的这种眼神。我是为了获得勋章才去那里的吗？或者，我想得到一些福利奖励？放屁！我什么都不需要。房子、汽车——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对了，一栋乡间别墅。可是，所有这一切我全都有了。然而，这是一次特殊的军事任务，它散发出了一种令所有男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只有那些具备男子气概的男子汉们才能完成如此重要的工作。至于其他男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下面苟且偷生。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妻子正在家中待产，有些人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孩；我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蓄着络腮胡子。他们一边诅咒自己，一边踏上了来这里的行程。

我们回到了家中。我脱掉了我在那里穿过的所有衣服，然后把它们全都扔进了垃圾桶。我把我的帽子给了我的小儿子。他很想要这顶帽子。我给他之后，他一直戴着它。两年后，医生对他作出了诊断：他的大脑里长了一个肿瘤……剩下的一切你可以自己把它写完。我已经不想再说了。

我才刚刚从阿富汗的战场上回来。我想过一小段平静的生活，我想结婚。我想马上就结婚。突然，我就接到了上级发来的这条带有红色标记的通知："特殊征召"，限一小时内赶到这个地址报到。我妈妈闻讯后，马上就哭了起来。她以为我又要应征上战场了。

我们要开往哪里？为了什么？当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在斯卢茨克，我们更换了服装，他们给了我们装备，直到这时，我们才被告知将被派往霍伊尼基地区中部地带。我们将前往霍伊尼基，而那里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我们的目的地更远，他们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人正在举行婚礼：年轻人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兴奋地喝着伏特加。这只是一场十分普通的婚礼，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铲除这里所有表层的泥土，铲除深度以一铁锹的长度为基准。

5月9日胜利日那天，一位将军来到此地。他们让我们站好队伍，祝贺我们节日快乐。我们当中的一个人鼓起勇气，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此地的辐射强度是多少呢？我们将会摄入多少剂量的放射性物质呢？"只有他一个人提出了疑问。当那位将军离开后，我们

的旅长把他叫了过去，狠狠地痛骂了他一顿："你这是公开的煽动和挑衅！你在危言耸听，你知道吗？"几天后，他们给我们派发了一些防毒面罩，可是没有人使用它们。他们也曾给我们看过几次放射量测量器，但是他们从没有让我们碰过它。每三个月，他们都会给我们中的一些人放假，让我们回家住几天。我们回家也只有一个目的：买更多的伏特加。几天后，我背着两个装满酒瓶的背包回到了那里。我的战友们兴奋得将我高高地抛了起来。

在最终结束任务，即将回家之前，我们都被召去与一个来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进行谈话。他的话非常有说服力，他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都不应该把自己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任何人。当我从阿富汗战场回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终于活了下来。然而，这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只有等你回到家以后，死亡才会慢慢地降临到你身上。

我要回忆些什么？我的回忆里有什么？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开车穿越所有的村庄，测量那里的辐射强度。女人们都吓得躲了起来，没有一个人给我们送苹果吃。男人们不像女人们那么害怕：他们会走到我面前，给我一些伏特加，以及一些猪肉，请我们吃。这时，如果你拒绝他们，大家都会感到很尴尬，但是把这些含铯的食物吃到肚子里听起来也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所以每当这时，我会接过酒杯，但是我不会吃任何东西。

不过，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家人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桌子上摆了一盘烤羊肉，还有许多吃的。主人已经有些醉了，他承认这还是一只小羊："我不得不杀了它。因为我再也不能多看它一眼，我受不了了。它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看的东西！一想到它那难看的样子，我就吃不下去了。"而我呢，在听完他的这番话之后，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飞快地喝下了一整杯伏特加……

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就好像我没有生病。现在，我已经全都忘了。

你必须要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为国效力——这是一件大事。他们给我发了许多东西：内衣裤、靴子、帽子、裤子、皮带，以及衣服。整理完毕后，你就得出发！他们给了我一辆装卸卡车，我的工作就是运送水泥。装车——卸车。我们都很年轻，都没有结婚。我们没有戴

任何防毒面罩。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年纪比我们大，他总是戴着面具，但是我们没有戴。道路上指挥交通的人也没有戴。我们还坐在驾驶室内，而他们每天都要在充满放射性尘埃的露天环境里工作八个小时。每个人的工资待遇都很好：这里的工资是你以前的三倍，还有假日津贴。我们把发的钱全都花了。我们知道伏特加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它能够缓解和释放压力。这也解释了为何战争时期，部队会发给士兵每人100克伏特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在家里一样：一名喝醉了的交通警察给一名喝醉的司机开罚单。

不要写苏联英雄主义所创造的那些奇迹。奇迹的确存在——而且它们也全都是真正的奇迹。不过，人们首先看到的往往都是无能和疏忽，在那之后，才会关注到奇迹的存在：堵枪眼，飞身扑向机关枪。但是，那些命令原本永远都不应该发出，这样的需求本就不应该存在。没有人会写这些东西。他们把我们扔到了那里，我们就像是被他们抛向核反应堆的沙子。他们每天都会列出一条新的“行动口号”：“人们勇敢而无私地工作”、“我们都会活下去，并取得胜利”。

他们给了我一枚奖章，以及1000卢布。

起初，人们还有些不相信，这听上去就像是一场游戏。但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原子战争。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忽视的。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撤离，所有人都直接被送到火车站。火车站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帮助人们把孩子从窗户里塞进车厢。我们让人们有秩序地排队——指引购票的人前往售票处，让想买碘酒的人前往药房。站在队伍中的人相互咒骂，有的甚至还打了起来。他们砸碎了路边商店和小摊的大门，他们甚至扭弯了窗户上的金属栏杆。

在那里，你还能看到从其他地方赶来的人们。酒吧、学校、幼儿园都成了他们的暂时住所。人们半饥半饱地在附近徘徊。所有人的钱花得都像流水一样飞快。他们发疯似的从商店里买东西，见什么买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洗衣房里的那些女人。没有洗衣机，没有人想到要带洗衣机，于是她们就用手洗。那些女人都很老了，她们的手上布满了水泡和伤疤。洗衣房里不仅脏，而且还含几十伦琴的放射性物质。“男孩们，吃点东西吧。”“孩子们，打个盹儿吧。”“孩子们，你们还那么年轻。小心一点啊。”她们为我们感到难过，还为我们流泪。

她们现在还活着吗？

每年的4月26日，我们这些曾经被派到那儿去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我们一起回忆当时的情景。你是一名士兵，战争时期，国家需要你。我们忘记了那些不好的事情，只回忆那些好的事情。我们记得，假如没有我们，他们当时根本无法做到那一切。我们的系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军事体系，它能够在紧急时刻出色地完成每一项任务。在那里，你终于自由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自由！在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展示出了自身伟大的一面、独特的一面。我们永远都不会变成荷兰人或德国人。在那里，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合适的沥青混凝土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国家从来就不缺乏英雄。

他们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我就去了。我必须去！我是一名党员。共产主义者，前进！事情就是如此！我是一名警察——高级队长。他们向我保证，回来后，我的肩膀上一定会多一颗星。当时已经是1987年6月。在去之前，每个人都应该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但是我没做检查就走了。有人退缩了——他拿来了一张医生的证明，说他患有溃疡，于是，我就顶替了他的位置。

我们以军人的身份赶到当地，但是最初，他们将我们整编成了一个建筑队。我们在那儿修建了一间药房。没过多久，我就感觉全身乏力，而且总是想睡觉。我对医生说我很好，只是这里太热了。自助餐厅里有集体农庄提供的肉、牛奶和酸了的奶酪。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光了。医生什么也没说。厨师做好食物后，医生会拿着一个小本子逐一比对检查，然后告诉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安全的，可是他自己从来不吃那些送检的样餐。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从中明白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绝望了。后来，草莓开始源源不断地运来，接着，到处都是甜腻腻的蜂蜜。

劫掠者早已先我们一步光临此地。我们用木板把门窗都封死。所有的商店都被洗劫一空，强盗们是从窗户下面的壁炉闯进来的，商店的地板上撒满了面粉、糖和饼干。罐头被扔得到处都是。村庄的居民已经被疏散完毕，但是距这个村子5至10公里远的另一个村庄尚未撤离。每当一个村庄被疏散之后，他们就会赶来，然后带着这个村子里的所有值钱的财物离开。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负责看守村庄。这个村子以前的集体农庄负责人带着一些当地人回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在其他地方定居，并且在那里有了一个新家，但是他们还是回到了这里——他们要回来收割庄稼，同时播种新的农作物。他们将收

割下来的麦杆捆成垛，堆在外面。我们在麦秆垛里找到了播种农具和摩托车。在这里，人们按照一种物物交换的原则来进行交易——他们给你一瓶家庭自制的伏特加，作为交换，你允许他们从这里搬运电视机。我们还出售卡车和播种机。一瓶或十瓶都行。在这里，没有人对钱感兴趣。（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起来。）每样东西都要缴税：一小罐气——你需要用半升伏特加来交换；一件羔羊皮外套——两升；摩托车——时价，依据当时的行情定价。根据临行前的指令，我需要在那里待六个月。随后，换防的人就会来替换我们。事实上，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止六个月，因为波罗的海三国的部队拒绝来这里服役。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人们洗劫了那个地方，把所有能够拿走的东西全都搬走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将隔离区内的物品运送到了外地。你可以在市场、典当行以及人们的家里找到这些物品。在那道警戒线背后，土地成为了当地唯一留下的物品。还有坟墓，以及我们的健康。

我们到了那里，领到了各自的装备。“这只是一次事故，”上尉对我们说，“事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那都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你们不会有任何危险。”“没有任何问题，”军士说，“只不过在吃饭前要记得洗手。”

我测量辐射强度。只要天一黑，这些人就会开着车来到我们所在的小站，开始给我们分发东西：钱、香烟和伏特加。然后，他们会让我们替他们放哨，而他们自己则在那些没收回来的物品中挑挑拣拣，把其中的一些东西装进自己的背包。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哪里去？也许，他们会把它们运到基辅和明斯克，送到那些二手市场里出售。当他们挑选完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处理那些他们挑剩下的物品：裙子、靴子、椅子、口琴、缝纫机。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埋进了沟里——我们把这些沟渠称为“公共墓地”。

后来，我回了家。我参加舞会，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喜欢她。我对她说：“我们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加深了解，怎么样？”

“这又何必呢？你是一个到过切尔诺贝利的人。我不敢给你生孩子。”

我有自己的记忆。我在那里的官方职务是警卫队的队长，就是《启示录》中的指挥官一类的角色。（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起来。）是的，你就按照我的原话写下来。

我记得我拦住了一辆从普里皮亚季开出来的小轿车。这座小城里的居民早已疏散到了其他地方，城里一个人也没有。“请出示证件。”他们没有证件。车子的后座上还盖了一层帆布。我们掀开了帆布。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一幕：20套茶具、一套组合壁柜、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一台电视机、一些小地毯和几辆自行车。

于是，我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

我记得，在那些空荡荡的村子里，猪全都发了疯，到处乱跑。我还记得集体农庄的办公室及俱乐部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墙壁上那些已经褪了色的海报：“我们把面包献给祖国！”“光荣的苏联工人阶级！”“人民成就永垂不朽！”

我记得那些无人看管的公墓——四分五裂的墓碑上写着一个又一个人的名字：博洛金上尉、大尉……那一排排长长的文字，看上去就像是一首首诗歌——那些都是二等兵的名字。墓碑旁杂草丛生，牛蒡、带刺的荨麻和藜正肆无忌惮地疯长着。

我记得我还看到过一个料理得很好的花园。我们路过时，花园的主人正好从屋子里走出来，看到了我们。

“孩子们，不要冲着我们大喊大叫。我们已经提交了申请表格——明年春天，我们就会离开这儿。”

“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还要如此悉心地照顾花园里的一草一木呢？”“现在是秋天，就该干秋天的活。”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写下来……

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孩子离开了。那个该死的女人！不过，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那样上吊自杀，也不会从七楼的窗户里跳出去。那个该死的女人。当我带着一箱子钱回来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我们买了一辆车。那时候，她和我住在一起，从没抱怨过什么。她一点也不害怕。（说到这儿，他开始唱歌。）

即便是一千道伽马射线当空照耀，

俄罗斯雄鸡也会准时打鸣。

一首不错的歌。这是我在那里学会的。想听笑话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开始讲了。）一个男人从核反应堆回到家中。他的妻子问医生：“我该拿他怎么办？”“你应该把他洗干净，给他一个拥抱，然后

离开他。”那个该死的女人！她害怕了。她带走了我们的孩子。（突然，他变得严肃起来。）士兵们就在核反应堆旁边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开车把他们送到那儿，然后再把他们接回来。和所有人一样，我的脖子上戴着一个辐射总量记录仪。当士兵们换班之后，我就会开车去把他们接回来，然后和他们一起前往一部——那是一个机密部门。在那里，他们会记下我们身上记录仪的读数，然后在我们的卡片上写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摄入了多少伦琴的辐射量，因为那属于军事机密。那群杂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突然对你说：“好了。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你必须停止工作。”这就是他们提供给你的全部医疗信息。即便是到了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告诉我我到底摄入了多少伦琴的辐射。死杂种们！现在，为了权力，为了谋求一官半职，他们互相倾轧，还削尖脑袋参加选举。你还想再听一个笑话吗？在去过切尔诺贝利之后，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但是你必须把自己的粪便装进铅盒子。

如果我们生病，医生凭什么给我们治病？我们手上没有任何资料。那些资料还在他们那里，他们把它藏了起来，或者，他们已经把它们毁掉了，毕竟那全都是军事机密。我们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医生？如果我有一张证明，上面标明我在那儿吸入了多少辐射，那该多好！我会把它拿给那个该死的女人看。我要告诉她，不管怎样，我们都能活下来，都能娶妻生子。切尔诺贝利的清理人在祈祷时都这样说：“噢，上帝，既然是你让这一切发生，让我只能接受，那么，就请你让这一切都好起来吧，正如我期望的那样，好吗？”去死吧，你们统统都去死吧！

他们让我们签了一份保密文件，所以在此之前，对于当年发生的一切，我一个字也没说过。退伍之后，我成了二等残废。当时，我才22岁。我摄入了相当大剂量的放射性物质。我们把一桶桶装满石墨的大桶运出核反应堆。那里的辐射强度高达10000伦琴！我们用普通的铲子往桶里铲石墨，每当一次班，我们至少要换30副面具——人们把它们称为“口套”。我们还用水泥浇灌石棺。那是一副巨大的棺材，但是躺在里面的只有一个人——高级操作员瓦列里·霍捷姆楚科。反应堆发生爆炸后，他被压在了爆炸形成的废墟堆中。石棺是一座20世纪的金字塔。我们还要在那里待三个月。等到我们所在的部队撤离时，他们甚至都没有让我们换衣服。我们穿着在核反应堆工作时穿的裤子和靴子跟随部队四处辗转，直到他们让我们复员。

如果当初他们允许我对其他人谈及此事，我又能对谁说呢？我在一家工厂工作。我的老板说：“别再生病了，不然，我们就开除

你。”他们果然这样做了。我去找厂长：“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在那里工作过。是我救了你们，我保护了你们！”他回答说：“派你去那里的人不是我。”

夜晚，我从妈妈的话中醒来：“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没有睡着。你躺在那儿，睁着眼睛。你的灯还开着。”我依旧什么也没说。我没有可以聊天的对象，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的话——用我自己的语言。没有人明白切尔诺贝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从那里回来的——我也说不出来。

我已经不再惧怕死亡，面对死神，我无所畏惧。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将以何种方式走向死亡。我的朋友死了。临死前，他变得很胖，全身都肿得厉害，就像一个大水桶。还有我的邻居——他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作为一名起重机驾驶员。最后，他全身的皮肤都变得很黑，像煤一样黑，而且他的身体也缩小了，以至于到了最后，他只能穿孩子的衣服。我不知道临死前的我会变成什么样，我只知道：根据医生的诊断，我已经时日无多了。不过，我已经想开了，此时的我很想体验一下死神降临时的感受。当初我被派往阿富汗战场的时候，临出发前，我就已经做好了随时被一颗子弹打中脑部、一命呜呼的准备。只不过，那时，死亡相对更容易一些。一枪即可毙命。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一篇关于操作员列奥尼德·托普图诺夫的文章。列奥尼德是核电站爆炸当晚的值班工作人员。就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他按下了红色事故按钮，但是那并没有阻止爆炸的发生。事后，他们把他送到了莫斯科的医院。医生说：“要想修复他身上的创伤，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完整的身体。”在他的身上，只有一处非常微小的地方没有受到辐射的感染——在他的背上。他们把他的尸体埋在了米定斯卡亚公墓，其他那些因为接受过量核辐射而死亡的人后来也都被埋在了那儿。他们用金属箔把他的棺材包了起来，然后在棺材周围浇筑了厚达半米的水泥，最后又在水泥棺外加盖了一层铅板。他的父亲来了。他站在墓地里，放声痛哭。路过的人们纷纷说道：“正是你的这个私生子点燃了这场大火！”

我们很孤单。在这里，我们只是一群异乡人。等到我们死后，他们甚至会把我们单独埋葬，他们处理我们尸体的方式都和其他人不一样，就好像我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外星人。我宁愿自己当初死在阿富汗的战场上。坦白说，我真的这样想过。在阿富汗，死亡是一件极其寻常的事情。到了那里，你自然就会明白。

我乘坐的直升机飞到了反应堆附近。从飞机上往下看，我能够看

到地面上的雌鹿和野猪。它们看起来都很瘦小，而且似乎没睡醒，行动很慢，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它们正在吃地上的草。它们什么都不知道，它们不知道自己应该离开这里。这些动物根本不知道其实它们应该随人类一起离开。

我应不应该去那里呢？我应不应该驾驶飞机在天上飞呢？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怎么能够不去呢？

有两名伞兵拒绝了这项任务——他们的妻子还很年轻，他们还没有孩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并且受到了惩罚。事后，他们被革去了军职。当然，部队里还有很多男子汉愿意献身祖国，成就自己的荣誉！这也正是这份工作吸引我们的原因之一——他不去，我去！然而现在，我的观点变了，我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在经历了九次手术以及两次心脏病复发之后，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去评判他们。我对他们当初的行为表示理解。当时的他们都很年轻。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去。这个决定永远都不会改变！绝不改变！他不能去，我去！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总的来说，到了那里，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那些硬件装备：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米-24武装直升机——那可是战斗机。切尔诺贝利要米-24武装直升机干什么？又或者说，米-24战斗机在这里能干什么呢？那些飞行员们都很年轻，他们才刚刚从阿富汗战场上退下来。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他们厌倦了阿富汗，厌倦了战争。于是，他们就被派到反应堆附近的森林里，最后摄入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这就是命令。其实，他们根本没必要派人到这个到处都是辐射的鬼地方来。他们来这儿能干什么呢？他们需要的是专家，而不是人肉材料。从直升机上，我看到了许多被废弃的房子，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废墟——此外，就是不计其数的小人影。那里有一台民主德国生产的起重机，可是这台机器已经完全失效——它开到了反应堆附近，然后就不动了。那些机器人也全都停止了工作。我们的机器人如此——由学者卢卡契夫设计，专为探测火星而制作的机器人。日本人的机器人也如此——很显然，高强度的辐射破坏了它们的线路。但是，那些士兵没有停止工作。他们穿着橡胶外套，戴着橡胶手套四处奔走。

在回去之前，我们接到了上级传达下来的警告命令：为了国家的利益，回去后，我们最好不要告诉人们自己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们看到了，也记住了。

第二部分

生者的国度

古老的预言

我的小女儿——她很特别。她和其他人不同。她一天天长大了，有一天，她问我：“为什么我和其他人长得不一样？”

我的女儿刚生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并不像一个婴儿，倒像是一个小布袋，一个用无数小布头缝补而成的布袋。她全身上下找不到一个开口处，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她的医疗卡上写着：“女孩，出生时被发现患有多种综合性病理症状：先天性肛门发育不全、先天性阴道发育不全、先天性肾脏发育不全。”这是医生们用专业术语对她作出的医学描述，简单说来就是：不能撒尿，不能拉屎，生下来就只有一个肾。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天，他们把她推进手术室，我目睹了手术的全过程——当时的她才刚刚出生两天。她终于睁开了眼睛，露出了一个微笑，一开始，我还以为她要哭了，可是，上帝啊，她竟然笑了！

同一时期出生的那些与她情况相似，患有类似症状的孩子最终都没能活下来，许多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可是，她没有死，因为我爱她。

四年里，她做了四次手术。在白俄罗斯，有无数孩子和她一样，一出生就患有许多先天性疾病，而她是这其中唯一一个最终活下来的孩子。我是那么的爱她。（她顿了顿。）自那以后，我再也无法生育，我也不敢再生孩子了。当我离开产房回到家之后，晚上，我的丈夫开始亲我，我躺在那儿，全身颤抖：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一种罪过。我很害怕。我听到医生说：“那个女孩生下来时穿的不是胎衣，而是盔甲。如果我们把她的样子在电视上公开，从今以后，再也没有女人敢生孩子。”这就是我的女儿。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该如何去爱对方呢？

我去教堂，把一切都告诉了神父。他说，我必须祈祷，恳请上帝宽恕我的罪孽。可是，我的家族里没有人曾经杀过人，既然如此，我又何罪之有呢？一开始，他们本打算撤离我们村的人，可是后来他们把我们村的名字从疏散名单上划掉了——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就在那时，我恋爱了，然后结了婚。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们已经丧失了恋爱的权利。许多年前，我奶奶在《圣经》上读到：将来有一天，这个世

界将会变得欣欣向荣，世间万物都蓬勃生长，硕果累累，河里到处都是肥美的鱼，树林里各种动物安居乐业，但是人类却不能碰它们，也不能利用它们。更糟糕的是，人类再也繁殖不出像从前那样，外形和自己相似的后代，于是，人类的生存开始受到威胁。当幼小的我听到这则古老的预言时，我以为那不过只是一个很可怕的童话故事。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请把我女儿的故事告诉所有人。请你把它写下来。她现在已经四岁了，她不仅会唱歌、跳舞，还能背诵诗歌。她的智力发育很正常，与其他孩子无异，只不过，她玩的游戏和其他孩子不同。她不会玩“商店”的买卖游戏，也不玩“学校”里老师上课，学生听课的游戏——她玩的是“医院”的游戏。她会给自己的洋娃娃打针，量体温，给它们做静脉注射。如果一个娃娃死了，她会用白色的毯子把它蒙起来。我们和她一起在医院里生活了四年，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而她也不知道人应该住在自己的家里。我们偶尔也会回家住一两个月，这时，她就会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回医院？”她的朋友都在那里，他们都是在医院里长大的。

他们给她植入了一个人工肛门，现在，他们正在努力为她安装一个人造阴道。自从上次手术之后，她的泌尿系统就彻底罢工，他们无法将导尿管插入她的体内——他们需要更多的手术才能完成这一工作。可是，也是从这时开始，他们开始建议我们向海外寻求医疗援助。我丈夫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20美元，我们到哪里才能筹集到数万美元甚至更多的钱呢？一位教授平静地对我们说：“鉴于其病理症状的特殊性，你们的孩子对科研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你们应该给其他国家的医院写信，他们应该会感兴趣。”于是，我写了。（说到这儿，这个女人泪如泉涌。她竭力地想让泪水停下来。）我在信中写道，每隔半个小时，我们就必须通过用手挤压的方式让她拉尿，而尿液会顺着许多人工开口，从她身体上原本应当长有阴道的地方流出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之外，还有其他孩子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排尿吗？这样的排尿方法还能用多久？至今为止，尚没有人知道小剂量的辐射会对孩子的身体器官造成何种影响。请接受我的女儿，哪怕你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科学实验。我不想让她死。我可以接受她变成实验室小白鼠的事实，只要她能活下去！（说到这儿，她失声痛哭。）我写了几十封这样的信件。噢。上帝啊！

对于这一切，她一无所知，但是总有一天，她会问我们：为什么我长得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我不能爱上其他男人？为什么我不能生孩子？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蝴蝶身上，却发生在了她的身

上？那些小鸟呢，它们怎么样了？为什么其他人都没事，为什么那个人偏偏是我？我想要——我本来可以证明的——我想要一些证明文件——这样，她就会知道——等她长大以后——她就会明白这不是我们的错，我和我的丈夫，我们的爱本没有错。（她再度停了下来，想抑制住自己的泪水。）我为此奋斗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和那些医生，还有官僚们——我一次又一次地敲开了那些大人物的门。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才终于从医生那里得到了一份证明，证实她目前糟糕的身体情况与离子化辐射（小剂量）有关。四年来，他们不断地否定我的要求、拒绝我的申请；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你的孩子只是先天性疾病的受害者。"什么？先天性疾病？她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受害者！我研究了我的族谱——我的家族中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我家族中的所有人都活到了80或90岁，而且全都是无疾而终。我的爷爷甚至活到了94岁。医生说："我们有指示。按照指示，我们应该把这个类型的所有个案都称为综合性疾病。20或30年后，我们将会有一个关于切尔诺贝利病人的数据库，到那时，我们就会开始着手研究这些案例与离子化辐射之间的关联。不过现在，整个科学界都对此所知不多。"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20年？30年？我等不了那么久。我要起诉他们，我要起诉政府。他们说我疯了，嘲笑我，说我是生活在古希腊的无知孩童。一个官员冲着我喊道："你想借此得到切尔诺贝利受害者的特殊待遇！你真正想要的是切尔诺贝利受害者赔偿金！"我竟然没有在他的办公室里晕倒，天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他们也不想去弄明白——我需要知道这一切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的爱本没有错。（她哽咽了，不再说话，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这个女孩正在一天天长大——她还是一个女孩——你不要把我们的名字写出来——就连我们的邻居——还有那些和我们住在同一层楼的人们对此都一无所知。我会给她穿裙子，给她手帕。他们经常说："你家的卡特娅长得真漂亮。"与此同时，每当遇到怀孕的女人，我都会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去打量她们。我从不正眼看她们，我的眼睛会飞快地从她们身上扫过。只要看到怀孕的女人，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复杂：既惊讶又骄傲，即妒忌又高兴，我甚至还会萌生出一种报复心理。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甚至对邻居家怀孕的母狗都投去了同样的目光——就连看到在窝里孵蛋的小鸟，我都忍不住会这样想……

我的女儿。

瑞莎·Z
一位母亲

月光照耀下的土地

我突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哪种做法更好——记住，还是忘却？我问我的朋友。有的人说自己已经忘记了，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不想保留这段记忆，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无法改变事实，我们甚至都不能离开这里。

以下就是我能想起来的一些事情。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了。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个关于核爆炸的笑话：假如切尔诺贝利大爆炸发生在巴布亚附近，那么，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为此感到震惊和害怕，巴布亚人也不会表现出丝毫的恐慌。你找不到任何公布医疗信息的公告栏，也找不到任何能够帮助你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那些能够弄到碘化钾的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备受追捧的大人物（在我们的小镇上，你根本无法从药店里买到这种药，除非你认识人，不然你根本买不到）。有些人一次性吞下了一整瓶的小药丸，然后大口大口地喝水，想把它们咽下去，结果却因为药片卡在食道里而被送进了医院。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只要生活的地方还有麻雀和鸽子，人就能在那里活下去。一时间，大家都开始四处寻找麻雀和鸽子。有一次，我坐在一辆的士里，结果发现天上的小鸟全都不顾一切地冲向汽车前方的挡风玻璃，就像瞎子一样。的士司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所有的小鸟都像疯了一样，不管不顾地向汽车撞去，看上去就像是集体自杀。

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当时明明是白天，但眼前的景色却像极了月光照耀下的场景。只见道路的两侧白茫茫的一片，那片白色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与地的交会处。土地之所以会变成白色是因为那上面铺了一层白云石。受到辐射污染的表层泥土被挖出来后已经送到了其他地方，在那之后，他们就在土地上铺了一层白色的白云石砂。砂子让土地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不再像土地。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幅画面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折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我甚至试图想以此为基础写一个故事。我渐渐勾勒出了一幅100年后的画面：一个人，或其他什么东西，正像动物一样，四肢着地，在路上飞奔，他的后腿很长，但是两条腿的膝盖却始终弯曲着。到了晚上，

他就会睁开第三只眼睛，四处搜寻蚂蚁的踪迹，并且用他仅有的一只耳朵聆听蚂蚁的动静。蚂蚁成了这个世界上除他之外仅存的生物，其他所有的飞鸟鱼禽都已经灭绝了。

我把写好的故事寄给了一家杂志社。他们把我的稿件退了回来，并且说这不是文学作品，而只是一段有关噩梦的描写。当然，我承认我没有作家的天赋，但是我想他们之所以不接受我的这篇稿件，一定还有其他原因。，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所有人都闭口不谈切尔诺贝利事件，为什么就连我们的作家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回避，很少写与之相关的作品——他们描写战争或营地，可是却几乎从不涉足这一题材。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次事故吗？假如我们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取得了胜利，人们一定会长时间地谈论它，写更多关于它的文章或作品。又或者，如果我们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也许我们也会谈论得更多。可是，我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和了解这一事件。我们做不到。我们无法把它当成一次寻常的经历记入人类历史，也无法用人类的时间期限去衡量它。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记住它，还是忘记它？

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夫金
戈梅利州立大学教师

当一个男人看到耶稣降临时，他开始牙痛

当时的我正在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当时，我正在和我的妻子谈分手。

结果，他们突然走进来，将一张通知塞到我手上，然后说，楼下有一辆车正在等我。一切就像又回到了1937年，他们在夜晚闯进你的家里，把你从暖烘烘的床上拖出去。不过，这种突然袭击的办法没过多久就失效了：女人们不再像之前那样应声开门，或者她们会撒谎，说自己的丈夫不在家，外出度假或出差了，或者说他们和自己的爸妈去了别墅。士兵们试图将通知发到每一个人的手上，但是妻子们全都拒绝接受。于是，他们变换了策略，工厂、大街上，以及午餐时的工厂自助餐厅都成了他们抓人的最好地点。一切就像回到了1937年。

可是当时，我简直都要发疯了。我的妻子欺骗了我，与这件事相比，其他所有事情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我上了他们的车。来找我的那些人虽然身着便衣，但是他们身上全都配有武器。他们像押解犯人一样，跟在我的两侧，很显然，他们害怕我会逃跑。就在我坐上他们的车的那一瞬间，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曾经成功登月的美国宇航员。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做了牧师，其他人都疯了。我在一篇关于他们的报道里读到，他们以为自己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城市，以及一些人类留下的痕迹。我记得，当时的报纸上有几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核电站绝对安全，我们完全可以在红场上建造一座核电站。它们比萨马瓦尔铜壶还要安全。它们就像星星，而我们将凭借它们“点亮”整个世界。可是，我的妻子离开了我，当时，我满脑子只想着这一件事。好几次，我甚至试图自杀。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就读于同一所幼儿园、同一个学校，后来，我们还进了同一所大学。（说到这儿，他陷入了沉默，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我告诉你。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英雄事迹，也没什么好写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又不是战争年代，为什么我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大家，而我的妻子却躺在另一个男人的身边？为什么那个人是我，不是他？坦白地说，在那里，我没有看到一个英雄。我只看到了一群疯子，一群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的疯子，我自己也疯得厉害，但是这根本就没有必要。我得到了勋章和奖励——可是，我之所以能得到它们，完全是因为我不怕死。我根本就不在乎生死！

我甚至把这当成是一种发泄，一条帮助我摆脱人生困境的出路。如果我死了，他们会把我荣誉下葬，政府还会为此支付一大笔抚恤金。

到了那儿，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奇异的世界里，在这里，你会有一种正在阅读《启示录》的感觉，《启示录》中的内容发人深省，但是与此同时，你的生活又像退回到了石器时代。在我看来，一切都变得更加犀利、更加赤裸裸。我们住在帐篷里，而这些帐篷就搭在距离核反应堆20公里外的一片树林里。我们过着一种游击队似的生活。我们这些游击队队员都是一些被临时招来接受军事训练的人，年龄介于25岁至40岁之间。我们中的有些人具有大学学历，有些人则已经取得了某种职业技术证书。举例来说，我自己就是一名历史老师。他们发给我们的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铁铲。我们的任务就是填埋废墟和花园。当我们干活时，村子里的女人就会望着我们，并且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他们给我们发了手套、呼吸面罩和白大褂。火辣辣的太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像恶魔一样，在他们的院子里拼命地挖土，然后掩埋。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花园埋起来，他们更加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些看起来和普通大蒜和卷心菜无异的大蒜和卷心菜都撕成碎片，然后掩埋。那些年迈的女人们会一边在胸口画十字，一边说：“孩子们，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世界末日来临了吗？”

在房子里，炉子已经点燃了，猪油正在火上烧着。你拿出一个放射量测定器，靠近炉子，结果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炉子，而是一座小型的核反应堆。“孩子们，”屋里的男人们说道，“在桌子边找个凳子坐下来吧。”他们想表现得很友好。但是，我们拒绝了。他们说：“来吧，我们喝一杯。坐下来。告诉我们外面的情况如何。”我们该和他们说什么？在燃烧的核反应堆，消防员们用脚去踩那些燃烧的核原料，想把它们踩灭，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燃烧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呢？我们分成小队执行任务，每个小队都配有一个放射量测定器。每个地方的辐射强度都不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工作的地方辐射强度只有2伦琴，但另一个人所处的工作环境里的辐射强度就是10伦琴。一方面，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几乎与监狱里的犯人无异，另一方面，我们又很惶恐。不过，我不怕。我看待所有事物的角度和其他人不同，我会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它们。

一组科学家乘坐一架直升机来到了这里。他们全都穿着特制的橡胶制服、长筒靴，还戴着护目镜。看起来，他们就像是即将奔赴月球的宇航员。一位年迈的老妈妈走向他们中的一个人，问道：“你是谁？”“我是一名科学家。”“噢，科学家。看看他穿的衣服！还有那副

面具！你们穿成这样，那我们呢？”于是，她就拄着一根木棍，跟在他后面。我有一个想法，而且这样的想法曾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总有一天，他们会开始四处搜捕这些科学家，就像中世纪的梵蒂冈到处逮捕医生，然后把他们全都淹死一样。

我遇到过一个男人，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推倒，然后被掩埋。（他停了下来。）我们埋葬所有按规定要掩埋的物体：房子、水井，还有大树。我们还掩埋泥土。我们把那些东西撕碎、砍断、碾碎，然后把它们卷进巨大的塑料布里……我告诉过你，那里根本就没有英雄，也没有所谓的英雄事迹。

有一次，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刚刚换班回来——我们每次当班都要工作12个小时，其间没有任何节假日，所以我们唯一能够休息的时间就是晚上换班之后。当时，我们都已经回到了装甲运输车里，这时，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在这座已经被废弃的小村子里走来走去。我们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人，他的背上还拖着一条地毯。

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辆日古力汽车。有一天，我们开车路过时停了下来，看了一眼那辆车：只见车子的后备箱里塞满了电视机和电话。装甲运输车调转车头，向它撞去：日古力汽车顿时散了架，就像一个被压扁的苏打水罐。在场的人谁也没说话。

我们还负责掩埋树林。首先，我们把大树锯成1.5米长的圆木，然后用玻璃纸把它们包裹起来，最后再把这些包裹着玻璃纸的大木桩扔进一个大坑——那里就是它们的坟墓。晚上，我常常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眼前有一个黑影在动，它不断地翻滚——看起来是那么鲜活——和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小动物一样——那些小虫子、蜘蛛、毛毛虫——我不知道这些虫子叫什么，我就把它们叫做小虫子、蜘蛛、蚂蚁。它们的体型有大有小，颜色也不一样：黄色、黑色的。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动物是另一种人。我杀死了不计其数的虫子，有些虫子我甚至都不知道叫什么。我摧毁了它们的家园，破坏了它们的秘密洞穴，然后把它们和其他东西一起埋进土里。我埋葬了它们。

列奥尼德·安得列夫是我很喜欢的一名作家，他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拉撒路的寓言故事。拉撒路去过地狱，也见过地狱。后来，虽然耶稣把他救活了，但是他却变成了一个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人。

也许，这就足够了？我知道你很好奇，没有去过那里的人通常都很好奇。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那里仍然是人的世界，和以前一模一样。你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恐惧里,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随着

时光的流逝，那里的人们又恢复了以往的正常生活。（他没有停顿，继续说道。）男人们继续喝着他们的伏特加。他们打牌，想尽一切办法追女孩，然后生孩子。他们聊得很多话题都与钱有关，但是我们去那里并不是为了钱。或者说，大多数人都不是为了钱。男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你必须要工作。他们让我们工作。对此，你不会有任何疑问。有些人希望能够借此找到更好的工作。有的人则选择抢劫和偷窃。人们期望能够得到政府曾经许诺他们的那些特殊待遇：无须等待，立刻搬出军营，搬进公寓；让他们的孩子上幼儿园；给他们一辆汽车。有一个人害怕了，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帐篷，每天都穿着塑胶衣服睡觉。胆小鬼！他最终被开除了党籍。闻讯后，他大喊道："我只是想活下去！"在那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我曾经遇到过一群女人，她们都是自愿要求去那里工作的。一开始，她们遭到了拒绝，对方告诉她们：我们需要厨师、水管工、消防员，但是她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去了那里。各种各样的人，数千名志愿者轮流在夜间看守储存物资的库房。还有许多学生组成的救援团体。社会各界的人们纷纷慷慨解囊，为受害者捐款，设立慈善基金。成百上千的人们前赴后继地赶往医院，捐献自己的鲜血和骨髓。

与此同时，在那里，伏特加就是最好的货币。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勋章或病假条。有一位集体农庄的主席曾经带着整整一箱伏特加去找放射学家，请他们把他所在村庄的名字从疏散名单中划掉——在此之前，政府已经承诺他，将会在明斯克给他分一套三居室。没有人会去检查那些辐射数据报告。整个俄罗斯都已经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当时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们从清单上划掉一些东西，然后再转手把它们卖掉。一方面，你会为这样的事情和环境而感到恶心，另一方面——你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他们派来的人当中有不少还是学生。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地里的藜拔掉，然后收集麦秆。当地有一些夫妻真的很年轻。他们手牵着手在路上行走。那情景真让人不忍去看。当地的风景美极了！简直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正是因为它美，所以这一切才显得越发可怕。人们不得不离开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他们必须马上离开，狼狈地、仓促地，就像他们是被撵走的坏人，或者说被驱赶出境的罪犯。

他们每天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报纸。我通常都只阅读那些标题："切尔诺贝利——一个充满成就的地方。""我们战胜了核反应堆！""生活还在继续。"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教导员，他们会时不时地组织我们开展一些讨论。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赢得胜利。可是，我们的对手是谁？原子？物理学？还是整个宇宙？对于我们，胜利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活就是挣扎和奋斗，以及不断战胜困难。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如此钟情于洪水、大火等各种灾难。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勇气和英雄主义”。

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小鸟还缩在自己的窝里；当我离开时，还有许多苹果躺在雪地上。我们没来得及将它们埋进土里。我们把泥土埋进土里，和泥土一起被掩埋的还有虫子、蜘蛛和水蛭，以及人的尸体。和它们一起被埋葬的还有那个世界。那个地方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里的虫子。

其实，我什么都没告诉你。我只是说了一些我的记忆片段。我之前提过的那个列奥尼德·安得列夫曾经说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就在他的房子前面，耶稣被人抓住了，他耳闻目睹了当时发生的一切，但是与此同时，他的牙痛得厉害。他眼看着耶稣背着十字架倒了下去，他听到耶稣在临死前大声喊叫。但是，他的牙痛得厉害，所以他并没有跑出去。两天后，他的牙不痛了，人们告诉他耶稣又活了。这时，他想：我原本可以成为这件事的见证人，但是当时，我的牙痛。

事情是不是往往都这样？我的父亲参与了1942年的莫斯科保卫战。直到许多年后，他才通过书和电影获悉，原来自己竟然是一次伟大战役的亲历者。对于那场战争，他脑海里的记忆就是：“我坐在战壕里，用手中的来复枪向敌人射击。后来，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我被爆炸卷起的尘土埋在了战壕里。再后来，他们把半死不活的我从战壕里挖了出来。”这就是他对于那场战役的全部记忆。

让我们再回到当时，我的妻子离开了我。

阿卡迪·菲林
清理人

一颗子弹

独白者：霍伊尼基猎人及渔夫志愿者协会主席，维克托·约瑟霍维奇·维泽科夫斯基奇；以及两名猎人：安德烈和弗拉季米尔，他们两人均不愿在书中透露其全名。

当我第一次杀死一只狐狸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第二次，我杀死了一头母鹿。从那之后，我发誓再也不杀生了。那些动物都长着一双极富表现力的眼睛。

只有我们人类才能明白事理。动物们只知道生存。鸟儿们也一样。

到了秋天，野山羊会变得极其敏感。任何一丁点由人类带来的风吹草动都会令它受惊，然后它会在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不会让你有机会靠近它。与此同时，狐狸也十分精明……

他们说原来这附近有一个人，他经常到处闲逛。如果他喝醉了，路上一旦遇到人，他就会开始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讲。他曾经在大学里学习过哲学，后来曾一度被关进了监狱。在隔离区里，当你遇到在那里生活的人，询问他们的自身情况时，这些人绝不会对你说真话。或者说，他们很少会如实相告。但是，这个人和他们不一样，他非常聪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他说，“完全是为了培养哲学家。”他把动物叫做“行走的灰烬”，把人叫做“会说话的泥土”。泥土之所以会说话是因为我们吃泥土，换言之，我们是由泥土构成的。

隔离区就像有某种魔力，引得你总想进去看看。我告诉你吧，你会思念它。一旦你去过那里，你就会夜以继日地思念它。

好了，孩子们，不说废话了，我们言归正传。

你说得对，主席。你来说，我们先抽一会儿烟。

情况是这样的。他们称我为地区行政长官。“听着，主席猎人。隔离区内还有很多家养的宠物——猫、狗。为了避免扩散，我们需要杀死这些动物。去吧！”第二天，我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所有的猎人。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和任务。没有人愿意去，因为他们没有为

我们提供任何防护性装备。为此，我咨询了民兵，但他们那儿也什么都没有，就连一个呼吸面罩都找不到。最后，我只得去了当地的一家水泥厂，从那里弄到了一些面具。说是面具，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薄膜，其功效只能用来阻隔水泥灰。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呼吸面罩。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些士兵。他们不仅有面具和手套，还配有专门运送人员的装甲车。而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只能穿着日常的衬衫，然后用手帕遮住我们的鼻子。收工后，我们就穿着相同的衬衫和靴子回到家中。

我把那些猎人分成两个小分队，每队20人。每个小分队里，除了猎人，还有一名兽医和一个来自传染病中心的人。此外，我们还有一台挖掘机和一台自动卸货车。他们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保护措施，根本就没有为我们考虑，这实在是太糟糕了。

虽然他们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防护性措施，但是他们给我们发了奖金——每人30卢布。在当时，买一瓶伏特加需要3卢布。当我们这支队伍被解散之后，人们给了我们一个偏方：将一汤匙的鹅粪倒进一瓶伏特加中，连续两天都喝这种加工过的伏特加。他们说只有这样，你明白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才能做一个男人……还记得吗，我们都曾经哼过的那首小歌谣？“扎波罗热人牌小汽车发不动了，基辅的男人们硬不起来了。如果你还想做父亲，就最好用铅质的护具把你的那玩意儿包起来。”哈哈——

我们开车在隔离区里转了两个月。我们这个地区有一半的村庄都已经被疏散一空，几十个村镇全都变成了荒无人烟的空城：巴勃金、图尔戈维奇……我们第一次进村的时候，那些狗几乎全都在自家附近徘徊，就像看门的哨兵一样。它们在等主人归来。我们的出现让他们感到很高兴，一听到我们的声音，它们立刻就围了上来。我们则对它们举起了手中的来复枪。房子里、谷仓里、院子里，到处都能看到被我们打死的狗。随后，我们把它们的尸体拖到街道上，然后把它们扔进装卸卡车。这并不是一份好工作。那些小狗一定想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杀它们呢？要杀死这些狗并不难。它们都是家养的宠物。它们不怕枪，也不怕人。它们甚至会循着你的声音，向你跑来。

我们甚至在路上看到了正缓缓爬行的乌龟……上帝啊！后来，我们经过一个空房子时发现，屋子里有一个鱼缸，缸里还养了一些鱼。

我们没有杀死那只小乌龟。如果你开车从乌龟身上轧过去，它会立刻缩进壳里，但是它的壳不会破裂。当然，我们也只有在喝醉了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许多院子里的笼子门都被打开了，养在笼子里的

兔子跑了出来，四处乱窜。有些水獭还被关在笼子里。我们把它们都放了出来，假如附近有水源——湖，或者小河——它们就会跳进水里，然后游走。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被废弃了。暂时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来终结它们。“就三天，”他们欺骗那些小孩，“我们去看马戏表演。”他们说完就哭了。人们以为自己还会再回来。让我告诉你吧，一切就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那些猫死死地盯着人群，狗在一旁大叫，试图也想和主人一起上车。无论是杂种狗，还是纯种的牧羊犬，统统如此。然而，士兵们立刻就把它们赶开了。他们用脚去踢那些想和主人一起走的狗。那些动物跟在主人乘坐的汽车后面跑了很久。撤离——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这就是疏散。日本人在广岛做过同样的事情，现在，他们跑在了所有人的前面。他们在最前面。而这意味着……

我们因此而有了练习射击的机会，而且那些靶子还全都是会动的活靶子。这是猎人的本能。工作本身很有趣。我们喝酒，然后开工。有人会给我们发工资，考虑到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他们给的工资虽然高但也是公平的。在那时，30卢布——在那个时候——你能够做……

情况就是这样。一开始，那里的房子都被封住了。我们没有拆掉那些封条。如果你透过窗户看到屋子里有一只猫，你该怎么办？我们不会去碰它们。后来，强盗来了，他们破坏了封条，砸烂了大门、窗户以及窗户上的铁栏杆。他们偷走了所有的东西。最初，他们还只拿录像机、电视机以及皮毛大衣之类值钱的物品，后来，他们变本加厉，什么都拿。铝汤匙被他们随意地扔在地板上，到处都是。这时，那些还活着的狗不再在大街上流窜，而是住到了屋子里。你一走进屋子，它们就会向你扑来。这时，狗已经不再相信人类。有一次，我走进一间屋子，看到房间中央趴着一条母狗，它的身边还围着几只小狗。我是不是为它感到难过？当然，相信我，那绝不是一幅令人感到赏心悦目的画面。不过，我也作了比较。事实上，那情景就像是回到了战争时期，当时，我们是惩罚者。当时的情况和那时几乎一模一样。那是一次军事行动，我们也参加了，包围了整个村庄。村里的狗一听到枪响就立刻跑开了。它们全都跑进了树林。猫相对聪明一些，加上它们体型小，所以藏起来也更容易。一只猫躲进了一个陶罐里。我摇了摇罐子，把它赶了出来。然后它躲进了壁炉，但很快又被我们赶了出来。然而，那种感觉非常不好。你走进一间屋子，屋子里的猫一见你进来就立刻像一颗子弹一样，嗖的一声从你脚边跑开，而你则端着来复枪满屋子地追那只猫。它们十分瘦小，而且全身脏透了，皮毛上沾满了大大小小的土块和泥点。最初，那里还有很多鸡蛋，母鸡

们趴在上面，尽心尽力地孵蛋。猫和狗则以鸡蛋为食，后来，鸡蛋吃完了，它们就开始吃小鸡。狐狸也吃鸡，事实上，狐狸已经把家安在了村子里，和狗住在一起。有几次，我们还在谷仓里发现了一些猪，我们把它们放了出来。接着，我们又在地窖里发现了很多东西：黄瓜、土豆。我们打开了地窖的大门，把里面的东西都扔进了水槽。我们最后并没有杀那些猪。

在某个村子里，我们见到了一位老妇人。她把她自己锁在了房子里。她养了五只猫和三条狗。她不愿交出自己的宠物，并且恶狠狠地诅咒我们。最后，我们通过武力带走并杀死了那些宠物，只给她留了一只猫和一条狗。她大声地诅咒我们。她冲着我们大叫道："强盗！狱卒！"

我们经过了一座又一座的村庄，里面全都空无一人。后来，我们来到了卡提尼。在卡提尼小镇的中央，我们看到了两位老太太，而她们看到我们竟然一点也不害怕——换作其他人一定已经吓傻了。

是的，哈哈。"你们开着拖拉机继续往前开，在这座山的旁边，马路的对面就是核反应堆。如果不是那些瑞典人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就生活在反应堆上，在这里变老，等死。"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气味——我不知道弥漫于这个村子里的那种气味究竟来自于何处。这里距离核反应堆只有六公里远——那个名为马萨利的村庄。这里就像是一个放射中心。到处都弥漫着一股碘酒的味道，闻起来有点酸酸的。在这里，你必须从近距离杀死猎物。那条母狗和它的小狗就趴在地板上，一看到我进来，它立刻跳起来，向我扑来。我速战速决，一枪就把它干掉了。那些小狗正舔着自己的爪子，在地上滚来滚去，玩闹嬉戏。我必须近距离射杀它们。一条狗——看外形，它应该是一条黑色的小狮子狗。我为它感到难过。我们的卡车上已经堆满了它同伴的尸体，就连车顶上都堆满了。我们把这些尸体运到一座"公墓"。坦白说，所谓的"公墓"其实就是一个很深的大坑，只不过这个大坑的位置、挖掘方式以及处理方法全都有特殊的规定：首先，这个大坑的位置应该选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区；其次，向下挖的时候，你必须确保不会挖出地下水；最后，大坑挖好后，你还需要用一层玻璃纸将它与外界土壤隔离开来。不过，虽然有诸多规定，但是没有谁会真的严格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玻璃纸，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寻找合适的挖坑地点上花费那么多时间。如果那些动物只是受了伤，一时还没有死，它们就会呜呜地叫，不断地发出哀嚎。我们把车开到大坑旁边，将它们直接卸到大坑里，

而这只小狮子狗一直想方设法地往上爬。我们都没有子弹了，没有办法送它上天堂。我们的枪里一颗子弹也没了。所以，我们只得把它推进大坑，然后就那样生生地把它活埋了。时至今日，每当想起那只小狗，我仍然会感到十分难过。

但是，那里的狗比猫多。也许，当它们的主人离开后，这些小猫也走了？或者，它们全都藏起来了？那是一只很小的家养狮子狗，一只被主人宠坏了的宠物狗。

相对而言，我们更愿意从远距离射杀它们，如此一来，就不会出现你和它四目相对的情景。

你必须要练就一手好枪法，做到一枪毙命，不然，事后你还得补一枪。

这就是我们——人类——世界上唯一明白事理的生物，可是那些动物也是生命，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些“行走的灰烬”。

马——当你把它们拉出来射杀的时候，它们会歇斯底里地仰天嘶鸣。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任何一种有生命的物体都有灵魂，即便是昆虫也不例外。这只受伤的母鹿——它躺在那里。它想获得你的同情和怜悯，但是你却端起枪，杀死了它。在它生命的最后一刻里，它明白了一切，它那道冷冰冰的眼神几乎与人类无异。它恨你。或者，它在哀求你：我也想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我告诉你，你必须练就一手好枪法！相对于用枪打死它们而言，活活将它们打死更加残忍。射击是一种体育项目，一种体育活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人会去打扰一位垂钓者，但是射手却无法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不公平！

射击与战争——这就是一个男人一生的主要活动。一个真正的男人的—生。

我无法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儿子。他还是个孩子。我在哪里？我干了些什么？直到今天，他仍然以为自己的爸爸去那里是为了抵御外敌或守卫某个地区。他还在做着他的战争梦！他们在电视上也是这样宣传的：军事装备，不计其数的士兵。那里真的有很多士兵。我的儿子问我：“爸爸，你在那儿是不是也像士兵一样？”

电视台的摄影师和我们一同进入了隔离区。还记得吗？他哭了。他是一个男人，但是看到那儿的一切后，他哭了。他一直想看看长着

三个脑袋的野猪。

是啊。那里的狐狸眼看着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冲进了树林。“装模作样的男人，你要去哪里？”“我不是个装模作样的男人，我是一只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刺猬。”哈哈哈。正如他们说的那样，让我们把安静的原子塞入每个人的家中！

让我告诉你吧，每个人都会像那里的动物一样死去。在阿富汗，我曾经目睹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我自己也曾经腹部中弹，躺在太阳下。那里简直热得出奇。我都快渴死了。“好吧，”我当时想，“我会像一条狗一样，死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人流血时的样子和动物一模一样，就连那种疼痛感都一样。

在那里，警察和我们在一起——他已经疯了。他为那些暹罗猫感到难过，他说，它们在市场上的价格贵得离谱。它们是那么的美丽，而他也是一个男人……

一头奶牛领着自己的小牛犊在路上行走。我们没有开枪杀死它们。后来，我们也不再开枪射杀那些马。牛和马都很怕狼，但是一点也不怕人。不过，马也有它的自卫方式，能够暂时抵挡狼的进攻。所以，那些狼首先选择了对那头奶牛下手。这就是大森林里的弱肉强食法则。

他们把那些牲畜从白俄罗斯运往俄罗斯，然后卖掉。有些母牛被查出已经患有白血病，于是，他们就打折出售。

最令我感到悲哀的是那些老人。他们走到我们的车旁：“孩子，你们能去我家看看吗？”他们一边说，一边把钥匙塞进我们手里。“你能给我拿些衣服过来吗？还有我的帽子。”与此同时，他们又往我们的手里塞了一些钱。“我的狗现在怎么样了？”狗已经被杀死了，你的房子也已经被洗劫一空。他们永远都不会再回去。你该怎么对他们说？我没有接他们的钥匙，我不想欺骗任何人。有些人接过钥匙，然后问道：“你把伏特加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呢？你把它们藏哪儿了？”随后，那个老头就告诉了他们。他们最终找到了整整一牛奶罐的伏特加。

为了筹备婚礼，他们请求我们帮他们杀死一头野猪。这是他们的请求。野猪的肝脏在你的手中融化了，可是他们还是抬走了野猪——为了婚礼。为了洗礼仪式。

我们也为科学研究猎杀动物。有一次，我们射中了两只兔子、两只狐狸和两头野山羊。它们全都受到了辐射污染，但是我们还是用各种办法把它们烹饪了，然后吃掉。起初，我们也有些害怕，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你总得吃点东西，而我们又不可能全都搬到月球或其他星球上去生活。

有人在市场上买了一顶用狐狸皮做的帽子，结果没戴多久，他就秃顶了。一个亚美尼亚人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从一个从隔离区回来的人那儿买了一挺机关枪——可后来，他却死了。人们开始自己吓唬自己。

对于我而言，无论那里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思想都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那些全都是没意义的废话。

我曾经和一名司机聊天。他的工作就是开车把隔离区里的房子运出来。和我聊天时，他才刚刚跑完一趟运输。当然，那些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房子、家具、学校和幼儿园，它们只是一些处于半衰周期内的惰性化物体。可是，他们竟然把它们全都运了出来！我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哪里遇到他的——公共浴室，或啤酒柜台？——他告诉我：他们开了一辆卡车，三个小时里，他们就把房子拆了，装上了卡车，然后，在隔离区的边缘地带，会有一个人在那里接应他们。他们只需要把东西拆开。隔离区已经被卖掉了，里面的东西被运出来用于建造别墅。司机们靠这个挣一点钱，而且他们还会让司机们吃得饱饱的，并且用伏特加把他们全都灌醉。

我们中的有些人是掠食者——猎人兼掠食者。其他人则喜欢在树林里走来走去，玩一些小游戏，譬如说，和那些小鸟。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无数人因为这次事故而受难，但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此负责，接受惩罚。他们曾经把核电站的负责人关了起来，可是没多久他就被放了出来。在当时那个体系之下，你很难说谁是有罪的。他们试图在那里做点什么。我从报纸上看到，他们当时正在开发军事用的钚，用于制造核炸弹。正是因为如此，核电站才会爆炸。可是，如果这真是导致爆炸的原因，那为什么要在那里进行这项试验呢？为什么会是切尔诺贝利？为什么不是在法国或德国？

这件事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一直没有忘记它。谁都没有子弹，一颗子弹都没了，我们无法射死那只小狮子狗。我们当时有20个人，但是那一天，我们枪里都没有子弹了，一颗也没有。

假如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我们该如何生存？

我祈祷是为了什么？请你问问我：我祈祷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在教堂里祈祷。我总是自己一个人祈祷。我要爱！我也确实有爱。我为了自己的爱而祈祷！可是，对我而言——（这时，她稍作停顿。我能够看得出来，她并不想说。）我应该记住吗？也许，我应该把它们从记忆里赶走？我从没读过这方面的书，也从没看过这一类的电影。在电影里，我看到的是战争。在我爷爷奶奶的记忆中，他们根本就没有童年可言，他们拥有的只有战争。他们的童年就是战争，而我的童年就是切尔诺贝利。我来自于那里。你是一名作家，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这一切。戏剧和电影也无济于事。不过，尽管没有它们的帮助，我最终还是弄明白了这一切。我靠我自己了解并理解了这一切。我们都是靠自己走过了那场浩劫，我们不知道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怎么办。灾难发生时，我的思想无法消化和理解它。我母亲更是感到无比困惑。她是一名俄语文学教师，她一直告诉我生活中不能没有书。然而，你却找不到一本关于这一切的书。所以，她感到迷惘。没有书本的帮助，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她感到茫然与无助。我应该记住吗？我想记住，但是我又不想这么做。（听起来，她的这段话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或者，她是在和自己辩论。）如果科学家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作家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活和所经历的死亡帮助他们了解这一切。我的母亲就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不想思考这些事情，我只想快乐而幸福地生活。我为什么不能得到快乐和幸福？

我们住在普里皮亚季，那座小城就在核电站旁边。我在那里出生，然后长大——在一栋高大的建筑物的五楼。从我们家的窗户望出去，你就能看到核电站。4月26日——两天——那是这座小城的最后两天。现在，那座城市已经不再存在。留在核电站旁边的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座城市——那不是我们的城市。事故发生那天，我们的一个邻居坐在阳台上，透过望远镜观察着不远处的大火。而我们——那些男孩和女孩——则纷纷骑着我们的自行车，争相赶到核电站去看热闹。那些没有自行车的孩子还用一种嫉妒的眼光目送我们离开。没有人阻止我们，也没有人冲我们叫道："不要去！"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无论是我们的父母，还是老师都没有阻止我们。到了午饭时间，河边

上已经找不到钓鱼者的身影。他们全都回来了——后背被烤得漆黑。即便你在索契晒一个月的太阳，也不可能让皮肤变得那么黑。那是核晒伤！核电站飘出来的烟不是黑色，也不是黄色的，而是蓝色的！可是，没有人喝止我们。人们已经习惯了军事实验带来的各种危险：今天这里爆炸，明天那里爆炸。现在，核电站不过只是着火而已——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大火，像往常一样，消防员很快就会把大火扑灭。男孩们到处开玩笑："大家排成一队走进墓地，谁长得最高，谁就最先死。"我当时年龄很小。我的记忆里没有害怕和恐慌，可是我记得当时发生了许多很奇怪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和她妈妈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家里的钱和金器都埋了起来，但是她们都担心自己会忘了埋东西的地点。我的奶奶当时已经退休，有人从图拉给她带了一个萨马瓦尔铜壶，不知为何，当时她最担心的就是这只萨马瓦尔铜壶，还有爷爷的奖章，以及家里那台很老的辛格缝纫机。我们都被"疏散"了。我爸爸下班回家后，把这个词语告诉了我们。一切就像描写战争的书里写的那样。当我们已经坐上疏散市民的巴士之后，爸爸这才想起来忘了拿某样东西。于是，他跑回家，当他回来时，手里多了两件仍然套着衣架的新衬衫。这让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街上的士兵们看起来也很奇怪，有点像外星人。他们戴着呼吸面具，穿着防护服在街道上穿梭。"我们会怎么样？"人们不断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问我们？"他们立即反问道，"白色的伏尔加河就在那里，那些当官的就在河边，问他们去。"

我们坐在巴士上，天空像往常一样蔚蓝、透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包里和篮子里还装着复活节蛋糕和彩蛋。如果这真的是场战争，那它和我从书里看到的完全不同。按照我的理解，战争就意味着爆炸，四面八方都应该传来爆炸声。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得很慢，路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牲畜。人们在公路上追逐那些牛和马。空气中传来一股夹杂了灰尘和牛奶的气味。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大声地咒骂那些牧羊人："你们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赶到公路上了，你们这些白痴？你们这样做无异于在扬撒放射性灰尘埃！你们怎么不把它们赶到田里去？"对方听了，立刻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以同样恶狠狠的声音嚷嚷道，糟蹋这些黑麦和青草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没有人想过我们再也不会回到这里。在此之前，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只觉得头有些晕，嗓子有点痒痒的。年纪大的老妈妈们没有哭，但是那些年轻的女人都哭了。我妈妈也哭了。

我们到了明斯克。然而，我们必须花比平时贵两倍的价钱才能买到火车票。在车上，列车长给我们所有人倒茶，但是她每次都对我们

说："请把你们的茶杯给我。"我们根本就没有茶杯——难道他们的茶杯都用完了吗？不！不是的！他们怕我们。"你从哪里来？""切尔诺贝利。"随后，人们就躲开了。一个月后，我的父母获准进入公寓。他们得到了一条温暖的毯子，我的秋季外套和一本《契诃夫信件选集》——那可是我母亲的最爱。奶奶——我的奶奶——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不愿接受她制作的草莓酱——毕竟，那些草莓酱全都装在罐子里，全都密封了。他们在毯子上发现了一块"污渍"。我母亲用力地搓洗，然后甩干，可是污渍并没有消失。他们把那条毯子拿到了干洗店，事实证明那块污点是放射性物质"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他们用剪刀剪掉了那块斑点。毯子还是那条毯子，而我的衣服也还是那套衣服，但是我却再也不能盖着那条毯子睡觉，也不能再穿那套衣服。我并不怕它们——我恨它们！这些东西能够杀死我！我能够感觉到我的身体里有一股愤怒的情绪——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它，但是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所有人都在谈论那次事故：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公共汽车上，以及大街上。人们总是拿它和广岛的原子弹做比较，然而，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对于一件你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你又怎么可能会相信呢？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思考或讨论，你都无法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们离开了，离开那天，天空和以往一样蔚蓝、透亮。奶奶——她一直无法适应新环境和新生活。她十分怀念我们的老房子。她在临死前曾经说过，"我想要一些酸梅！"事故发生很多年后，酸梅仍然被禁止食用。因为它是吸收辐射最多的植物之一。

奶奶去世后，我们把她安葬在了她生活过的杜布罗夫尼基小镇。那座小镇位于隔离区内，区域周边都围有带刺的铁网，并且由佩枪士兵把守。他们只让成年人进入——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不让我进去。"孩子不得入内。"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去见奶奶了。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但是我懂了。你从哪儿能学到这些？哪里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的母亲承认说："你知道的，我讨厌鲜花和绿树。"她开始变得害怕自己。在墓地里的草坪上，他们会铺好一块桌布，然后放一些食物和伏特加在桌布上——这是为那些守夜的人准备的。然而，士兵带着放射量测定器冲进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草地、鲜花，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毒"的。我们该把奶奶葬在哪里？

我很害怕。因为害怕，我不敢去爱。我有一个未婚夫，我们已经在房契上登记了双方的名字。你听说过关于广岛幸存者的故事吗？就是那些在原子弹爆炸后活下来的人，他们只能和同是幸存者的其他人结婚。在这里，没有人写这些东西，也没有人谈论它，但是我们还活

着，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切尔诺贝利幸存者。他把我带回了家，我见到了他的妈妈。她是一个很和善的女人，是一家工厂的经济学家。她性格很活泼。就是这个很和善的女人，当她在获悉我出生于切尔诺贝利，是一名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难民之后，她问道："可是，亲爱的孩子，你能生孩子吗？"那时，我们都已经登记了！他为我求情，说道："我会离开家。我们会出去租一间公寓。"可是，我听到的却是："亲爱的，对某些人而言，生孩子就是一种罪过。"爱也是一种罪。

在遇到他之前，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他是一名艺术家。我们也曾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所有的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我跑到他的工作室，听到他冲着电话另一头歇斯底里地喊道："你很幸运！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他一直都表现得很冷静，甚至有些淡漠，他的话语中几乎很少出现惊叹或感叹的语气成分。然而，当时的他却表现得如此狂躁！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一个朋友住在一栋学生宿舍楼里，他朝隔壁看了一眼，结果发现住在那里面的女孩上吊自杀了。她用一些长筒丝袜吊死了自己。他把她放了下来，而我的男朋友当时就在他身边，他浑身颤抖着说道："你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你不知道他刚刚经历了怎样的一件事！他把她抱在怀里——他摸了摸她的脸。她的嘴角处还有一些白色的泡沫。假如我们能动作快一点，她也许就不会死了。"他只字未提那个死去的女孩，也丝毫没有为她的去世感到悲伤。他只是目睹了这件事，想把它记下来，储存在自己的资料库里，以便将来有一天能把这一幕画下来。这时，我开始回忆起他之前向我询问各种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信息时的情景：核电站着火时，那些火苗是什么颜色的？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猫和狗是如何被射杀的？它们是不是就躺在马路上？当时的人们哭了吗？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人是怎么死的？在那之后……我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了。我再也无法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是不是还想再见到你。我想，你看待我的方式其实和他一样。观察，然后记住。一切就像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我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和感觉。我做不到。

你知道生孩子也会是一种罪过吗？在那之前，我还从没听过这样的说法。

卡特娅·P

战争电影

这是我的秘密。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我只和一个朋友提过这件事。

我是一名摄影师。我带着一个信念去了那里：在战争中，你将会变成一名真正的作家。《永别了，武器》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于是，我去了那里。我看到，人们正在自己的花园里犁地；田地里，拖拉机和播种机正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我该拍些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常，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爆炸后的痕迹。

我的第一张照片拍摄于一个农业俱乐部。他们把一台电视机摆在舞台上，然后召集所有的人来看电视。他们认真地聆听戈尔巴乔夫的演讲——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在我们拍照的村子里，他们正在进行“钝化”工作。他们卖力地清洗房顶。可是，如果一位老太太的房顶原本就是漏的，你如何清洗呢？至于那些土壤，你必须把上面那层肥沃的泥土统统刨掉，刨掉后，剩下的就只有黄沙了。一位老太太遵照命令，刨掉了上层的沃土，但是随后又把撒在上面的肥料收集起来，打算以后再用。这样的场面实在太糟糕了，所以我并没有拍下来。

无论走到哪里，人们一见到我就说：“啊，拍电影的人。请稍等，我们给你找一些英雄来拍。”没过多久，他们就把一个老头和他的孙子推到了我面前。他们俩花了两天的时间把牛群从切尔诺贝利附近赶了回来。给他们拍完照片后，畜牧专家又把我带到了一个大坑旁，他们用推土机把那些牛全都埋进了这个坑里。可是，我压根就没想过要把这幅画面拍下来。于是，我转过身，背对着大坑，按照我们一贯以来宣扬爱国主义思想的纪录片传统，拍下了一位正在阅读《真理报》的推土车司机。远远地，我只能看到报纸上有一排巨大的加粗标题：“国家不会抛弃那些困难中的人民！”当我抬起头时，我开始庆幸自己的运气果然不错：我看到有一只鹤正降落在田里。这是一个象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我们都将成为最后的赢家！生命还会继续！

那些国道上全都洋溢着一层尘土。当时的我已经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灰尘，而是放射性尘埃。为了保护那些光学元件，我把摄像机藏了

起来。那是一个干燥的五月。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吸入了多少这种放射性尘埃。一个星期后，我的淋巴结开始肿大。但是，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那些胶片，就像战时的人保护军火一样，因为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就要来了。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此行的具体行程，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和思考得出了答案。一天，我开车在马路上走着，路上的尘土十分厚重，那感觉就像是在驾车穿越一堵围墙，然而第二天，在同一条路上，他们开始往路面上铺设石头，而且足足铺了两层或三层。这也就是说：这条路就是领导的必经之路，他们将在这条路上迎接自己的大领导。后来，我拍下了他们在这条刚刚铺好沥青的平整的道路上行走的画面。照片中，笔直平整的马路位于正中央，一厘米也没有偏。我还给这条马路拍了照，只不过我没有把它洗出来。

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这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放射量测定器显示出了一系列读数，报纸上报道的却是另外一组数据。渐渐地，我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家里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和一个可爱的妻子……我真是个白痴，竟然会愚蠢至极地跑到这里来！也许，他们会奖给我一枚勋章，可是我的妻子会离开我。幽默成了我们唯一的自我救赎的方法。那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笑话。在一个村子里，所有人都离开了，只剩下一名流浪者和四个女人。“你的丈夫呢？”她们彼此询问对方。“噢，那个无赖也跑到别的村子里去了。”如果你尝试着始终以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一切——面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面对他们铺路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小溪并没有断流，它仍然在潺潺流淌，生活也在继续。然而，这件事毕竟发生了。当我身边某个关系很亲密的人去世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太阳出来了，小鸟在天空飞翔，还有那些小燕子，过了一会儿，天开始下雨——可是，他已经死了。你能明白这种感受吗？我想从其他所有角度，全面地阐述这一切，我想让你知道当时的我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

我开始拍摄那些枝繁叶茂的苹果树。忙碌的大蜜蜂在枝叶间嗡嗡地飞来飞去。绿色的树叶间点缀着无数白色的小花，看上去就像是新娘的头饰。人们又忙了起来，他们花园里的鲜花也开始争奇斗艳。我把摄像机紧紧地握在手中，记录着这一切，但是我心里却很迷惘。这里的一切似乎有些不对劲！曝光很充分，照片也很漂亮，但是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没过多久，我突然意识到：我竟然什么气味都没闻到。花园里的花全开了，可是我根本闻不到花香！后来我才了解到，当人体摄入大剂量的辐射物质之后，人体会很自然地产生某种

生理反应，有时候，这一反应的表现形式就是身体的某个器官的功能出现了障碍。这时，我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她当时已经74岁高龄，什么味道也闻不到，我想，同样的事情大概也落到了我的身上。我们一共有三个人，我问另外两个人："那些苹果树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它们什么味道也没有。"我们的身体正在发生某种变化。那些丁香花竟然什么气味都没有——丁香花！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身边的所有事物都变成了假的。我就像生活在一堆电影道具当中。我无法理解这一切。我之前从没读到过任何与之类似的文章或报道。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隔壁住着一位大妈，她曾经在战争年代当过游击队队员。有一次，她给我讲了他们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包围但最终顺利撤离的故事。当时，她怀里还抱着自己刚刚满月的孩子。他们沿着一片沼泽地小心翼翼地向前走，那里到处都是德军。就在这时，她怀里的孩子突然哭了起来，孩子的哭声很有可能会暴露他们的藏身地点，德军也许就会趁此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为了保全整个大部队，她闷死了自己的孩子。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表现得很淡漠，就好像说的是别人的故事，而那个孩子也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已经不记得她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只记得在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感到十分恐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怕得要命。她干了些什么？她怎么能这样做？我以为，她的队伍想突围一定是为了那个男孩，为了救他，然而事实却是，为了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他们竟然活活闷死了一个婴儿。既然如此，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曾经亲身经历过那样的事情，事后，我绝对不可能继续苟活下去。当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可是当她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只要一看到她，我就会感到全身不自在。

那她又是如何看待我的呢？（说到这儿，他沉默了一小会儿。）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忘掉自己在隔离区内生活的那些时光的原因。我为自己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可是我就是不想打开那扇门。我想弄清楚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哪些关于我的事情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

一天晚上，我在旅馆里睡觉，窗户外突然传来一阵又一阵单调的隆隆声，与此同时，一些奇怪的蓝光也透过窗帘射了进来。我拉开窗帘：只见几十辆印着红十字，镶嵌着警报器的卡车沿着街道，悄无声息地开了进来。目睹此情此景，我十分震惊。我立刻就回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里的片断。战后长大的我们热衷于战争电影，在那里，你可以轻松地找到这些电影中的一些片断，还有那种感觉：如果其他所有人都已经离开，整座城市里就剩你一个人，你会怎么做？怎样做

才是正确的选择？你会装死吗？或者，你该怎么做？

在霍伊尼基，城市的中央有一座功勋纪念牌。这个地区所有最优秀的人的名字都被刻在了这个牌子上。但是，开车进入辐射区去接幼儿园的孩子放学的人是酗酒的出租车司机，不是那些名字被刻在牌子上的人。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成为了真正的自己。不过，疏散又是另一件事。他们首先让孩子撤离，把他们送上那些大巴士车。就在这一刹那，眼前的场景让我想到了战争电影里的情景，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接着，我就注意到身边的人们都和我一样。他们全都表现得和自己最喜爱的电影中的角色一模一样，《雁南飞》——简短的道别，两行热泪。事实表明，我们都在寻找一种自己所熟悉的行为方式。我们都想体验这一刻，这就是保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思维片段。一个女孩正在向自己的母亲挥手道别，她似乎想通过这一行动告诉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勇敢。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想，我大概会去明斯克，那些被疏散的人们也会被送到那里。到那时，我该如何和我的妻子和儿子道别呢？我想象自己也采用和那个女孩一样的方式和家人道别：我们会赢的！我们都是战士。在我能够想起的记忆当中，我的父亲穿过军装，尽管他并不是在编士兵。满脑子只想着钱，那是资本主义者，一心只考虑自己的命则说明你根本不爱国。战争年代，饥肠辘辘已经成了生命的一种常态。他们——我们的父辈们——经过了一场大灾难的洗礼，我们也必须挺过这场劫难，活下去。不然，我们就永远都无法成为真正的人。

我们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假如我们每天只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吃饭——那将会是一件奇怪且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情！

我们和一些清理人一起住在某个技术研究中心的宿舍里。他们全都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给了我们整整一手提箱的伏特加。这酒有助于摆脱辐射。后来，我们突然发现宿舍里还住了一个护士医疗队。医疗队里全是清一色的女孩。"啊哈，我们现在可找到乐趣了。"那些小伙子们说道。于是，他们中有两个人立刻就跑了过去；回来时，两人全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一对眼珠看起来似乎随时会从眼眶里掉出来一样。那些女孩正沿着走廊向前走。她们身上全都套着一件异常宽大的睡衣，下身则穿着肥大的短裤和带条纹的长款秋裤。因为不合身，那些衣裤全都拖到了地上，可是在这里，似乎根本没有人在意这些。她们身上的衣服看上去显得很旧，一看就知道是他人穿旧了的，而且没有一件是合身的。那些衣服穿在这些姑娘们身上就像是挂在大衣架上一样，四处飘荡。这些女孩中有人穿的是拖鞋，有的

则穿着一双早已四分五裂的大靴子。她们头上全都戴着一种像是用橡胶制成后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头套，无论走到哪儿，她们都戴着它，有人甚至就连晚上都戴着。那情景实在是有些不堪入目。而且，她们也并非护士，而是一群来自于军事研究部门的工作者，刚刚从研究所里出来。她们被告知是出来度周末的，但是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她们已经在隔离区内待了一个月了。她们告诉我们，她们被带到了核反应堆，察看那里燃烧后的情况。除了她们，再也没有人和我们谈起过被烧毁的核反应堆。直至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以及她们的样子，我甚至可以闭着眼睛在那栋宿舍楼里穿梭，就像梦游者那样。

在报纸上，他们写道：幸运的是，当时的风向并非吹往城市，吹向基辅，而是恰好吹向其他方向。他们说得没错，可是，当时的大风带着那些放射性物质吹向了白俄罗斯，吹向了我和我的尤里克。那天，我们正在树林里散步，同时顺便摘了一些野生的卷心菜。上帝啊，为什么没有人警告我？从树林里出来后，我们回到了明斯克。我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在车上，我无意中听到了其他乘客之间的一些对话片段：他们正在切尔诺贝利拍电影，结果一名摄影师很快就死在了那儿。他是被烧死的。听了他们的话，我不禁开始琢磨，那个被烧死的摄影师是谁，是我认识的人吗？接着，我又听到：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他还有两个孩子。他们最终说出了他的名字：维特亚·格列维奇。我的确知道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摄影师，他的确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可是，他有两个孩子？他为什么从没和我们提到过？在工作室里，我和他很熟。就在这时，有人出来纠正道："不是格列维奇，是古林·谢尔盖。"上帝啊，那是我的名字！现在，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不过，当我下车后向工作室走去的时候，我开始有些担心了：如果我一推开门就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当成遗像摆在那儿，我该怎么办？接着，另一个荒谬的想法又出现了：他们从哪儿弄来的我的照片？是从人力资源部吗？

这些流言蜚语到底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我想，这应该是由此次事件的规模大小与遇害者人数多寡之间的不协调而导致的。譬如说，库尔斯克战役——数千人在此次战役中丧生，考虑到此次战役的规模和重要性，大多数人都能对如此庞大的死亡人数表示理解。然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当中，在事故发生的最初几天，遇难者只有七名参与灭火的消防员。后来，遇难者的人数又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在那之后，我们所获得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定义和信息突然就变得抽象起来——"数代之后"、"永远"、"无可奉告"——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就产生了：长着三个脑袋的小鸟，小鸡把狐狸啄死了，刺猬的刺掉光了。很快，各种各样的谣言就开始在民间流传。没过多久，他们需要一个人去那里执行任务。一位摄影师带来了医生的证明，说他患有溃疡，另一位摄影师当时正在休假。他们便把我叫来了。“你必须再进去一次。”“可是，我才刚刚从那里回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找你。你已经去过了，所以对你而言，再去一次也没有关系。另外，你已经有孩子了，而其他人都还年轻。”啊，耶稣，也许，我还想要五个，或六个孩子呢！但是，他们才不管这些，开始向我施压，说什么我们很快就要重新评定薪水，你完成了这项任务一定对加薪有帮助。这是一个悲伤却不缺乏乐趣的故事。我已经把它放进了我脑海中的一个小角落里。

有一次，我为那些曾经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录像。被拍者全都无一例外地试图避免与对方见面。对此，我表示理解。让大家再度相聚，回忆那场战争，这的确会让当事人感觉不自然。从那种刻骨铭心的羞辱中走过来的人，或者说，那些曾经目睹过人性本质的人都会选择这样做——逃离对方，越远越好。对于切尔诺贝利，我有一种感觉，但是我又真的不愿谈及这段往事，我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矛盾。譬如说，我不愿谈论一个事实，即我们人类关于人文主义的各种观点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极端情况下，人们的表现往往会和你在书中读到的大相径庭，至少，两者之间会存在很显著的差异。人们迟早会选择另一条路。人并不是英雄。

我们都是如此——都是《启示录》的传播者。有的很伟大，有的则很渺小。我记住了那些人的样子，还有那些画面。集体农庄的主席想要两辆车来运送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全部衣服和家具。与此同时，在长达数天的时间里，他们始终都没有找到足够的车辆来运送就读于当地小学的那群孩子——这都是我目睹的事情。然而，在这边，两辆车也不足以装下某人的全部身家，包括许多容积为三升的装满果酱和腌制蔬菜的罐子。第二天，我眼看着他们又装了整整一车的行李。我没有把这些画面拍下来。（说到这儿，他突然大笑起来。）我们带了一些萨拉米香肠和一些罐头食品，可是我们却不敢吃它们。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把它们扔掉，而是带着它们四处奔波，因为我们舍不得。（他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我通过所见所闻而明白的一个道理。人们会说他人的闲话，会拍老板的马屁，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自家的电视机和样式丑陋的皮毛大衣。直到混乱结束，所有

的人都一样。事情通常都是如此。

当拍摄全部结束之后，我却无法为整个摄影小组谋求到任何福利，对此，我的感觉很不好。我们中的一个人需要一间公寓，我曾经为此事去找了联合委员会：“帮帮我们吧，我们曾经在隔离区内待了六个月。我们应该得到一些福利。”“好吧，”他们说，“把你的证书给我们。你需要证书证明这一切，加盖了公章的证明。”然而，当我们去找隔离区的地区委员会申请证书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女人。她叫娜丝佳，我们去的时候，她正拿着拖把拖来拖去。所有人都跑了。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位主任，他有整整一摞的证明书：他去了什么地方，他拍了什么照片和录像。他是英雄，真正的英雄！

我把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制作成了一部场面恢弘的大电影，虽然我没有把它拍出来，但是我把它存在了自己的脑袋里。这部电影由许多片断组成。（沉默。）我们都是《启示录》的传播者。

有一次，我们和士兵们一道，走进了一间小棚子，棚子里住着一位年迈的老太太。

“好了，女士，我们走吧，离开这儿。”

“当然了，孩子们。”

“你先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奶奶。”

我们在小棚子外一边抽烟，一边等她。过了一会儿，这位老太太走了出来：她带了一座小雕像、一只猫，以及一个塞满了东西的小包袱。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老奶奶，你不能带这只猫走。这是被明令禁止的。它的皮毛上带有辐射。”

“不，孩子们，没有它，我哪儿也不去。我怎么能丢下它？我不会把它独自留在这里。它是我的家人。”

于是，这位老太太，以及那棵没有任何气味的苹果树就构成了我这部作品的开头。现在，我只拍动物。有一次，我把自己在切尔诺贝利拍的照片拿给孩子们看，结果人们立刻发火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该看到那些东西。然而，孩子们就应该生活在恐惧当中，聆听大人们关于这一切的谈话吗？他们的血液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免疫系统已经被打乱。我希望能有五至十名观众，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整个电影院都坐满了。观众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个男孩提问时稍稍有些口吃，而且小脸也

涨得通红，看得出来，他平时一定是个很安静的小男孩：“为什么没有人能帮帮那些动物？”就在他说出这个问题的那一瞬间，他已经成了一个来自未来的人。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的艺术可以反映人遭受的苦难和接受及付出的爱，却不能反映所有有生命的物体。我们的艺术只有一个主角：人类。我们不会把自己降低到它们的层次：动物、植物以及另一个世界。而切尔诺贝利人的眼界却更开阔，他会向世间的一切挥手致意。

为了这个问题，我四处寻找答案，询问有关的人，后来我获悉，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曾经有人提出过将动物和人一起疏散的计划。可是，该如何执行这一计划呢？你该如何安置那些动物呢？好吧，也许你能够转移那些在地面以上生活的动物，可是你该如何处置那些生活在泥土中的动物呢——甲虫和蠕虫？还有那些在天上飞的鸟呢？你用什么方法才能把鸽子或麻雀也像人一样疏散呢？最重要的是，你该怎么处置它们？我们根本无法与它们沟通，把当前的情况告诉它们。这也是一个哲学难题。在这里，我们的情感正在发生变化。

我想拍一部关于动物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就叫《人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变得和动物、树以及鸟越来越亲近。我感到自己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我和它们靠得更紧了。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地进入隔离区，我亲眼看到一头野猪从一个被荒废的农家院里跳了出来，一只麋鹿紧随其后。这就是我的拍摄素材。我想拍一部电影，通过动物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你在拍什么？”人们对我说，“看看你周围。车臣正在打仗。”可是，圣弗朗西斯曾经向鸟儿们传道。他以一种平等的语气和方式向它们布道。假如那些小鸟用它们的语言回答他，或者，他没有放下身段，主动向它们传播福音，情况又会怎样呢？

谢尔盖·古林
摄影师

一声尖叫

停下来，好人！我们只能住在这里！你来到这儿，和我们交谈，然后离开，可是我们只能生活在这里！

看看这里，我面前这些都是医疗卡。我每天都会带着它们。我把它们捧在手里——每天如此！，

安雅·布代——生于1985年——380贝克。

维特亚·格林科维奇——生于1986年——785贝克。

娜丝佳·夏布洛夫斯卡亚——生于1986年——570贝克。

阿廖沙·普雷宁——生于1985年——570贝克。

安德烈·科特申科——生于1987年——450贝克。

他们说这不可能。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在甲状腺里——怎么可能活下去？可是，又有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呢？每天，我都会看报、看电视。你能帮助我吗？不！你帮不了我！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是为了提问？还是为了接触我们这些人？我拒绝拿他们的悲剧做交易。我不能为了那些肤浅的哲学道理就出卖他们。请离我们远一点，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们还要在这里活下去。

阿卡迪·巴甫洛维奇·勃丹科维奇
乡村医护员

一个全新的国家

独白者：尼娜·康斯坦丁诺芙娜、尼古拉·普罗霍洛维奇·扎科夫，两人均为老师。尼古拉教劳动力研究，尼娜教文学。

尼娜：

我听到的死讯实在是太多了，多得我都已经麻木了。你有没有听过孩子们谈论死亡？我的那些七年级的学生们就经常谈论死亡：死亡可怕吗？一般来说，孩子们通常都会问：我从哪里来？那些婴儿是怎么来的？现在，这些孩子却开始为核战争后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担忧。他们不再喜欢经典的文学作品。我在课堂上为他们背诵普希金的作品，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冷漠、丝毫不感兴趣的小脸。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阅读科幻小说，这能给他们带来乐趣。在那些书里，人们离开地球，拥有了宇宙时间，见识了各种不同的世界。他们也害怕死亡，但是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于成年人；死亡让他们感兴趣，就像那些奇幻的宇宙空间。

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当死亡接连不断地在你身边出现的时候，你会迫于现实开始思考它。在学校里，我教孩子们俄语文学，但是现在的孩子已经和我十年前教的学生截然不同。他们不断地看到身边的人或物被埋葬，或是被埋进地下：房子、树乃至一切。如果你要他们站成一队，15或20分钟后，他们当中就会有人晕倒，还有些孩子会开始流鼻血。你无法令他们感到惊喜，也无法让他们高兴起来。他们总是很疲惫，并且经常昏昏欲睡。他们的脸色苍白，甚至有些发青。他们不玩游戏，也不会相互打闹嬉戏，四处跑动。假如他们打架，或是不小心打破了玻璃，老师们反而会感到喜出望外。我们从不训斥他们，甚至不会高声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和普通孩子不一样。他们长得很慢，事实上，他们长得实在太慢了。课堂上，当你要求他们复述你刚刚说过的话时，他们往往都做不到，实际上，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句子，他们也无法完整地复述出来。这不禁会让你忍不住想问他：“你刚才思绪飘去哪儿了？在听课吗？”

对此，我想了很多。这就好比我用水在墙上画画，没有人知道我在画什么，没有人猜得出来，谁都看不明白。我们的生活始终没有离

开过切尔诺贝利。当事故发生时，你在哪里？你家住在距离核反应堆多远的地方？你看到了什么？谁死了？谁还活着？他们都去哪儿了？我记得，事故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这里的餐馆又再度变得人满为患——“你这辈子只能活一次”、“如果我们会死，就让我们死在音乐声中”。无数的士兵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还有那些官员。可是现在，切尔诺贝利和我们在一起，形影不离。一位年轻的孕妇突然猝死，死因不详，病理专家并未对她的死亡作出任何病理诊断。一个小女孩上吊自杀了，她才刚读五年级。她选择了自杀……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只有一个解释——切尔诺贝利。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切尔诺贝利。”我们的这种状态让人们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喻：“你们都有病，而病因就是你们内心的恐惧。在你们身上，恐惧已经成了一种病态。你们这叫放射恐惧症。”可是，那些年幼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虚弱，他们为什么会死呢？他们并不知道“恐惧”为何物，他们甚至都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我把那些日子都记在了心里。当时，我觉得喉咙火烧火燎，全身都像灌了铅一样，行动困难。“你患了忧郁症，”医生对我说，“现在，因为切尔诺贝利，所有人都这样。”“什么是忧郁症？我感到很虚弱，全身酸疼，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和丈夫两人都因为害羞而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双腿却渐渐失去了知觉。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们的朋友，身边所有的人都怨声载道。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会突然就想躺下来，躺在街道上。课堂上，学生们会趴在自己的课桌上，昏昏睡去。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沮丧而低落，一整天都绷着一张脸。没有人笑，你也见不到其他表情。从早上8点直至晚上9点，孩子们都只能待在学校，因为跑出学校，到处乱跑是被明令禁止的。

学校会给每个孩子发校服：女孩们分到的是短裙和上衣，男孩们的则是西装。然而，放学后，他们穿着这些衣服回到家，我们对于在此之后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按照规定，妈妈们应该每天都清洗校服，如此一来，孩子们每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去上学。但是，首先，孩子们只分到了一套校服——一件上衣、一条裙子。其次，他们的妈妈已经被繁重的家务压得直不起腰——鸡、牛、猪都需要她们喂养。最后，她们实在不理解这些衣服为什么每天都要洗。毕竟，弄脏衣服的不过是一些墨水、泥巴或油渍，并不是具有半衰期的放射性同位素。当我试图向学生的父母们解释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在他们听来，我的话大概就像非洲部落的巫师在祭祀时所念的咒语，根本听不明白。“辐射是什么？它是一种既听不到也看不到的东西……好吧，

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辐射的事情：我工资支票上的钱不足以支付账单。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们只能喝牛奶、吃土豆。明白了吗？”一位母亲说，忘了它吧。因为你不应该喝牛奶，也不应该吃土豆。政府向商店输送了一些中国炒货和一些荞麦粉，可是人们到哪里去筹钱来买这些东西呢？我们因为居住在这里而获得了一些补贴——死亡赔偿——可是那补偿少得可怜，只够买两听罐头食品。校服的清洗制度是为某些人制定的，它针对的是某一种家庭环境，然而，我们并不具备那样的环境！我们这里也没有那种人！而且，伦琴和贝克之间的差异也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

在我看来——我认为这就是宿命，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例如，按照规定，各家花园里生产的农作物及植物在第一年里是被禁止食用的，可是人们却照吃不误，用它们做成各种日常的食品。他们栽种的所有植物都长得非常好！你可以尝试着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吃这些黄瓜和西红柿。他们会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能”？它们的味道好极了。你把它们吃下去，而你的肚子并不会有任何的不适。而且在黑暗中，没有任何物体会“发光”。就在那一年，我们的邻居用当地树林里的树木为房子铺设了一层新地板。测量时，仪器显示，他们家的背景辐射量超标了100倍。然而，谁也没有因此而拆掉新做的地板，他们继续生活在那里，心想一切最终都会变好，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即便他们什么也不做。一开始，人们还会用放射量测定器去测量一些东西的辐射强度——读数显示，所有东西都超标了，渐渐地，人们不再测量。“眼不见为净。谁知道那些科学家们发明的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他们犁地，播种，然后丰收。不可思议的灾难发生了，可是人们依然要像以往一样继续他们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不准食用自家花园里长的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更重要。整个夏天，孩子们都被要求待在学校里，士兵们用一种特殊的泡沫将学校彻底清洗了一遍，还把学校里的表层土壤全都挖掉了。秋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当秋天来临时，他们派学生去捡甜菜根。学生们穿着技术兵一样的装备，被带到田地里，在那里劳动。其他所有人都被赶走了。在他们看来，把成熟的土豆留在地里不收割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更糟糕。

谁是那个应该受到指责和惩罚的人？难道是我们吗？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留意过身边的一切。它们就在那里，譬如说天空和空气，某人把它们送给了我们，它们永远属于我们，却并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它们就在我们身边，一直都在那儿。过去，我经常会躺在树林里，仰望天空，那种感觉简直棒极了，以至于陶醉于其中

的我有时候甚至都会忘记自己的名字。而现在呢？树林依然还是那么美丽，到处都长满了蓝莓，可是再也没有人去树林里采摘。秋天，树林里已经几乎很少传来人的声音。恐惧已经植根于我们的情感之中，成为了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我们还有电视和书，想象力也依然存在。孩子们在各自的房子里渐渐长大，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树林，也没有河流。他们只能注视它们。这是一群完全不同的孩子。我走向他们，然后为他们背诵在我看来堪称经典的普希金的作品。就在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有一天，我们的文化世界彻底变成了一截老树桩，上面零散地插着几根由陈旧的手稿形成的树枝。假如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我所热爱的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的，我们都曾接受过军事化教育。这种教育的导向就是阻挡核袭击，清理核残骸。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各种现代化战争的到来——化学战争、生物武器以及原子能战争。但是，我们从没学习过如何将放射性核物质从我们的身体器官中清除干净。

你不能拿它和战争做比较，可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我曾亲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当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你不能拿它们做比较。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就在前线附近，不断地遭到炮火的袭击。那时候，饥荒横行，连年累月的饥荒使人们渐渐显露出其动物的本性。可是，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请你到外面的花园去看一看，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生机勃勃！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但是，我想说一说其他的事情——我跑题了——不知不觉就说到其他事情上了。当战斗打响后，你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你随时都有可能被子弹打中，今天——不是将来的某天——可能就是你的忌日，你随时都有可能倒地身亡。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在列宁格勒，人们焚烧家具取暖，我们公寓里的所有木质器具都被烧光了，所有的书也全都烧掉了。我记得，我们当时甚至都只能用旧抹布点炉子。一个人在街道上行走，走到一个地方，他坐了下来。第二天，当你从那儿经过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人还坐在那儿——他已经冻僵了——他可能会在那儿坐上整整一个星期，又或者，他可能会一直坐到春天来临。那时，万物复苏，他也解冻了。没有人有多余的力气为他除去身上的冰雪。有时候，当某人跌倒在雪地里的时候，也许会有人走上去拉他一把。但是大多数时候，人们通常都只是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或爬过。我记得，那时的人们都不走路，他们都在地上匍匐前进，你可以想象得出那速度有

多慢。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当反应堆着火时，我妈妈还和我住在一起，那时，她不停地说：“儿子，再糟糕的情况我们都经历过，并最终活了下来。我们是围城战的幸存者。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比那还可怕的事情了。”

我们做好了迎接核战争的准备，我们修建了原子庇护所。我们想借助它们把自己藏起来，从而躲过原子弹的进攻，就像我们当初对付榴霰弹一样。可是现在，原子无处不在。面包里、盐里，到处都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含有放射性物质，吃的食物也已经受到了核辐射污染。也许，你没有盐和面包，没有任何食物，以至于为了生存，你可以吃下任何东西，甚至于煮皮带吃——对于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可是，我真的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有毒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怎么活下去呢？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大家都很害怕。那些医生、老师——简而言之，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丢下了所有的家当，落荒而逃。他们不顾一切地想离开这里。可是，军纪如山，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此地。为此，我们该责怪谁？为了回答该如何生存下去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谁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那个人是谁？是科学家，还是核电站的人？或者，是核电站的负责人？当班的操作员？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经常幻想的那样，和汽车作战，却偏偏要向核反应堆宣战？我们要求关闭所有核电站，并且把所有核物理学家都关进监狱，可以吗？我们诅咒他们！可是，知识是无辜的，知识本身并无过错，学习和了解知识并不犯法。今天，科学家们也已经成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受害者。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弄明白这一切。

现在，人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已经不同于以前。十年过去了，人们会从战争的角度来衡量事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持续了四年的战争。如此一来。我们就好像经历了两次战争。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的人们对此有何反应：“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事实证明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再感到害怕。”“我们都会死！我们所有的人很快都会死！”“我想离开这个国家。”“他们需要帮助我们。”“啊，让一切见鬼去吧。我们要活下去。”我想，上述内容已经足以涵盖人们的各种观点。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在我看来——我们都是原材料，其目的就是为在国际实验室里开展的科学实验服务。记录下这一些数据，实验自己的所有想法。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莫斯科、彼得堡、日本、德国和奥地利——然后就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他们在为将来做准备。（说到这儿，他陷入了沉默。这次谈话也因此而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我又想到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比较。我在想，我可以谈论切尔诺贝利，但是我却不能谈论当年的围城战。他们曾经给我发过一张请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名为“亲历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孩子们”的会议。我去了，可是当我到了那里之后，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谈恐惧？不行。只谈恐惧——我们在家里从来不提围城战，我妈妈不想让我们记住当年那惨烈的情形。可是，我们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他稍作停顿。）我们彼此间并不会谈论这个话题，只有在有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外国人、记者以及那些不住在这里的亲戚——我们才会谈论它。我们为什么不谈论切尔诺贝利？譬如说，在学校里？和我们的学生？当他们去国外接受治疗的时候——在奥地利、法国、德国——他们会谈论它。我问孩子们，人们都和你们聊什么？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们通常都记不住自己所去的城市或村庄的名称，也记不住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那些人姓什么，但是他们总是会记得自己收到了哪些礼物，以及吃到了哪些好吃的食物。有的孩子得到了一台录音机，有的孩子则没有。他们回来时穿的衣服精致且漂亮，他们的父母根本买不起那样的衣服。我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就像是被送到外国展览的展品。这些孩子一直在等某个人来接他们再度出国。他们会像上次一样，将这些孩子展示在众人面前，然后再给他们一些礼物。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在体验过这种盛大的“出国”经历之后，在经历过这种昂贵的展览之后，他们必须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我能够看得出来，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旁观者。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那里有许多我雕刻的木质雕像。孩子们很喜欢这些雕像。我说：“你们也可以用树干制作出这样的作品。试试看。”振作起来！这能够帮我走出围城战，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段痛苦的回忆。

我们常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都很有耐性。因为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害怕谈论这件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谈论它。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经历，由此所引发的问题也绝非普通的问题。这个世界也因此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我们，切尔诺贝利人，一边是你们，其他人。你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有人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把自己称为切尔诺贝利人。“我们来自切尔诺贝利。”“我是一名切尔诺贝利人。”听上去就像切尔诺贝利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全新的国家。

书写切尔诺贝利

蚂蚁正围着树干爬行。到处都是军事装备。全副武装的士兵，啼哭声，诅咒的话语，各种誓言，还有直升机发出的巨大噪音不绝于耳。可是，蚂蚁们依然围着大树有条不紊地爬行。

当时，我正在从隔离区回家的路上，那一天，在我看到的所有事物中，在我的记忆里，唯一保持整洁的就只有这些蚂蚁。当时，我们正在树林里行走，我停了下来，站在一棵白桦树边抽烟。我站的位置距离大树很近，我整个身体都斜靠在树上。就在我脸的正前方，那些蚂蚁排着队，沿着树干向上爬，丝毫没有理会我们。我们马上就会重新上路，而它们也不会多看我们一眼。至于我？我还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些小家伙。

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说："这是一场灾难。"后来，大家又说："这是一场核战争。"我曾经读过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籍，也曾经看过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纪录片。那的确很可怕，但是不难理解：原子弹，爆炸半径。我甚至能够想象得出当时的情景。可是，我却始终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场灾难。

你感到一种完全看不见的东西正在进入并摧毁这个世界，同样，它也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你的身体。我记得我曾经和一位科学家谈过此事。"它的后遗症会延续数千年，"他解释说，"铀238的分解取决于它的半衰期。折合成我们的时间来说，那需要10亿年的时间。而钍的半衰期更长：140亿年。"50、100、200。可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些数字，也完全超出了我能够理解的范围。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混乱，我无法理解这一概念：时间是什么？我在哪里？

现在，距离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才刚刚过去了十年。你要把它写下来？我想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你无法解释清楚，你自己也理解不了。我们现在仍然会尝试着想象一些和我们的日常事物相似的东西，试图用它来解释这一切。我试过了，可是这根本无济于事。切尔诺贝利大爆炸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关于切尔诺贝利的神话。报纸和杂志为了竞争，相互攀比，看谁能写出最吓人的文章。那些不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往往喜欢阅读那种能让人心惊胆战的内容。大家都曾读过介绍体积有人的脑袋那么大的蘑菇的文章，可是从没有人亲眼见过这样

的巨型蘑菇。因此，你应该记录下这一切，而不是自己撰写。就像档案那样。你能找得到一本关于切尔诺贝利的科幻小说吗——不，你找不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书！因为事实比小说更惊险、更神奇。

我有一个笔记簿，我一直都在记录。我在本子上记下了人们的谈话、坊间的传言、逸事。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而且这上面的内容都没有时间。古希腊最后给我们人类留下了什么？古希腊神话。

这就是我的笔记簿。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电台一直在反复不停地广播：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

“斯大林时期的词语又开始流行起来：‘西方秘密机构的代理人’、‘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们’、‘企图破坏不可动摇的苏联人民大联盟的反动势力’。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间谍和破坏分子，根本没有人谈论碘防护问题。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被认为是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

“昨天，总编把我文章中一段关于一位消防员母亲的故事删掉了。核电站发生爆炸当晚，这个女人的儿子在火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事后，他死于高强度的辐射中毒。当他们的儿子在莫斯科下葬之后，这对老夫妻回到了自己的小村庄，不久后，这个村子里的人也被疏散了。秋天时，他们偷偷地从树林里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并且收集了一袋子土豆和黄瓜。那位母亲感到很满意：‘这些东西装满了整整20个罐子。’他们的信念植根于这片土地，深深地扎根于他们多年来的乡村生活经历之中——即使是儿子的去世，也无法扭转这一习惯。

“‘你听欧洲自由广播电台的节目吗？’我的编辑问我。我什么也没说。‘我们根本无须在这份报纸上对此事表现得大惊小怪，危言耸听。给我写得详细一些，多写点关于英雄的事情。’

“可是，那些关于敌人的老观念不是早就没了吗？敌人是看不到的，他无处不在。这才是躲藏在新伪装后面的邪恶势力。

“中央委员会派来了一些指导人员。他们的路线是：从酒店乘车前往地区司令部，然后再乘车返回酒店。他们通过阅读当地报纸上的新闻标题来了解和研究当前的局势。他们从明斯克带来了整整一箱三明治。他们用矿物质水泡茶。矿物质水也是他们带来的。这些都是宾馆里值班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的。人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电视或广播——他们从大人物的行为中寻找信息，用这种方式找到的信息更可

靠。

“隔离区最流行的说法就是，红牌伏特加是防御锶和铯的最佳工具。

“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很想将他搂进怀里，让其他一切都见鬼去吧。可是，我不能这样做。

“乡村商店的货架上突然堆满了各种紧俏物资。我听到地区领导在演讲时这样说道：‘我们将会在地球上为你们营造一个天堂。你们只需要留在这里，继续劳动。总有一天，萨拉米香肠和荞麦粉组成的食物海洋将会把你淹没。你们将会得到那些顶级高端商店里陈列的所有商品。’他说的这一切都成为了现实，只不过是在地区高层的冷餐会上。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是：伏特加和萨拉米香肠已经足够了。可是，让他们都见鬼去吧！我还从没在乡村商店见过那么多种类的萨拉米香肠。我给妻子买了一些进口的长筒丝袜。

“有那么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买得到放射量测定器，但是一个月之后，它们就消失了。你不能写这件事，也不能写这里有多少放射性浮尘，更不能写村子里只剩下那些男人们，女人和孩子都已经被疏散转移的事实。整整一个夏天，男人们自己洗衣服、挤牛奶，在自家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耕种。当然，他们也会喝酒，以及打架。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他们把那个村庄的名字划掉了。‘别忘了，我们还有敌人。我们的敌人就在大海的那一边。’总编用一种带有威胁意味的口吻再次对我说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里只有好东西，没有坏东西。可是，与此同时，他们正在某个地方加工一些特殊的食物，有人还看见大人物们全都拎着自己的手提箱……

“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在警察设置的封锁岗亭附近拦住了我：‘你能去我的小屋看看吗？现在是时候该把土豆挖出来了，可是那些士兵不让我过去。’他们被转移了。一具尸体被装进了真空袋，一个人什么行李也没拿。他们绕过一个军事封锁哨，用各种办法悄悄潜回了自己的村子——穿越大雪覆盖的树林，借着夜色穿越了沼泽地。后来，他们被军人追逐和驱赶，那些军人坐在直升机和汽车里。‘一切就像回到了过去，当年的德国人也是这么干的。’一位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人如是说。

“我第一次看到了洗劫者。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披着两件皮毛外套。当时，他正在努力地向一队巡逻的军人解释，他正是靠这种方法来治疗自己的放射性疾病。当他们将他打倒在地之后，他这才终于承认：‘第一次也有一点害怕，但是几次之后，你就会习惯。你

只要开一枪，然后就跑。’你不能让自我保护意识阻碍你的本能。在正常情况下，这简直不可能。但是，我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完成了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包括犯罪。

“一年后，我回到了村子里。那些狗都已经完全变成了野狗。我找到了我们的雷克斯，我叫它的名字，可是它并不过来。它是不是没有认出我？或者，它不想过来？它在生我们的气。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所有人都变得很沉默。到处都是一片寂静。大家都很疲惫，都已经虚脱。你需要离开这儿，但是，你想，你可以留到最后一天。不。你的大脑已经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我根本想不起任何重要的对话内容，我只记得那些笑话。‘现在，所有的商店里都有无线电（又可译为“放射性”，此处为一语双关——译者注）产品。”虚弱分为两种，一种是放射性的，一种是无线电性的。’接着，突然之间，这些笑话又全都销声匿迹了。”

以下是在医院无意中听到的：

“这个男孩死了。他昨天还给了我一些饼干。”

在市场排队时听到的：

“哦，好人，今年这里的蘑菇格外多。”

“它们都是有毒的。”

“噢，你真是个奇怪的人。没有人强迫你吃它。买回去，晾干，然后把它们拿到明斯克的市场上去卖。你很快就会变成百万富翁。”

“他们完全按照天堂的旨意选择修建教堂的地址。教堂的神父会收到上帝的神示。在修建教堂之前，他们还会进行各种神秘的仪式。然而，他们修建核电站时就像是在盖一座普通的工厂，看上去几乎和猪圈无异。他们用沥青浇筑核电站的屋顶，现在，那些沥青全都熔化了。”

“你看过这个吗？他们在切尔诺贝利附近抓到了一名擅离职守的士兵。他给自己挖了一个洞，而他就住在核反应堆旁边。他去那些荒废的房子里寻找食物——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些猪油，然后又在那儿找到了一些罐头泡菜。他还设置陷阱抓捕动物。他之所以会擅离职守，离开部队，是因为那些老兵欺负年轻的新兵，有人甚至因此而活

活被‘打死’。他救了自己——这全靠他躲到了切尔诺贝利。”

“第一条狼狗出现了，它们是狼和那些跑进树林的狗的后代。它们的体型比狼大，通常都不会留意那些旗帜，而且它们既不怕光，也不怕人，更不会对猎人们发出的呼唤作出回应。就连那些野猫也都已经聚集到一起，它们袭击人类，想要报复我们。之前存在于它们脑海中关于要服从人类，忠于人类的记忆全都消失了。对我们人类而言，现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也在渐渐消失。”

“有一天，他们将会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墓地的残留物。科学家们把用于埋葬动物的墓场称为生物墓地。那些都是一些现代寺庙。那里面埋着成千上万只被他们射杀的猫、狗和马。那上面一个名字也没有。”

“昨天是我爸爸的八十大寿。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为他庆祝。我望着他，心想他这一辈子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古拉格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切尔诺贝利事件。他们这一代人目睹了一切。不过，他很喜欢钓鱼。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经常惹妈妈生气，她说：‘他认识行政区内所有的女孩，他从不会错过认识女孩的机会。’现在，我注意到，每当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向我们走来时，爸爸都会垂下眼皮，放低目光。”

“隔离区是一个单独的世界。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却又不同于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斯特鲁盖斯基兄弟创造了这个世界，只不过这一次，文学走在了现实的前面。”

来自于坊间传言：

切尔诺贝利的后面有一片营地，据说他们打算把那些摄入高剂量辐射物的人们都安置到那里去。他们会把这些人在那里集中起来，观察他们，最后再把他们埋在那儿。

他们正在用巴士把邻近村庄的死人运出去，汽车会直接开到墓地，然后把他们全都埋进一个巨大的坟墓里，就像当年他们处理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尸体一样。

有些人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晚上看到核电站的上空出现了一道奇怪的光线。甚至还有人拍了照片。从胶卷上来看，那应该是从一个地面物体上散发出来的蒸汽。

在明斯克，他们清洗了火车和所有的库存物品。他们要把所有的

人都迁移到西伯利亚去。他们已经修好了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旧营地。他们会首先转移女人和小孩。乌克兰人都已经上船准备出发了。

这不是一场事故，而是地震。地球的核心部分出了问题。这是一次地质性的爆炸，是地质力量和宇宙力量作用的结果。军方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们本可以向人们发出警告的，但是军方将它当成了高级军事机密，要求严格保密。

现在，河里和湖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没有头或尾巴的梭子鱼。河面上漂的全都是无头无尾的鱼的身体。

很快，类似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人类身上。白俄罗斯人都会变成类人生物。

树林里的动物都因为放射性物质的辐射而得了奇怪的疾病。悲伤的它们四处游荡，这些动物都长着一双悲哀的眼睛。猎人们都怕它们，并且会因为替它们感到难过而无法开枪射击。动物已经不再害怕人类。狐狸和狼跑进村子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切尔诺贝利人生下的孩子，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而是一种未知的黄色液体。有科学家坚持声称，猴子之所以会聪明，就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放射物附近。三四代人之后，在那里出生的孩子都会和爱因斯坦一样聪明。这是一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宇宙实验……

安纳托里·施曼斯基
记者

谎言与真相

他们已经写了几十本书。每本书都很厚，上面标满了注释，然而，这件事仍然无法用哲学的观点解释清楚，任何哲学描述都无济于事。有人对我说——也有可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切尔诺贝利问题本身首先是一个自我理解的问题。事情似乎就是如此。我一直在等某个有文化的聪明人向我解释这一切。或者，他们可以用那种持之以恒、苦心研究“市场！市场！自由的市场！”的方法来帮助我。可是，我们——我们这些在一个没有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里长大的人，现在却只能接受生活中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的事实。

我是一名专业的火箭设计者，专门研究火箭燃料。我住在拜科努尔（一个航空发射中心）。程序、宇宙、国际卫星，这些东西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你把天空、北极以及所有的一切都送到了人们的眼前！你把整个太空都送给了他们！苏联的全体人民跟随尤里·加加林一起，进入了太空，摆脱了地球引力。我们成功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出色的俄罗斯男人，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微笑，就连他的离世都像事前演练过一样。

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搬到了白俄罗斯，并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来到这儿之后，我立刻就投入到了针对切尔诺贝利地区的研究中。对我而言，这是一项极富颠覆意义的工作，它改变了我对事物的许多看法。尽管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所接触到的全都是最先进的技术——外太空技术，但是我在那里看到的一切却超乎我的想象。换言之，你根本想象不到那是一番怎样的情景。你也很难解释清楚——那儿的一切都超乎人们的想象——那是——（他在思考。）你知道吗，一秒钟以前，我以为我想明白了，可是一秒钟后——它会让你有一种立刻就此开展哲学探讨的冲动。无论你和谁谈论切尔诺贝利，他们都会将谈话上升为哲学范畴内的探讨。我宁愿和你谈谈我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们正在修建一间教堂——一间切尔诺贝利教堂，为了纪念上帝的母亲，我们要把它献给“惩罚”。我们四处募捐善款，拜访那些病人和即将离世的人们。我们把这一切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我们正在创建一座博物馆。过去，我常常这样认为：带着一份这样的心情，我根本无法从事

这种工作。我接到的第一个工作指令就是："这里是一些钱，你把它分给35个家庭，事实上，就是把这些钱分给35个寡妇。"她们的丈夫都是清理人，所以你必须要做到公平分配。可是，怎样才算公平呢？有一个寡妇带着生病的小女儿独自生活，另一个寡妇则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自己已经生病了，她独自租了一间公寓，但是除此以外，另一个寡妇家里还有四个孩子要抚养。晚上睡觉时，我会突然醒来，脑袋里则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该怎样做才能不欺骗任何人呢？"我拼命地想，然后计算，算来算去什么办法都行不通，最后又只得继续再想。我做不到。最后，我们按照名单上的名字，把所有钱平均分给了这35个女人。

不过，博物馆才是我真正的孩子：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他开始沉默。）有时候，我想这里将会出现一个葬礼大厅，而不是一间博物馆。我为葬礼委员会服务。今天早上，我刚刚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脱下外套，一个女人一边哭一边走了进来，事实上，她不是在哭，而是在咆哮："把他的勋章拿走，还有那些证书！把那些奖金也全都拿走！把我的丈夫还给我！"她就这样咆哮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留下了他的勋章和证书。这些东西将会被放进博物馆，在那里展出。所有的人们都会看见它们。可是，她哭了，除了我没有人听到她的哭声，当我把这些证书放进展柜的时候，我会记住她，还有她的哭声。

现在，亚罗舒克上校也快死了。他是一名化学家兼放射量测定员。他曾经健康得像头牛，可是现在，全身瘫痪的他只能躺在床上。他的妻子像翻一个枕头一样为他翻身。她用汤匙给他喂饭。他患有肾结石，那些结石应该被打碎，然后排出体外，可是我们没有钱为他做那样的治疗或手术。我们都是乞丐，依靠人们的施舍生存。政府则表现得像借贷人，它已经忘记了这些人。等他死后，他们会用他的名字为街道或学校或军事团队命名，但是这一切只会发生在他死以后。亚罗舒克上校。他穿越了整个隔离区，标记出了那些放射量最高的地区或地点——他们像利用一件工具一样利用他，并且利用到了极致，仿佛他就是一个机器人。对此，他心里很清楚，但是他还是去了，他走到了核反应堆，然后从那里徒步走遍了放射半径以内的所有地方。徒步！他只带了一只放射量测定器。他发现一个"地方"辐射量很高，然后他就围绕那个地方走上一圈，最后，把这个地点精确地标记在他的地图上。

那些曾经在核反应堆屋顶上工作过的士兵呢？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前后共有210个军事团队被派往那里，清扫灾难过后遗留下来的辐射微尘，其总人数达到了34万。事后，那些清扫屋顶的人情况最糟

糕。他们身上都穿着铅质的防护服，但是辐射来自于他们的下方，而他们的脚下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他们穿着普通且廉价的人造革靴子。每天，他们都会在屋顶上逗留一分半至两分钟。事后，他们就全体复员了，政府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证书，以及一些奖赏——100卢布。在此之后，他们就消失在了祖国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在屋顶上，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集燃料和石墨，以及水泥板和金属渣。他们用20秒至30秒的时间把这些垃圾装上手推车，然后，他们还要用30秒的时间才能把这些“垃圾”从房顶上倒掉。这些特殊的手推车每一辆光自重就达到了40千克。你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套铅质的防护服、面具、手推车，以及近乎疯狂的速度。

在基辅的博物馆里，有一个与士兵帽子大小相当的石墨模型。据他们说，如果这是一块真的石墨，其重量可以达到16千克，由此可以看出石墨是一种密度很大、质量很重的物体。在那里，他们使用的通过无线电控制的机器经常会失灵，或是执行与原指令相反的命令，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机器的电路板受到了高辐射的干扰。因此，最可靠的“机器人”就是那些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绿机器人”（因为他们穿的军装制服是绿色的）。总共有3600名士兵曾经在被炸毁的反应堆屋顶上工作过。这些士兵全都睡在地上。他们都曾提到过一开始，他们还把搬来的稻草铺在帐篷的地上——而这些稻草全都来自于核反应堆附近的稻草堆。

他们都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现在，这些壮小伙都已经奄奄一息，可是他们明白假如当初没有他们，情况将更加不堪设想……这些人都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追求成就和功绩的时代文化。他们把自己当做祭品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在清扫过程核电站曾一度陷入极其危险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再度爆炸。士兵们必须将核反应堆下的冷却水输导出来，从而使得反应堆中的铀及石墨混合物不会渗入其中——这种混合物一旦遇到水就会生成一种极其危险的物质，而且极易爆炸。这时，一旦爆炸，这些物质就会产生300万至500万吨TNT当量。到那时，不仅基辅和明斯克会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不毛之地，大半个欧洲都将在劫难逃。你能想象得出来吗？那将会是一场祸及全欧洲的空前大灾难。于是，士兵们接到了一项任务：谁能潜入水中，拧开安全阀上的螺钉？他们承诺会为执行任务的士兵配发轿车、公寓、别墅，并且保证会一直资助他们的家庭，直到世界末日。他们四处寻找志愿者，最后，他们找到了！小伙子们潜入水池，一次又一次，最终，他们拧开了那颗螺钉。这群执行任务的小伙子事后得到了7000卢布的奖赏。但是，他们忘了自己曾经许诺会给他

们汽车和公寓——可是，小伙子们并不是为了这些奖励才自告奋勇！他们自我牺牲不是为了物质奖励，至少不是为了他们之前承诺的那些物质奖励。（他开始变得有些沮丧。）这些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些文件和档案留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和他们的名字一起。可是，如果当初没有他们，或者他们没有这样做呢？从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从来就是不平等的。

我见过一个曾经参与过这项任务的人，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把人类生活的价值看得太低了。他说，这是一种亚洲人的宿命观。一个愿意牺牲自我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他很渴望在生活中扮演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早前，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人，就像那些统计数据。他没有任何主题，只能充当其他人或事的背景。现在，他突然成为了主角。这是他对生活意义的一种渴望和追求。我们的宣传活动是由什么组成的？又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现在，你得到了一个机会，虽然你会因此而死去，但是你能够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并且为他人所知。他们将会给你一个角色！这就是死亡的真正意义，因为死亡是永恒，而你也将通过死亡成为永恒。这个人一直坚持己见，并试图说服我。

可是，我并不赞同他的这种观点！绝对不赞成！是的，国家和人民把我们培养成了一名士兵。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们总是要响应国家的动员，要随时做好准备去执行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我高中毕业之后，我想去普通的大学读书，我的父亲听了我的想法，震惊不已："我是一名职业军官，而你竟然打算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祖国需要我们的保护！"为此，他一连好几个月都没和我说话，直到我递交了申请书，要求就读军校。我的父亲曾经打过仗，现在他已经死了。可是，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物质财产。他死后，什么也没留下：既没有房子、汽车，也没有土地。我从他那儿得到了什么呢？一个军官包。他在芬兰战役前得到了这个包，他的军功章都装在这个包里。此外，我还有一个装有300封信的大包裹。从1941年开始，他从战地前线寄回来的信都被我和妈妈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不过，在我眼中，这些全都是无价之宝。

现在，你能明白我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博物馆了吗？那个瓮里装着一些来自于切尔诺贝利的泥土。满满一捧。我们还有一个矿工的头盔，也是在那个地区找到的。此外，你还能看到一些来自于隔离区的农用器械。我们不能把放射量测定器放在这里——我们都在发光、都在燃烧！但是，每一件在这里展出的物品都必须是真实的。这里没有

石膏复制品。我们需要让人们相信我们，而人们只相信那些真实的事物，因为关于切尔诺贝利，我们身边的谎言实在是太多了。以前有，将来还会有。他们甚至已经开始筹备基金会和商业机构……

既然你正在写书，那你一定要看看某些很特别的胶片。这些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收集回来的。这不是一部关于切尔诺贝利的纪录片，不，他们不可能让其他人拍摄这样的影片，这是绝对禁止的。即便有人想方设法拍摄了一些片断，政府当局也会立刻把它收走，当它还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被毁了。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疏散居民的纪录片，也没有反映他们驱赶牲畜的胶片。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拍摄这种悲剧性的场面，他们只让人拍摄那些英雄事迹及画面。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切尔诺贝利的相册，可是又有谁知道有多少摄影机和照相机因此而惨遭毁灭呢？人们都被拖进了官僚主义的洪流。关于切尔诺贝利，说真话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现在依然如此。相信我！但是，你真的应该看看这张照片：所有消防员的脸全都一片漆黑，就像石墨。他们的眼睛呢？这些就是那些早知自己将会离开我们的那些人的眼睛！这是一张残缺的胶片，上面是一个女人的两条腿。就在灾难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前往位于核电站旁边的田里干活。她走过一片草地，绿色的小草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看着她的这两条腿，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壁炉，里面塞满了东西，一直没到膝盖，而且到处都是网眼。如果你正在写书，你一定要看看这些。

我回到家里，可是我却不能把我可爱的儿子抱在怀里。我需要先喝50克至100克伏特加，才能把他举起来。

博物馆里有一个部分专门介绍在切尔诺贝利执行飞行任务的直升机飞行员。在那里，你会看到沃多拉兹斯基上校的名字。他是俄罗斯的英雄，现在长眠于一个名为祖科夫·拉格的白俄罗斯村庄里。当他摄入了超过规定剂量最大上限的放射性物质后，他本可以立刻离开那里，但是他留了下来，又为他们培训了另外23名直升机飞行员。他本人总共执行了120次飞行任务，运输了重达230吨的货物。在距离核反应堆300米的空中，他平均每天飞行4到5次，而他机舱内的温度更是高达60摄氏度。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无数袋沙子从空中撒下的时候，地面上会是怎样一番情景。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每小时摄入的放射性物质高达1800伦琴。飞行员还在空中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辐射的存在。为了命中目标——一个充满火焰的大坑——他们会把头伸出机舱外，用裸眼测量距离。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在政府委员会召开

的大会上，人们每天都在简单地重复同样的话：“我们需要为此牺牲两至三条生命。至于这个，一个人的性命就够了。”同样的话每天都在重复。

沃多拉兹斯基上校死了。在标明他所摄入的放射性物质剂量的医疗卡上，医生们写道：7贝克。可事实上，这一真实数据应该是600贝克！

还有那400名奋力工作，在核反应堆下面开凿信道的矿工呢？他们现在又怎么样了？按照工程师的要求，他们需要一条隧道向地下注入液态氮，从而使核反应堆周围的土地迅速冷却冻结，不然，地下水就会涌入核反应堆。于是，来自莫斯科、基辅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矿工们随即赶到了这里。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读到或看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信息。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在核反应堆下面，赤裸着上身，在高达55摄氏度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四肢着地，在狭窄的坑道里推动小车前进。隧道里的放射剂量高达几百伦琴。现在，这些人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天堂。可是，假如当时他们自私一点，没有那样做呢，情况又会如何？我把他们当成是战争中的英雄，而不是受害者，尽管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他们将切尔诺贝利事件称之为事故、灾难，可是，那就是一场战争。切尔诺贝利纪念碑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战争纪念碑。

有些事情我们并没有展开讨论，这正是我们斯拉夫人的谦逊之道。但是，既然你正在写书，你就应该知道这一切。那些在核反应堆及其附近工作的人，在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人当中，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们的泌尿生殖系统都会出现功能性障碍。可是，没有人会大声地清楚地把它说出来。这样做是不被大众所接受的。我曾经陪同一位英国记者采访过一段时间，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他对于故事中的人性内容十分感兴趣——人们在家中会怎样，他们的家庭生活如何，他们的私生活又如何？然而，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抱着诚实坦率的态度与他探讨这些问题的谈话者。他要我去把一些直升机飞行员召集起来，然后和一些男人们一起与他们展开对话。他们来了，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退休了，尽管他们当时还只有35岁或40岁，还有一个人拖着一条残缺的腿赶来了——辐射软化了他的骨头。但是，他还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赶来了。这个英国人问了他们一些问题：现在，你和家人相处得如何？和你的妻子呢，你们之间的关系融洽吗？飞行员们沉默了，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告诉人们，在那里，他们每天都要完成五次飞行任务，然而他想了解的竟然是他们的妻子以及她们现在的情况？这算什

么问题？于是，英国人开始挨个提问，结果他得到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回答：我们很健康，政府很重视我们，我们的家庭生活很融洽，家人相亲相爱。没有一个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对他敞开心扉，说出实话。他们走了，我感觉他被彻底打垮了。“现在，你明白了，”他对我说，“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们？你们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那次会面的地点是在一间咖啡馆里，为我们服务的两名女服务员都非常漂亮。他对她们说：“你们能回答我一些问题吗？”她们满足了他的要求。他说：“你们想结婚吗？”“想，但是不是在这里。我们都希望能嫁一个外国人，这样我们就能生出健康的孩子。”她们的坦诚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呃，你们有伴侣吗？他们怎么样？能满足你们吗？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对吗？”“你已经看到那些男人了，”女服务员笑着说道，“直升机飞行员？身高6英尺。身上戴满了亮闪闪的军功章。在被那些主席团成员接见时，他们都表现得很出色，可是在床上那就另当别论了。”那个英国人给这两个服务员拍了照片，然后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们了吗？你们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

我和他一起去了隔离区。据统计，切尔诺贝利周围一共有800个废物掩埋点，而这一数字也早已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数据。他原本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些造型奇异的工程结构，然而最终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有一些极其普通的沟渠。沟渠内是一片“橘子色森林”。核反应堆周围方圆150公顷的土地全都被这片奇异的树林所覆盖。（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天内，核反应堆周围的松树和常绿植物的树叶就全都变成了红色，然后又变成了橘子色。）那些沟渠里埋有成千上万吨金属和钢铁，还有各种管道、特殊服装以及水泥结构。他给我看了一张刊登在一本英国杂志上的俯瞰全景图。在图片上，你可以看到不计其数的汽车、飞行设备，以及多得数不胜数的消防车和救护车。最大的一块墓地就坐落在核反应堆旁边。尽管现在距离这张照片的拍摄日期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但是他仍然想拍一些关于那块墓地的照片。他们向他保证，如果他能弄到墓地的照片，他们将会付给他更多的钱。为此，我们四处奔走，不断地拜访各位官员，有的人没有照片，有的人又无许可权。为了照片，我们辗转于各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那座墓地已经不存在了。它现在只存在于他们的账本里——很久以前，那块墓地里的东西就被瓜分了，然后被运到了市场上，那些拆下来的零部件现在正存放于集体农庄以及人们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偷走并运出了隔离区。对此，英国人表示无法理解。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然而他不相信我。事实上，就连我自己，当我读到那些最勇敢的

人写的文章时，我也同样会表示怀疑。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这也是一个谎言呢？"关于这场悲剧的评论已经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这甚至已经成了我们相互问候的一种方式！就像田里的稻草人！（这时，他看上去显得极度失望，然后就一直沉默不语。）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进博物馆。是我让它的展品逐渐变得丰富。有时候，我会想："忘了吧！离开这儿！"我的意思是，我怎么能够接受这一切？我曾经和一位年轻的牧师聊过一次。当时，我们俩站在军士长萨沙·冈察洛夫的墓碑前。他曾经登上过核反应堆的屋顶，清扫那里的垃圾。当时，天正在下着大雪，北风呼啸。糟糕的天气。这位年轻的牧师矗立在风雪中，肃穆地朗读悼文，头上连帽子都没有戴。事后，我对他说："刚才的你似乎一点都不冷。""没错，"他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里，我总会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没有任何一项教堂仪式能像悼文一样，让我拥有如此强大的能量。"我记住了他的话——这个经常出现在死亡身边的男人说过的话。我常常会问那些外国记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为什么要求进入隔离区？如果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钱或为了工作，那无疑是愚蠢的。"我们喜欢这里，"他们说，"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到一种真实的爆发性的生命能量。"这样的回答让你很意外，对吗？我想，对于他们而言，这里的人，以及他们的情感和世界就像某种尚未被发掘的宝藏，具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引人入胜。不过，我从没想过要弄清楚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没问过他们究竟是因为喜欢我们这些人才来这儿，还是因为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写作素材，或者他们能够通过我们明白某种道理。

为什么我们要执著地与死神为邻？

切尔诺贝利——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第二个世界。首先，它将我们脚下的土地撕裂开来，然后将各种痛苦真真切切地砸在我们身上，但是现在，我们意识到，对我们而言，这世上已经没有第二个世界，我们无处可去。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是一种悲剧——在这里，你拥有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那些从战争中归来的人们被称为"失落的"一代。我们也是。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的苦难。这也是我们唯一的资本，是无价之宝！

我带着这一切回到家——我的妻子耐心地聆听我的诉说——然后，她平静地说道："我爱你，可是我不会让你得到我的儿子。我不会让任何人得到他。切尔诺贝利？不！车臣？不！任何人都休想得到他！"恐惧已经在她的心里扎了根。

谢尔盖·瓦西列维奇·索博列夫
切尔诺贝利保护协会执行委员会代理负责人

人民的话

清理人之妻：克拉布夫迪娅·格里格日耶芙娜·巴舒克，医生；塔玛拉·瓦西耶芙娜·贝卢卡亚，普里皮亚季被转移居民；叶卡捷琳娜·费多罗芙娜·波布洛娃，记者；安德烈·布尔提斯，儿科医生；伊凡·瑙莫维奇·维基伊契科，布拉金定居点居民；叶莲娜·伊利妮契娜·沃容科，清理人之妻；斯维特拉娜·戈沃尔，转移居民；娜塔丽娅·马克西莫芙娜·冈察连科，纳洛夫里亚定居点居民；塔玛拉·伊利尼契娜·杜比科夫斯卡娅，医生；阿尔伯特·尼古拉耶维奇·扎里茨基伊，医生；亚历桑德拉·伊凡诺芙娜·克拉布夫特索娃，放射学家；埃莉奥诺拉·伊凡诺夫娜·拉杜坚科，助产士；伊莉娜·尤里耶芙娜·卢卡舍维奇，转移居民；安东尼娜·马克西莫芙娜·拉里沃契科，水气象学者；安纳托利·伊凡诺维奇·波利斯楚科，母亲；玛丽娅·雅可芙列芙娜·萨维列耶娃，清理人之妻；尼娜·汉特耶维奇

我上一次见到快乐的准妈妈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一个快乐的妈妈。有一个女人最近刚生完孩子，分娩的阵痛尚未完全消失，然而，她却迫不及待地对医生说：“医生，给我看看孩子！把他送过来！”她抚摸着孩子的脑袋、额头、细嫩的身体以及胳膊和双腿。她仍然不放心，想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医生，我生的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对吗？他所有的一切都正常吗？”他们把孩子送过来喂奶。她有些害怕：“我就住在离切尔诺贝利不远的地方。我还曾经去那里看望过我妈妈，并且被当地的黑雨淋得透湿。”

她跟我们提起过她之前做过的一些梦：她生了一头有八条腿的小牛，或是一个长着刺猬脑袋的小狗。她的梦境都很离奇。在过去，女人.通常都不会做这样的梦。或者，至少我从没听人提起过。我做助产士已经30年了。

我是一名教俄语的教师。我想，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六月上旬，当时正在考试，校长突然把学校里的全体教职人员都召集起来，宣布说：“明天，每个人都带一把铁铲来学校。”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要我们把学校表层已经被污染的土地挖掉，稍后，士兵们就会来这儿为我

们把地铺好。老师们一下子提了很多问题："他们会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防护型装备？他们会带一些特殊装置吗，譬如说呼吸器？"最后，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不会"。"拿上你们的铁铲，出去挖土吧。"只有两位年轻的老师拒绝了这一要求，其余的人全都走到操场上，开始挖土。虽然大家都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情——这种想法已经扎根于我们的心中：尽管有困难，尽管危险，但是为了保卫祖国，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平时不正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学生的吗？冲上去，冲进火海，奋力抵抗，牺牲。我所教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是生命，而是战争：肖洛霍夫、绥拉斐摩维支、富曼诺夫、法德耶夫、鲍里斯·波勒沃夫。只有两名年轻的老师拒绝了这项任务。可是，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代人，他们来自于新的一代——那是一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从早上一直挖到晚上。回家途中看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备感诧异：那些商店竟然还开着门，女人们正在里面挑选长筒丝袜和香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紧张的战争气氛，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所以如果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人们排长队购买面包、盐及火柴的情景，我们反而会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所有人都应该赶紧回家，急急忙忙地把买到的面包烤成面包干。尽管我出生于战后，但是对我而言，这一切似乎都很熟悉。我甚至能想象出我将会如何离开自己的房子，我和孩子们将会在临行前做些什么，我们会带走什么东西，以及我会如何给妈妈写信。不管怎样，生活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电视上还是会播放喜剧电视。然而，我们却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已经深谙在恐惧中生活的生存之道。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从这一点来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找不到和我们一样的人。

士兵们进入村庄，开始疏散居民。村子的街道上停满了各种军事装备：装甲运输车、蒙着绿色防油帆布的军用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人们在士兵的带领下离开自己的房子，当时的气氛十分压抑，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历过战争的人而言。一开始，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俄罗斯人——这全是他们的错，这是他们的核电站。

人们不断地把这件事和战争做比较。然而，这比战争的影响更大。对于战争，你尚能弄明白，可是，这一切呢？人们陷入了沉默。

我好像哪里都没去。每天，我都在自己的记忆中穿行。沿着那熟悉的街道；经过那些熟悉的房子。那是一座相当安静的小城。

那是一个星期天，当时，我正躺在外面，想晒出一身古铜色的肌肤。我妈妈跑过来："孩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全都躲进了自己的房子里，而你竟然躺在这里晒太阳！"我听了，哈哈大笑："切尔诺贝利距离纳洛夫里亚有整整40公里的路程。"

那天晚上，一辆日古力汽车停在了我家门前，我的朋友和她丈夫走了进来。她身上只穿了一件浴袍，她丈夫则穿了一套运动服和一双有点旧的拖鞋。他们沿着那些狭窄的乡村公路，穿越树林，从普里皮亚季开车赶到了这里。警察已经开始在那些路上巡逻，军人们还设置了路障，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她一进来就冲着我大叫："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给我们！"进门后，她就一直在大声叫嚷，"我们才刚刚买了一套新家具，一台新冰箱。我还给我自己做了一件皮毛大衣。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那儿，我用玻璃纸把它包了起来。我们一整晚都没有睡觉。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丈夫试图想让她冷静下来。一连好几天，我们都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讲。然而，政府当局却什么也没说。直到五一节之后，戈尔巴乔夫这才出现，对大家说：不要着急，同志们，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人们还在那里，继续生活和工作。

他们把所有从已经完成疏散的村庄里找到的牲畜都赶到了位于我们地区中央的一个指定地点。那些奶牛、公牛和猪都像疯了一样在街道上横冲直撞——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带回家。那些装满罐装肉制品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肉类加工厂开出来，直奔卡里诺维奇火车站，然后再从那里把货物运往莫斯科。莫斯科不接受这批货物，于是，这些已经变成墓场的火车又开了回来。长长的一列火车，最终，我们把它们埋在了这里。夜晚，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闻到腐肉发出的恶心气味。"难道这就是核战争留下的气味？"在我的记忆中，战争过后，弥漫在空气中的应该是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和烟味。

一开始，他们还利用晚上的时间用巴士把里面的孩子接出来。他们试图用这种办法来隐瞒灾难，但是最终还是被人们发现了。坐在车上的他们带着无数罐牛奶，他们还烤各种各样的派。一切就像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地区的行政管理人员在办公室里开了一个会。那感觉就像是所有人都必须作好战斗准备。所有人都在等民防办的负责人发话，因为除了十年级物理课本上介绍的关于放射性物质的那一点点资料以外，大

家根本就记不起任何关于福射的事情。他走到讲台上，开始照本宣科地介绍书本上关于核战争的知识：一旦一名士兵摄入的辐射量达到了50伦琴，他就必须离开战场；如何建造核避难所；如何佩戴防毒面具；关于核爆炸半径的一些情况。

我们乘坐一架直升机进入受污染地区的上空。当时的我们全副武装——没有贴身的紧身衣，外面套着一件用廉价棉布做成的雨衣，看起来就像厨师制服，雨衣上涂了一层防护材料，此外，所有人都戴着一双厚厚的连指手套，以及一副嵌有薄纱的外科手术面具。我们身上还背着各种器械。我们飞到了一个村子附近，并从那儿开始进行低空飞行。我看到地面上有一群男孩正在沙地上玩，看上去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一个孩子的嘴里含着一块石头，另一个则咬着一根树枝。他们都没有穿裤子，赤裸着身体在外面玩耍。但是，上面有命令，不能惊扰当地居民。

现在，我和这一切生活在一起。

他们突然开始在电视上插播一些片断：一位老太太正在挤奶，她把挤出来的牛奶倒进一个罐子，随后，一个手持军用放射量测定器的记者走了过来，测量那罐牛奶的辐射物水平。这时，评论员就会指着仪器上的读数说：看，一切都很正常，核反应堆距离此地只有十公里远。他们播出了普里皮亚季河的录像，画面里，有人正在河里游泳，还有一些人则躺在河边晒太阳。在画面上，你可以看见远处的核反应堆，以及一团团从反应堆上升起的黑烟。评论员说：西方世界企图通过谣言，散布关于这一事故的虚假信息，从而引起我们的恐慌。说到这儿，他们又拿出了放射量测定器，检验一条放在盘子里的鱼或巧克力棒的辐射量，或是用它去测量露天薄饼摊上盛放的薄饼。这些画面全都是谎言。片断中使用的军用放射量测定器是由我们的军队制造的，其用途是用于测量背景的放射量，而不是用于测量单件物品。

这些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及其程度之深无不令人诧异，唯一能够与之相抗衡的就只有那些在重大战争中出现的谎言了。

我们都在期盼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我的丈夫希望是个男孩，而我则想要个女孩。医生们反复不断地劝我，试图说服我："你应该堕胎。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他曾经是一名卡车司机，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叫他去那儿干活。他的工作就是运送沙子。

然而，我不相信任何人。

那个孩子生下来时就已经死了。她比正常的孩子少了两根手指。她是个女孩。我哭了。“她至少应该拥有完整的手指，”我想，“她是个女孩。”

没有人能够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给军队总部打电话——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肩负着军事使命——并自愿去那儿帮忙。我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一名少校。他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人。”我想说服他：“首先，年轻的医生们还没做好准备；其次，由于年轻人更容易受辐射影响，所以他们受到的威胁比我们更大。”他回答说：“我们有命令，只接受年轻人。”

病人伤口的愈合速度开始变慢。我还记得第一场辐射雨——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黑雨”。首先，你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其次，我们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不同寻常、最强大的国家。我的丈夫拥有大学学历，是一名工程师，他非常认真地想说服我，这都是恐怖主义作祟的结果。这是敌人在搞分化、搞破坏。当时，拥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可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个在建筑行业工作的男人曾经和我提到过斯摩棱斯克核电站的修建情况：无数水泥、木板、钉子和沙子被人从建筑工地偷走，然后卖给附近村庄里的人，其目的就是为了钱，为了能够买到一瓶伏特加。

官员们会去村庄和工厂视察，并且向平民们发表讲话，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惰性化作用、如何保护孩子，更不知道核泄漏对食物供应的影响系数是什么。他们对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一无所知，也不明白“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这些词语的具体含义，更不清楚同位素是什么。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们发表演讲，谈论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讲述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勇士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要受西方间谍机构的诡计蛊惑。

我很害怕，不敢再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给了我一个放射量测定器，可是我能用它干什么呢？我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又白又整洁，可是那个测定器突然狂叫起来。我做了一些吃的，烤了一个派——它又开始响。我铺床——它也响。这样的东西，我要它干什么？我喂我的孩子吃饭，突然，我就哭了起来。“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我有两个儿子。他们没有上学前班，也不上幼儿园——他们总是

待在医院里。大的那一个——他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秃顶。我带他去看医生，也曾经光顾过治疗术士。他是他那个年纪的孩子里个子最小的一个。他不能跑步，不能玩耍，假如有人不小心碰他一下，他就会立刻开始流血，并且很有可能因此而死亡。他患有一种血液疾病，我甚至都说不出这种病的名称。我和他一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心想："他就快死了。"后来，我才明白——你不能这样想。我躲在浴室里哭泣。没有妈妈会在医院的病房里哭泣。每当她们想哭的时候，妈妈们都会躲进厕所或浴室。当我从浴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看上去神采奕奕："你的笑脸红扑扑的。你正在慢慢恢复。"

"妈妈，带我离开医院吧。我会死在这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

现在，我该去什么地方哭泣？浴室？浴室门口有一条队伍——所有和我一样的人都在那里排队。

5月1日，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们让我们进入了墓地。他们让我们去墓地里祭奠亲人，可是警察们仍然不允许我们靠近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不过，我们至少能从墓地那儿远远地看一眼我们的家。我们在那里默默地祝福它们。

让我告诉你，住在这里的都是什么人吧。我会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在那些"变脏了"的地区，他们用中国牛肉、荞麦面粉及各类五花八门的商品塞满了当地的商店。人们说："哦，这里真好。现在，无论你用什么办法，我们都不会离开这里了。"土地受辐射污染的程度并不相同——一个集体农庄可能既有"干净的"土地，也有"变脏了"的土地，而且两块土地彼此相邻。在"变脏了"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得到的报酬更高，于是，所有人都想争得这一工作机会。他们拒绝在"干净的"土地上劳作。

不久之前，我弟弟从远东赶来看我。"你们这里的人就像黑匣子。"他说。他指的是安装在飞机上，记录飞行信息的黑匣子。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聊天、散步和吃饭，彼此间相亲相爱。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记录信息！

我是一名儿科医生。孩子的情况不一样。例如，他们并不认为癌

症就意味着死亡——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者之间尚未创建关联。而且，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诊断结果、他们正在服用的药物、治疗过程的名称。他们知道得甚至比他们的妈妈还要多。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往往会出现一种很惊讶的表情。他们带着这样的表情，躺在那里。

医生向我发出了警告：我的丈夫很快就会死。他患了白血病——血癌。他去过切尔诺贝利的隔离区，从那儿回来两个月后，他就开始生病。他是被工厂派到那里去的。有天早上，他下了夜班回到家：

“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去那里干什么？”

“在集体农庄工作。”

他们在距离切尔诺贝利15公里处的隔离区内工作：用耙子将稻草堆成垛，收集甜菜，以及挖土豆。

他回来了。我们一起去探望他的父母。就在他和父亲一起抹墙粉的时候，他突然晕倒了。我们叫来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他身体内的白细胞数量多得足以致命。

从医院回来后，他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我快死了。”他变得很安静。我试图想说服他，这不是真的。我苦苦地哀求他，然而，他不相信我。接着，我提到了女儿，希望能让他因此而相信我。早上，我一觉醒来，望着他：我自己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你不应该思考太多关于死亡的问题。我努力让自己甩掉这些念头。如果当时我知道他会因此而生病，我一定会关上家中所有的门，我会死死地堵住门口，用家里所有的锁把所有的门都锁上。

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就一直带着儿子四处寻医问药，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我不想读到和看到任何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内容和信息。我目睹了全部过程。

医院里的小女孩会和自己的洋娃娃玩游戏。她们合上娃娃的眼睛，那个娃娃就死了。

“洋娃娃为什么会死？”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会死。他们生出来，然

后就会死掉。”

我的阿尔焦姆今年7岁，可他看上去更像一个5岁的男孩。他会闭上眼睛，我以为他睡着了。于是，我开始哭泣，以为他不会看到。可是这时，他问我：“妈妈，我是不是快死了？”

他睡着了，几乎没有呼吸声。我跪在他床前：“阿尔焦姆，睁开你的眼睛，说点什么。”我对自己说，“他还是有体温的。”

他睁开眼睛，然后又睡着了，睡着的他看上去那么安静，就像死了一样。

“阿尔焦姆，睁开你的眼睛。”

我绝不会让他死。

不久之前，我们才刚刚庆祝了新年的到来。我们什么都有，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制的：熏肉、猪油、肉、腌肉。只有面包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就连伏特加都是我们自己的。当然，“我们自己的”就意味着它们产自于切尔诺贝利，而这也就代表它们含有铯，而且回味起来还有一点锶的味道。可是，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呢？村子的商店早已是空空如也，而且就算那里面有东西卖，仅凭我们的薪水和养老金，我们也买不起任何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家还来了一些客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邻居，为人和善而且年轻。他们中的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集体农庄的技师，和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喝酒，吃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歌。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都唱起了老歌——那些革命歌曲，战争年代的歌曲。“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上。”那是一个快乐的夜晚，一切就像从前一样。

我写信把那天晚上的情景告诉了我的儿子。他还在上学，住在首都。他在给我的回信里写道：“妈妈，我能够想象出当时的场景。这太不可思议了。在切尔诺贝利的土地上，在我们家里。新年树闪闪发光。人们围坐在桌子旁，快乐地高唱革命歌曲和军事歌曲，就好像他们从没去过古拉格集中营，也从没听说过切尔诺贝利事件。”我开始感到害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的儿子。他已经回不来了。

第三部分

悲哀过后的震惊

我们之前并不知道：原来死亡也可以如此美丽

事情发生之初，盘旋在人们脑海中的问题是：谁该为此负责，受到惩罚？然而，随着我们对事情了解的加深，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当我们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即该事件的影响并非一两年就能消除，而是会持续好几代的时间时，我们开始回顾过去，向书本寻求答案。

爆炸发生在星期五晚上的后半夜。那天早上，谁也没有想到会出事。我送儿子上学，我的丈夫去肉店。临近中午，我正在准备午餐，我的丈夫回来了。“核电站好像起火了，”他说，“他们说我们已经无法收听广播了。”我忘了说，当时，我们住在普里皮亚季，那座小城就在核电站旁边。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那晚的大火，深红色的火苗铺天盖地，光线亮得刺眼，核电站仿佛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小太阳。坦白说，那画面美极了。在此之前，我在电影里都没见过如此美丽的场景。那天晚上，所有人都跑到了自家的阳台上，那些家里没有阳台的人们则跑到了朋友家里。我们当时住在九楼，没有遮挡，视野开阔，所以看得十分清楚。人们还把自己的孩子也叫了出来，拉到最前面，对他们说：“快看！记住这一切！”这些人全都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工人、物理指导员。他们站在弥漫着黑色尘埃的空气里说话、呼吸，为眼前的一幕而惊叹。人们驾驶着自己的汽车，骑着自行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一睹这一壮景。我们原来并不知道，原来灾难也可以如此美丽。不过，我当时的确闻到了一些味道——不是那种春天或秋天的味道，而是一种不一样的味道。那不是泥土的味道。我感到喉咙有些痒，眼泪则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而且我也听到了邻居们在外面走动和上下楼的声音——他们也没睡。他们正在来回搬运东西，时不时还传来一两声重重的响声，也许，他们正在收拾自己的行李。我感到有些头痛，就吃了几片药。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看了一眼四周，我还记得那种感觉——这不是我事后才意识到的，我当时就已经有所察觉——我觉得有些不对劲，我周围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永久性的变化。早上8点，街道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带着防毒面罩的军人。当我们看到那些载满军人的各种军用运输工具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相反，这场景反而让我们镇静了下来。既然军队已经赶来

援助，那么，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看似宁静的原子也能置人于死地，更不知道在物理定律面前，人类竟然会如此无助。

接下来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不断地通过广播告诉人们作好随时转移的准备：他们会带我们暂时离开这儿三天，他们会清洗这儿的一切，并且对这附近的环境开展一次彻底的检查。孩子们被告知要带上自己的课本。我丈夫把我们所有的文件和结婚照片都放进了他的公文包里。我只从家里带走了一条薄纱头巾，以免天气万一转凉。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受害者，是一群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人。我们乘坐的大巴停在了一个小村子里，并在那里过了一夜；大家睡在学校的地板上，其他一些人则睡在当地一家酒吧里。在那里，你无处可去。一个女人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夜。“来吧，”她说，“我会为你们铺一些亚麻布。我为你们的儿子感到难过。”与此同时，她的朋友也开始拼命拉她，想把她从我们身边拉开：“你疯了吗？他们都已经受到了污染！”当我们在莫吉廖夫定居之后，我们的儿子就去上学了。上学第一天，他就哭着回来了。老师安排他和一个女孩同桌，但是那个女孩说自己不愿和他同桌，因为他有辐射。我的儿子当时读四年级，是他们班里唯一一个从切尔诺贝利转学来此的学生。其他孩子都很害怕他，他们叫他“亮闪闪”。他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得如此之早。

就在我们离开普里皮亚季的时候，一支军队正朝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前进。一路上，我们见到了不计其数的军用设施，而我正是从那时开始感到害怕。不过，我始终觉得这一切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我自己。我哭泣，寻找食物，睡觉，抱儿子，哄儿子，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到了基辅后，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钱，但是我们什么也买不到：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乡背井来到这儿，他们买光了所有的东西，也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许多人在火车站和大巴上突然心脏病发或中风。我的母亲救了我。她活的时间很长，并且不止一次地陷入一无所有的困境。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收走了她的牛、马，还有房子。第二次是一场大火，她从火中抢救出来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我。现在，她说：“我们必须挺过去。毕竟，我们还活着。”

我记得一件事：当我们坐着大巴离开普里皮亚季的时候，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哭。一个坐在前排的男人冲着他的妻子叫道：“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如此愚蠢！其他所有人都带了行李，而我们的全部行李

竟然只有这些三升的瓶子。”他的妻子认为，既然他们要乘坐大巴，也许她应该给住在半路上的她的母亲带一些密封瓶。那个塞满瓶子的鼓鼓囊囊的大袋子就放在他们的座位旁。我们乘坐巴士一路坐到了终点基辅，而跟随他们一同来到基辅的就是那一袋子瓶子。

现在，我在教堂唱诗班唱歌。我还读《圣经》，并且定期去教堂——只有在那里，人们才会探讨永恒的生命。他们会安慰人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在其他地方，你根本听不到这样的话语，但是从心底里你又是那么渴望听到它们。

我经常会梦到我骑车带着儿子穿越夏季的普里普亚季。现在，那里已经成了一座鬼城。可是，我们骑着车，在城里穿梭，欣赏那些美丽的玫瑰花。普里皮亚季有很多玫瑰花，很大一片的乔木丛中点缀着无数鲜艳的玫瑰花。梦中的我还很年轻，我的儿子也还小。我爱他。在梦里，我忘记了所有的恐惧，就好像我一直都只是一名旁观者。

娜塔莎·彼得罗芙娜·维葛夫斯卡亚
疏散时从普里普亚季城转移的居民

铁铲与原子

我曾经尝试过将那段岁月的记忆梳理清楚。许多新的情感涌现了出来——恐惧，一种当你深入到未知世界时所产生的感觉，就好像突然之间，你从熟悉的地球到了陌生的火星。我来自于库尔斯克。1969年，他们在附近一座名叫库尔恰托夫的小镇上修建了一座核电站。过去，我们常常会去那里买食物——供应给核电站员工的商品总是最好的。我们还经常去核电站旁的一个池塘钓鱼。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经常会想起这些往事。

事情是这样的：我接到了通知，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纪律人员，我第二天就赶到了军队征兵办公室。他们翻阅了我的档案。“你，”他们对我说，“没有任何和我们一起进行演习的经验，而且他们那里现在只需要化学家。你愿意去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军营进行一次为期25天的短期服役吗？”我想，我何不趁此机会暂时离开家和现在的工作，出去待一段时间呢？早晨，我将会迎着清新的空气进行训练和行军。

1986年6月22日早晨11点，我带着已经打好包的行李和一把牙刷赶到了集合地点。让我感到无比惊讶的是，和平年代竟然会有这么多人赶来参与演习。我开始回忆电影中的场景——那真是不平凡的一天，6月22日，德国人入侵的日子。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教我们如何站队，然后打乱队伍重来。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终于登上了大巴。坐下后，有人走上车，对我们说道：“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带了酒，必须现在就把它喝掉。今晚，我们将会乘坐火车离开这里，明天一早我们就会和部队会合。到时，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像刚摘下来的新鲜黄瓜一样，精神抖擞，而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行李。”好吧，没问题。那天晚上，我们玩了个通宵。

第二天一早，我们发现要与我们会合的部队竟然驻扎在树林里。他们再次将我们进行整编，分成不同的分队，并且按照字母顺序来称呼每个小分队。然后，他们就开始分发制服。他们首先给了我们一套，接着又是一套，很快，我们又领到了第三套。我想，这一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们还给我们发了一件外套、一顶帽子、一张毯子和一个枕头——全套冬装。可是眼下却是夏天，而且他们之前曾经说过，25天后，我们就会回家。“你在开玩笑吗？”和我们一起来的那位上尉大笑道，“25天？你们将会在切尔诺贝利待上整整六个月。”大家

听了他的话，一开始并不相信，很快，当大家意识到这是真的之后，人们开始因为受骗而感到愤怒。这时，他们开始试图宽慰并说服我们：在距离核反应堆20公里处工作的人将获得双倍工资，10公里内的工作者则会获得三倍工资，而如果你愿意在核反应堆工作，你将获得六倍的工资。队伍中的一个人开始计算，六个月后，他就能带着在这儿挣的钱回家买一辆小轿车，而另一个人则想立刻就离开这里，但是那已经不可能了——他已经身处于军队之中。“辐射”是什么？没有人听说过这个词语。而我恰好刚刚学完一套民防课程，根据课程中他们所给出的来自于30年前的数据，我知道，50伦琴的辐射就已经足以致命。在课程中，他们告诉我们如何趴下以躲过爆炸所引发的冲击波。他们还告诉我们什么是热容量，什么是辐照度，然而，关于一片地区所受到的辐射污染——这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因素——他们却只字未提。

至于那些带我们去切尔诺贝利的长官则更是愚蠢至极。他们只知道一件事：你应该喝更多的伏特加，那有助于减轻辐射。我们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天天喝酒。我研究过那些瓶子上的商标。起初，我们喝的是伏特加，后来，我们就开始喝一些奇怪的东西：尼奇诺尔和其他玻璃清洁剂。对于我——一位化学家——而言，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喝下尼奇诺尔之后，你的双腿会软得像棉花一样，但是大脑却异常清醒。当你向自己发指令“起立”的时候，你明明想站起来，最终却像一摊泥一样倒了下去。

情况就是如此：我是一名化学工程师，我拥有硕士学历，我在一家大型产品机构的实验室里担任负责人。而他们要我做什么呢？他们给了我一把铁铲——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给我的唯一一件工具。我们很快就想出了一条口号：用铁铲与原子奋战到底！我们的防护装备包括一个呼吸器和一个防毒面罩，但是没有人使用它们，因为当时的室外温度为30摄氏度，穿上这套厚厚的防护服简直无异于自杀。我们在领取装备时全都签了字，一切就像你向军需库领取军火一样，然后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这一切。这只是当时诸多的细节之一。

他们把我们从汽车转移到火车上。火车的一节车厢里有45个座位，我们却有70个人。于是，我们轮流睡觉。

好吧，来说说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是什么？在我看来，切尔诺贝利就是不计其数的军事设备和士兵、清洗地点。我想，真正的军事环境大概指的就是这里。他们将我们安置在帐篷里，每十个人一个帐篷。我们中的有些人家里还有孩子，有些人马上就要当父亲了，还

有一些人则住在单身公寓里。可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如果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就只能去做。祖国向我们发出了召唤，我们响应她的召唤。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

帐篷周围堆满了空的锡铁罐。军需库有特殊的供货渠道以备战争之需。那些空罐子里原来装的都是肉、珍珠荞麦粉和鲱鱼。帐篷周围到处都是猫，它们就像苍蝇一样，无处不在。附近的村庄里已经空无一人——当你听到一阵开门声时，你转过身，以为会有人走出来，结果你看到的却是一只猫从屋里跑出来。

我们将表层受污染的土地挖出来，装进车里，然后运到废物掩埋点。我以为废物掩埋点会是一个由工程师设计而成的拥有复杂结构的建筑物，但是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坑。我们把长有植物的土地挑出来，像卷地毯一样，把它卷起来。我们挑选的是那种绿油油的土地，上面长满了青草、花朵和植物的根茎。当然，里面还有小虫子、蜘蛛和蠕虫。这是一项足以令人发疯的工作。你根本就不可能把土地上的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挑出来。如果不是我们每天晚上都喝得大醉，我真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如果不是那样，我们一定都会变成精神病。最后，我们连日工作的成果就是创造出了一片空无一物的裸土，方圆几百公里以内全都是这种土地。房子、谷仓、大树、高速公路、幼儿园、水井——所有的一切都还在那里，没有遮盖，也没有任何保护。早晨起床，你需要刮胡子，可是你却不敢照镜子——你没有勇气看镜子中的那张脸——因为只要一看到它，你就会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很难想象这里的人们再回到这里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为他们更换了石板以及房子的屋顶。所有人都明白这样做徒劳无益——在那儿工作的几千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又会去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不识字的老爷爷：“啊，孩子们，赶快放下手头那些愚蠢的工作吧。坐在桌边，和我们一起喝酒。”风在吹，云朵飘浮在天空中。核反应堆甚至还没有完全关闭。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土地剥皮，然后，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会回到这里，重复之前的工作。可是，土地上已经空无一物——只有一层干干的沙子。只有当直升机飞过，从上面撒下一种特殊的能够形成一种聚合体薄膜的混合物，让地面上残留的底层土壤继续缓缓移动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挖土、挖土……

住在这附近村庄里的人都已经被转移了，不过有些村庄里还住着一些老人。你可以走进一间破旧的小棚子，坐下来，和棚子的主人一

起吃饭——这是当地的习俗——享受半个小时的普通生活时光，尽管你什么也不能吃，因为这是被明令禁止的。可是，我依旧十分渴望走进一个破旧的小棚，坐在那张桌子旁边。

当我们完工后，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些大坑了。他们打算用水泥板把它们盖起来，并且在周围铺设带刺的铁丝网。由于在工作时，那些器械中的金属结构也以它们各自的方式吸收了很多辐射，所以他们留下了当时运输和装卸用的倾卸卡车、货车及起重机。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设施没过多久就不见了，这意味着它们都被人偷走了。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现。

有一次，我们被吓了一跳：放射量测定员发现我们餐厅的所在地，其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方都要高，而那时，我们已经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了。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况。那里说是餐厅，其实就是一堆柱子和一些齐胸高的板子钉在一起后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我们全都是站着吃饭。我们用桶装水清洗身体。我们的厕所就是在一块干净的地上挖的一个长方形的坑。我们的手里只有一把铁铲——我们就在核反应堆附近不远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两个月后，我们开始明白了一些事情。人们开始说：“这并不是一项自杀式的任务。我们已经来这里两个月了——这已经足够了。现在，他们应该带人来替换我们了。”安托斯金上将曾经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表现得非常诚实：“对我们而言，如果引入一批新的人员来换班，这会对我们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我们已经给你们发了三套服装，而且你们也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引入新的工作人员不仅代价昂贵，而且过程繁复。”他们强调的重点始终落在“我们是英雄”上。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当着众人的面，给某些干活十分卖力的人颁发奖状。奖状上写着：“苏联最佳掘墓者”。这太疯狂了。

那些空荡荡的村庄——里面只有猫和鸡。当你走进一间谷仓，你会在那里面找到许多鸡蛋。我们把那些蛋全煎了吃掉了。士兵们时刻准备着接受任何任务。我们曾经抓过一只鸡，把它放在火上，用家庭自制的伏特加将它清洗了一遍。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喝完一瓶容量为三升的那种液体，然后把瓶子扔出帐篷。晚上，有的人选择下棋打发时间，有的人则在那里弹吉他。人可以适应任何环境、任何事。一个男人喝醉了，倒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其他人则大声喊叫，想挑衅打架。有两个人喝醉后开车出去了，结果发生了事故。当人们把他们俩从那堆废铁中救出来的时候，两人都已经奄奄一息。我则通过给家人写长长的家书和记日记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注意

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开始不断地问我：“你在信里和日记里写了什么？你把这些信和日记都放在哪里？”他企图让我的邻居监视我，但是那个家伙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你在写什么？”“我的学术论文。”他听了，哈哈大笑道：“好吧，我会转告那位上校，不过，你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他们都是一些好人。我已经说过，在那里，没有人哭，也没有懦夫。相信我：没有人能够打败我们。我们永远都不会被打败！那些长官从不离开他们的帐篷。他们整天穿着拖鞋在帐篷里走来走去，喝酒。谁在乎呢？我们会完成我们的挖掘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多一颗星星好了。谁会在意呢？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国家里。

放射量测定员——他们就是这里的神。所有村民都争先恐后地拥向他们：“孩子，告诉我，我的辐射量是多少？”有一位相当有魄力的士兵由此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到一根普通的棍子，然后将棍子缠满电线，接着，他就带着这根棍子敲开了一位老太太家的门，一进门就开始用他的棍子在墙壁上扫来扫去。“孩子，告诉我，数字是多少？”“奶奶，这是军事机密。”“可是，孩子，你告诉我吧。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作为酬谢。”“好吧。”他将那杯酒一饮而尽，“呃，这里一切正常，奶奶。你不用担心。”然后，他就离开了。

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后，他们终于给了我们一些放射量测定器。那一个个小盒子，里面还有一块水晶。有些人开始计划，早晨的时候，他们应该带着这些测定器前往填埋点，让它们吸收辐射，如此一来，他们就能以此为根据，要求更快解散，或者，他们可以凭借这些读数向那些人索要更高的报酬。于是，那些人就把这些小盒子挂在自己靴子上，鞋帮上缠着一圈绳子，如此一来，这些放射量测定器就能更加靠近地面。以往，只有在剧院里你才能见到如此荒谬的情景。然而，挂在靴子上的仪器根本就没有反应，因为只有当辐射物达到一定计量时，它们才会开始计数。换言之.这些不过是他们从库房里翻出来的具有50年历史的小玩具而已。给我们发放这些东西不过是他们对我们采取的心理疗法。六个月的服役期结束时，他们在我们所有人的医疗卡上填写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将摄入辐射的平均剂量乘以我们在那儿逗留的天数就得到了我们所摄入的辐射总量，然而，他们计算时采纳的辐射平均剂量来自于我们帐篷里的测量数据，而非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躺在一片矮树丛下，发现树上的樱桃已经成熟。枝叶间挂满了又大又红又多汁的樱桃，只要一伸手，你就能把它们摘下来送进嘴里。还有桑葚——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桑

葚。当我们不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让我们排好队，在驻地周围行军演练。我们还看印度的爱情电影，一直看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候，看完电影后，厨师们常常会睡过头，每逢这时，我们就只能吃一些没煮熟的荞麦面当早餐。他们会给我们送报纸看——报纸把我们写成了大英雄。志愿者！报纸上还有照片。要是我们能见到那位摄影师就好了……

许多国际营地都设在我们驻地附近。那里就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发生了内部争斗。他们在营地前追逐一个人，只要他一停下来或是躲到一旁，他们就会开始踢他。那个人一直都负责打扫房子，结果，他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装满东西的袋子——他一直都借着打扫卫生的机会偷东西。立陶宛人也住在我们附近。两个月后，他们发生了叛乱，要求回家。

有一次，我们接到了一条特殊的命令：立刻全面清洗一座位于某个村庄里的房子，而那个村子已经无人居住。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明天要在那里拍摄一场婚礼。”于是，我们带着一些水管，用水清洗了屋顶和周围的树，并且擦干净了地板。我们整平了种有土豆的土地，以及整个花园，还给那个院子锄了草。那栋房子周围空荡荡的一片。第二天，他们带来了新娘和新郎，并且用公共汽车运来了大批宾客。他们奏响了音乐。结婚的两人是真正的新娘和新郎，他们不是演员——他们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并且已经在那里定居，但是有人说服他们回到这里举行婚礼并把婚礼场景拍摄下来，留作历史纪念。我们的宣传起作用了。这里就是一个梦的制造工厂，就连那些残存于我们脑海中的神话故事也开始发挥作用，帮助我们抵御这一切：看，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活下来，即便是在这片毫无生气的土地上。

就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指挥官把我叫了过去：“你在写什么。”“给我家中年轻的妻子写信。”“好吧。路上小心。”

回想那些日子，我能想到些什么？我的回答是：疯狂投下的阴影，以及我们如何挖地。挖地。我在我日记的某个地方写道：我明白了，在我到达那里的最初几天里，我就明白了——人要化为泥土实在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祖科夫
化学工程师

采取行动

当时已经是五月月底，距离事故发生已经将近一个月。我们开始收到来自30公里隔离区内的产品——用于测试。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突然有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就好像这里已经变成了一间军事研究所。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整个白俄罗斯唯一拥有这方面专家和设备的研究所。

他们送来了家养及非家养动物的内脏。我们还检查了牛奶。经过初步检测，一切都已经很明了：我们所收到的产品恐怕不能再被称为“肉”——它们已经成了辐射污染的副产品。在隔离区内，牲畜群有专人轮班照看——牧人们来来去去，挤奶女工被带到这儿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挤牛奶。牛奶场按照政府制订的计划工作。我们负责检查牛奶。事实上，那些不是牛奶，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把产自罗加乔夫牛奶场的奶粉及罐装的浓缩牛奶作为演讲中所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产品。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到产自这一工厂的奶制品。当人们看到它们产自罗加乔夫而停止购买的时候，商店里突然就出现了许多没有标签的罐装牛奶。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印商标的纸。

在我第一次前往隔离区的时候，我测量了树林里的背景辐射量，其剂量相当于公路上或田地里辐射量的五至六倍。但是，那里到处都可以测到如此高剂量的辐射物。卡车在公路上跑，农民们在田里犁地。在一些村子里，我们为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测量了他们的甲状腺内所含有的辐射物，其剂量往往超出了人体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100倍，甚至200至300倍，我们的工作队里有一个女人，她是一名放射线专家。当她看到孩子们正坐在一个沙坑里玩耍时，她简直就要疯掉了。我们检查了动物的乳汁——全都含有放射性物质。我们走进商店——和许多乡村商店一样，他们把衣服和食物放在一起：西装和裙子的旁边就摆着萨拉米香肠和人造黄油。这些商品就这样置放在露天的环境里，他们甚至都没有在上面盖一层玻璃纸。我们从那里取了香肠和鸡蛋——我们做了一个伦琴射线显像——那根本就不是食物，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旁边的一张长凳上，正在给她的孩子

喂奶——她的乳汁里含有铯——她俨然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圣母马利亚。

我们问我们的领导，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们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安慰民众："我们已经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我相信他的话。作为一名工程师，我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0年，我熟悉各种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应该离开那个地方，哪怕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我们的测量，看电视。我们已经习惯了相信。我出生于战后，属于战后的一代，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中都充溢着这种信任，或者说，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信仰。它究竟来自于何处？那场可怕的战争虽然惨烈，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那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为这一胜利而对我们心存感激。

好了，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跑到广场上，大声地说出事情的真相？我们把我们的报告订成册，我们将所有解释性的注释汇编在一起。但是，我们始终保持沉默，毫无疑义且不加任何评论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因为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记得我的同事当中没有任何人拒绝前往隔离区执行任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开除党籍，而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平且美好的国家里，对我们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也是其他所有原则的基础。一旦这一信仰倒塌崩溃，许多人都会因此而心脏病发和自杀。也正是因为如此，雷格索夫教授才会选择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你失去这份信仰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名参与者，而变成了一名失败者，你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理由。这就是我对他自杀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标志。

马拉·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
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总工程师

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从一开始——我们听说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哪里，我只知道那是一个距离我们莫吉廖夫很远的地方。后来，我弟弟从学校跑回了家，他说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药丸。很显然，的确有事发生了。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五一节。那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到家，家里的窗户都被风吹开了。这是我后来才想起来的。

我在环境防护监察中心工作。我们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在我所在的监察中心的员工当中，专业人员寥寥可数，尤其是在管理层当中：那些人不是一些退役的上校，就是退休工作者或其他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犯了错，他们就会把你派到我们这儿来。来这儿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整理一摞又一摞的文件纸。直到我们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在莫斯科发表讲话，使人们心中的警钟开始大响之后，他们这才开始有了动静。他们简直恨透了他！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孩子还住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孙子，但是，向世界发出求救信号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位作家：救救我们！你也许会认为，这时候，某种自我保护机制总应该开始介入了吧。然而，在所有内部会议上，甚至包括其间的吸烟休息时间里，你听到的都是关于“那些作家”的讨论。“他们为什么要执著于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他们完全可以放下这一切！我们会接到指令！我们需要遵守命令！他知道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我们有中央委员会，我们有总书记！”那时候，我想我大概对1937年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想我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当时，我对核电站还抱着一种田园诗歌般的理想观点。从中学到大学，我们一再地被告知核电站简直就是一种魔法工厂，它可以“无中生有”，从“无”中制造出巨大的能量，而这一切只须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们坐在操作台前，轻轻按一下按钮就能实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时，我们所有人都还没有作好迎接这一事实的准备，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我们收到了一沓又一沓印着诸如“绝密”、“关于事故的报告：机密”、“科学观察的结果：机密”、“参与事故清理的人员

辐射情况报告：机密”之类的文件。外面的传言越来越多：有人在某份报纸上看到，有人听说，还有人说……有些人相信了西方人的说法，而这些人也是当时唯一讨论该吃什么药片以及如何吃的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反应往往都是：我们的敌人正在欢庆，但是我们会让一切都好起来的。5月9日，那些老兵将会出现在胜利大游行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些曾经参与核电站救火的消防员。正如后来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当时的我们就生活在各种谣言和传言之中。“我想，接过你手里的石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想……”

突然有一天，城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女人。她在市场里走来走去，同时大声说道：“我见过辐射。辐射是蓝色的，它能覆盖所有的东西。”听了她的话，人们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乡村奶酪。一位老妇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边，市场里已经没有人买牛奶。“别担心，”她说，“我从不让我的牛跑到田里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来的。”如果你驾车离开城市，来到郊区或农村，你就会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头全身裹满玻璃纸的牛，而站在它旁边的则是一位全身包满玻璃纸的农村老妇人。眼前的情景简直让你哭笑不得。

这时，他们开始将我们外派，监督下层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这家工厂收到的原材料丝毫没有减少——生产计划并没有调整，所以他们依然照原计划工作。我走进仓库，刚一打开我带的仪器，它的指针就开始剧烈地摇摆。那些木板还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扫帚附近，它的指针立刻就从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后就不动了。“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克拉布斯诺波尔。”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拉布斯诺波尔是整个莫吉廖夫地区受辐射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还有一船货物没有发。其的都已经发货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们已经发往各城镇的货物再找回来呢？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我怕我会忘记……哦，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了，突然之间，你就有了这种全新的感觉，而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它的存在——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生活。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需要这种生活。但是，现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么？你用什么来填饱孩子的肚子？什么东西是危险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应不应该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该留下来吗？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生活——可是，你该如何生活？和整个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过那种集体化的生活——就像工厂和集体农庄里的人一样。我们是苏联人，我们已经被集体化了。譬如说，我就是一个苏联人，非常地道、非常苏联化的一个人。

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参加学生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然后把挣的钱转寄给拉丁美洲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所在小组的工作报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给了位于乌拉圭的联盟组织。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们都变了。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们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明白这一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理解说出来。

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的学位论文的主题是蜜蜂的行为。我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生活了两个月。那里还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岛上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它们将我带到了它们家里。通常情况下，蜜蜂不会允许任何人靠近距离其巢穴三米以内的地方，但是，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它们开始允许我接近它们。我把果酱涂在火柴上，伸进蜂巢里喂给它们吃。我们的老师过去常说："不要摧毁蚁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栖息地。"蜂巢和整个树林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渐渐地，我也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会跑过来，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只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经认为我就是这里的一部分。我曾经在那儿度过了我的昨天，明天，我还会回到那里。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人们曾经举行过一场幼儿绘画展览，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只鹤从一片田野里走过，最后走进了泥土里。"没有人提到过鹤。"我也深有同感。不过，我却不得不工作。我们走遍了地区内的每个地方，收集各种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把它们带回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对此怨声载道："我们现在带着的可是一个真正的烫手山芋，而且还'烫'得厉害。"我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服装。你坐在汽车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后就放着那些"炽热的"样品。

他们拟订了许多掩埋含辐射的土地的草案。我们用泥土来掩埋泥土——这真是一项奇特的人类活动。根据指示，无论掩埋的物体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在掩埋前进行地质勘测，从而确保掩埋点周围四至六平方米内不会出现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与此同时，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须铺上玻璃纸薄膜。我们接到的指示里就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情况却完全不同。执行任务时，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地质调查。他们会伸出手，指向一个地方，然后说："就在这儿挖。"随后，那些挖掘者就开始工作。"你们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当我挖到有水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挖了。"他们往往都是直接冲着地下水挖下去。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诉你，在此之后，我是怎么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们的人民和我自己的。

我接到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派任务是去克拉布斯诺波尔斯克地区，之前我已经说过，那个地区受污染程度最严重。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从土地进入河流，依照指示，我们需要将每项工作都重复一遍。你必须在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然后留出一个缺口，然后再在另一块田里犁出比平时多一倍的犁沟，同时还要确保每道沟之间的间距相等。你还需要驾车走遍所有的小河，检查河水。于是，我搭乘大巴到达了该地区的中央地带，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我需要一辆小汽车。于是，我去找了地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两只手撑着自己的脑袋：没有人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收割工作照常进行，一切就像几个月前他们播种豌豆时一样，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辐射物质最多，但是他们仍然打算把地里已经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类植物一同收上来，在那里，有些地方的辐射量已经达到或超过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应酬我。幼儿园里的厨师和幼教都已经跑了。孩子们正在饿肚子。每当出现急症病人的时候，你都需要把他们送上救护车，然后拉到邻近地区的医院，而这意味着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犹如搓衣板的马路上整整颠簸60公里——因为当地的医生全都跑了。汽车？双倍数量的犁沟？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我.

遭到拒绝的我只得去向军方寻求帮助。那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六个月。现在，他们全都病了。他们给了我一辆装甲运输车和一队士兵——不，等一等，事实的情况比我预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辆车顶装有机关枪的装甲探险车。很可惜的是，我当时并没有穿上部队里发给我的武器装备和这辆车合影。一切就像我说的那样浪漫，富有诗意。这辆车的指挥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断地通过无线电与总部通话：“雄鹰！雄鹰！我们正在继续前进。”我们沿着道路一直向前开，道路两旁就是茂密的树林——这是我们的树林、我们的公路，但是我们却坐在一辆装甲车里。女人们站在自家的篱笆旁哭泣——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已经打响。

根据我们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沟上作业的拖拉机应该有一个完全密封且带有保护装置的驾驶员车厢。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机，驾驶员车厢的确被密封了起来，但是那辆拖拉机就停在犁沟上，而司机则躺在旁边的草地上休息。“你疯了吗？你难道没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吗？”“可是，我已经把汗衫罩在头上了。”他回答说。人们并不明白这

一切。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战争的危险性，并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从来没有人和他们提到过切尔诺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当美丽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树林现在还在那里，那些古老的树林。还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颜色几乎与茶无异，但清澈如天空。碧绿的草地。人们在树林里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就像早晨起来，走进自家的花园一样。而你也站在那里，心里很清楚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受到了辐射的污染。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太太。

“孩子，告诉我，我现在能喝从我的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吗？”

我们低头不语，我们有命令——收集数据，但是不能与当地人发生接触。

最后，还是那名司机开口了。

“老妈妈，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哦，我已经80多岁了。也许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已经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为这些村民感到难过——他们都是无辜的，就像孩子一样，但是他们却在受苦受难。创造切尔诺贝利的人不是农民，他们的一切都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相互信任，从不剥削和掠夺对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样。他们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一切，他们想相信科学家.或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就像他们相信牧师一样。但是，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东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几年之后，我突然明白了，我们全都参与了这次犯罪，我们都是同谋。（她陷入了沉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东西被送进了隔离区，更不知道又有多少东西被人从里面运了出来，尽管后者是违法的——咖啡、罐装牛肉、火腿、橘子。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都被装在板条箱里，然后被送上封闭箱式货车。因为这些东西是这里特有的。当地的供货商、监察员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靠此为生。人们变得比我想象得更加不堪。我也一样，也很不堪。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停了下来。）当然，我会承认这一点，而对我而言，这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不过，我要再举一个例子。在一个集体农庄里，就当这个农庄里有五

个村子吧。这里面有三个是“干净的”，两个是“脏的”。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在这个农庄里，有两个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费，其他三个则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子正在建一个牲畜联合养殖中心，这里的村民需要一些干净的饲料。他们从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呢？风会卷起尘土，从一块地吹向旁边的另一块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实都一样。不过，为了建养殖中心，村民们需要找一些部门签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门会委任一些人去做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不能签署那些文件。这是犯罪。不过，我最后还是和所有人一样，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我想：寻找干净饲料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环境监察员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一种说法。我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来说，我发现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卓娅·丹尼罗芙娜·布鲁克
环境监察员

关于答案

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彼此之间甚至根本不会谈论这个话题。再过几十年、一百年，那些岁月就会变成谜一样的神秘时光。

我很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后遗症。我还害怕雪、害怕树林。这不是智力游戏中的概括与归纳，而是一种真实的人类情感。切尔诺贝利就在我家，就在家中我最珍惜的一件财产当中——我的儿子，他出生于1986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甚至包括蟑螂在内，它们都知道该什么时候繁殖后代。可是，人类却不知道，因为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一双能够预见未来的眼睛。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1993年，仅白俄罗斯一地，就出现了20万流产病例。这都是因为切尔诺贝利。现在，我们全都生活在那种恐惧之中。自然受到伤害后会把自己蜷缩起来，她在等待。梭罗亚斯德会说："哦，我的悲伤！那些时光都去哪儿了？"

我曾经想过很多。我还曾探寻过它的意义。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俄罗斯思维模式造成的灾难。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当然，我也很认同某些作家和记者的观点：这不仅仅是核反应堆发生的一次爆炸，而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大爆炸。但是，对我而言，这样的说法尚不足以令我感到满意。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过去，我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语言学上——那是一门关于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会用语言来思考，但是语言会对我们展开思考。还在我18岁或更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阅读一些地下出版物，并且由此而认识了萨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突然之间，我就读懂了自己的整个童年，读懂了我在街道上度过的童年时光，尽管我的家庭也能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是一位政府部长，我的父亲在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但是直到认识这些人之后，我的那些想法和观点才突然穿越之前的军事语言，出现在我脑海里。对于当时还是青少年的我们而言，把父亲称作："爸"、母亲称作"妈"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情。"每个该死的浑蛋身边总会带着一帮小混混"——这是我在九岁时学会的一句俗语。当时的我不会使用任何文明词语。就连我们玩的游戏、说的话以及猜的谜语也全都来自于军营俗语。因为军营并不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存在于遥远的监狱里。阿赫玛托娃曾经写道："国家的一半被置之不

理，另一半则被关进了监狱。”我想，这种监狱意识不可避免地会与文化——文明，以及粒子加速器相抵触。

当然，我们全都是在一种苏联式的特殊信仰中成长起来的。根据这一信仰，人类是世上所有生物的统治者，因此他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对待和处置它们。米丘林规则说：“我们不能等待大自然母亲眷顾我们，我们需要从她那儿索取我们想要的恩惠。”这是试图在教授人们掌握某些他们生来并不具备的品质或特征。我们所持的是一种压迫者的心态。

现在呢？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考虑“二战”后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向全世界所证明的关于我们自身历史的问题。面对知识时，我们真的拥有足够的勇气吗？人们几乎很少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谈论市场、购物优惠券以及支票。我们现在的状况只能说是生存，而并非生活——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将所有的能量都放在了生存问题上，结果，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抛弃了自己的灵魂。

那么，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正在写的这本书是为了什么？我的那些不眠之夜又是为了什么？假如我们的生活就像火柴点燃时擦出的火花，情况又会怎样呢？对于这些问题，答案可能有很多。这是一种很原始的宿命论。当然，这其中也许会有不少很不错的答案。俄罗斯人总是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信仰，或者说信念——他们需要相信点什么：铁路、青蛙（巴扎洛夫）、拜占庭，还有原子。现在，他们相信市场。

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让我的一生都罪孽深重。我是一名演员。”这是一种关于艺术罪性的警觉，也是他对于窥探他人生活的那种超道德的自然性的一种认识。不过，这种意识也许能起到和某些疾病的疫苗一样的作用，使某人远离错误。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笔一试的现实主题，而人类则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来证明自己。又或许，道德其实比这更简单：你是不是应该踮着脚尖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在入口处停下来？走进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亚历山大·雷瓦尔斯奇
历史学家

关于回忆

我不想谈论这个，我将来也不会谈论它。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无法感到高兴和幸福。

他从那里回来了。他在那里待了几年的时间，一切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尼娜，”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真好。他们会留下来。”

他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在一个村庄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水坑。鹅和鸭子都绕着它走。士兵们——他们都是一些没长大的大男孩——就躺在草地上，脱了上衣和鞋子，晒太阳，想把自己的皮肤晒成褐色。“起来！快起来！你们这些白痴，不然，你们全都会死！”他们回答说：“啊哈，别担心。”

死亡已经遍布我们周围，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

疏散、撤离：一位老太太抱着一座小雕塑跪在自己的老房子前。她说：“孩子们，小伙子们，我不会走。我不会离开这里。你们可以拿走他们发给我的这点钱。他们给我钱是为了赔偿我的房子，还有我的奶牛。可是，又有谁能够赔偿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一片漆黑。战争年代，他们杀死了我的两个儿子，现在，他们就躺在这里的一座小坟墓里。你们把这也称作战争？这是战争吗？天空中飘着白色的云朵，苹果树上的花儿开得正欢。没有人攻击我们。没有人开枪。这里只有我们。这是战争吗？”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上校就站在那里，他正在指挥村民转移。没有人知道这是战争，没有人知道这一事件被称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

我从没亲口问过他什么。我了解他，他的思想有任何蛛丝马迹的变化，我都能察觉到。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已经达到了一种更加深入的程度。我们能够读懂对方的想法，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对方内心的那种孤独感。那种孤独感……

他早就知道自己会死，或者说，他明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向自己保证：他要在爱和善良中走完这一生。我做两份工作，却只有一份报酬，而他的抚恤金总是不够用。他说：“我们把车卖了吧。

尽管不是新车，但是我们依然会有所收获。至少，这样一来，你在家的时间会更长，这样我就能经常看到你了。”他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他的父母也来了，并且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明白了一些事情。在那里，他理解了一些之前他并不理解的关于生命的事情。他找到了一种不同的语言。

“尼娜，”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真好。他们会留下来。”

我问他：“你想过我们吗？你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想法吗？”

“我见到了一个男孩——爆炸发生两个月后，他出生了。他们给他起名叫安东，但是那里的人都叫他‘原子小鸡’。”

“你认为……”

“你为所有生活在那里的人感到难过。你甚至会觉得就连那里的苍蝇和猪都很可怜。每个人都应该活下去。苍蝇应该能够在空中飞，还有黄蜂也是，蟑螂应该在地上爬。在那里，你甚至连一只蟑螂都不想伤害。”

“你……”

“孩子们用图画来表现自己心中的切尔诺贝利。在那些图画中，树全都倒着长。河水不是红色就是黄色的。他们会把这一切都画下来，然后就开始哭。”

我想了解……什么？我不了解我自己。（她笑了。）他的一个朋友向我求婚。很久以前，他就爱上了我，当时我们还在上学。后来，他和我的一个朋友结婚了，再后来，他们离婚了。他向我提出了结婚的请求：“你会过上女王一样的生活。”他经营着一家商店，在城里有一套大公寓，他还有一栋别墅。我想来想去，反复地思考。结果，有一天，已经喝醉了的他走了进来：“你永远都忘不了你的英雄，对吗？他去了切尔诺贝利，而我却拒绝执行这项任务。我活了下来，但是他成为了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哈哈哈！我把他赶了出去！我把他赶了出去！有时候，我常常会萌生出一些奇怪的念头；有时候，我觉得是切尔诺贝利救了我，它迫使我思考。我的灵魂因此而得到了升华。

他对我说了一些关于那里的事情。他说了，而我也记住了。

灰尘聚集成一团团像云一样的东西，飘浮在空中；拖拉机在田里工作；女人们手里握着干草叉；放射量测定器在滴答作响。在那带刺

的铁丝网后的一切，隔离区：没有人在那里生活，可是那里的时间却从没停止过，依然一分一秒地向前推移。白天显得无比漫长，一切就像又回到了你小时候。

娱乐工作者赶到那里，进行慰问表演。诗人朗诵他们的诗歌。阿拉·普加乔娃在田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演唱会。“小伙子们，如果你们睡不着，我愿意为你唱整整一夜的歌。”她把他们称为英雄。

所有人都把他们称为英雄。（她哭了。）假如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假如没有人们用来赞美他们的那些古老的词语，假如没有他们赐予他的勋章，我想，没有人能够承受如此残忍而沉重的苦难。对于我们而言，家和那里根本没有区别。他把这一切都给了我们的儿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再也不会感到高兴和幸福。

尼娜·普罗霍罗芙娜·科瓦列娃
清理人之妻

对物理学的热爱

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有一个习惯，会把周围发生的事情都记录下来。斯大林死的时候，我把街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和人们说的话全都写了下来。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记录事态的发展情况，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都将被人们忘却，并且永远地消失。事实就是如此。我的朋友们处于这一事件的中心位置，因为他们是核物理学家。然而，他们现在已经全然忘记了当时的感受，以及他们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过，我已经把一切都写了下来。

事故发生的那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上班。我是那儿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研究所位于城外的一片树林里。那天的天气简直棒极了！春天，我打开窗户，外面的空气既清新又干净。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我冬天喂的一群蓝松鸦竟然不见了。平时，我经常会在窗台上为它们留一些萨拉米香肠，但是今天，它们竟然全都不见了。难道它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能够给它们提供更好的食物的地方？

与此同时，研究所内部的核反应堆突然传来了令人恐慌的消息：辐射量测定器显示出了超强的活动信号，空气净化过滤器上的读数也突然升高了200倍。靠近入口处的放射量已经接近每小时3毫伦琴。事态严重——这个强度已经达到了在放射性环境中最长工作时限6小时所能允许的最高值。对此，人们作出的第一个假设就是，放热元件之一的密封设备出现了破损。经检查后，我们发现一切正常。于是，人们立刻得出了第二个假设：难道是放射化学实验室的容器在运输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污染了整个地区？据此推断，出事地点应该是在走廊的某个地方——立刻清洗该地点！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我们的内部广播突然响了，广播里宣布所有的工作者都最好不要离开自己现在所处的大楼。广播刚一响，原本站在各栋大楼之间空地上的人们很快就消失了。眨眼间，大楼外面的空地上一个人都没了。当时的情况显得有些奇怪，但也令所有人都不禁感到有些害怕。

放射量测定员检查了我的办公室——办公桌在“发光”，我的衣服

也在“发光”，就连墙壁都在发光发热。我立刻站了起来，我甚至都不愿坐在那张凳子上。我在水槽里洗了洗头发，然后又检查了一遍测定器——情况好多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研究所可能遇到了紧急事件？某个地方发生了核泄漏？如果是这样，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乘坐的大巴洗干净呢？我们将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思考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至于我，我为我们的核反应堆感到骄傲，我曾经仔细研究过它，每一毫米都不曾放过。

我们给附近的伊格纳棱斯克核电站打电话。结果获悉他们那儿的仪器也全都像发疯了一样，完全不听使唤。他们那边的人也正在为此恐慌不已。接着，我们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打电话——没有人接。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发现整个明斯克都被覆盖在一层放射性云层之下。我们最终断定，这是自然界的碘在活动，而这也意味着是某个核反应堆发生了事故。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妻子打电话，想向她发出警告。但是，整个研究所的电话都打不通。噢，那种古老的恐惧，我们在这种恐惧中长大并生活了几十年。可是，我们的家人还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的女儿已经结束了她在音乐学院的音乐课，正和朋友在街上逛街。也许，她正在吃冰激凌。我该给她打电话吗？我知道，这样做会令我的领导感到不悦，今后，他们将不会再让我做任何机密工作。可是，我做不到，于是，我拿起了电话。

“认真听好我说的每一个字。”

“你在说什么？”我的妻子大声地问道。

“不要这么大声。关上窗户，把所有食物都收进塑料袋里。戴上橡胶手套，用一块湿布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抹一遍。做完之后，把这块抹布装进一个塑料袋，然后扔掉它。如果阳台上还挂着没有干的衣服，你现在就立刻把它们收进来，重新洗一遍。”

“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这么大声。将两片碘片放进一杯水里，使它完全溶解。然后，用这个水把头发洗一遍。”

“什么——”可是，我并没有等她把话说完就挂上了电话。她应该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在研究所里工作。

下午3点半，我们得知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出事了。

那天晚上下班后，当我们坐上大巴，从研究所返回明斯克的时

候，在半个小时的车程当中，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极少数人在谈论其他事情。所有人都不敢谈论发生了什么事。

一到家，我就看到我们家的门口有一块湿抹布——看来，我妻子明白了一切。我走进房里，脱掉了身上的夹克，然后是衬衣、裤子，我脱光了所有的衣服，只剩下内裤。就在这时，愤怒突然占据了我的大脑。让什么保密、恐惧都见鬼去吧！我拿起城市电话簿以及我女儿和妻子的电话簿，开始挨个给那上面的人打电话。我说："我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明斯克的上空正飘浮着一层放射性云层。"接着，我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清洗头发，关上窗户，把晒在阳台上的衣服收下来，重新洗一遍，喝碘水以及饮用碘水的正确方法。人们的反应是："谢谢你。"他们没有对我的话提出质疑，也没有感到害怕。我想他们大概并不相信我的话，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发生的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没有一个人在听完我的话后感到惊恐。他们的反应让我感到惊讶。

那天晚上，我的朋友打来了电话。他是一名核物理学家。人们竟然都表现得如此漫不经心。他在电话里说，他希望能去岳母娘家过五一节，而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戈梅利附近。戈梅利与切尔诺贝利近在咫尺。他甚至还打算带他的孩子过去。"好主意！"我在电话里冲着他喊道，"你已经疯了！"这是一件关于专业的事情。但是当时，我在电话里冲着他大喊大叫，而他现在可能已经忘记是我救了他的孩子。（说到这儿，他稍稍停顿了一下。）

我们——我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没有忘记切尔诺贝利事件。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它。野蛮人又怎么能够明白闪电的含义呢？

阿尔勒·阿达莫维奇在他的书中提到，他曾和安德烈·萨哈罗夫谈论过原子弹。"你知道吗，"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说，"在一次核爆炸之后，能够再次闻到那股清新的空气气味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吗？"他的这些话里蕴含了不少浪漫因素，引人遐想。不过，对于我而言，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对不起，我的反应决定了我能从一件事里看到的内容，你以为我会因为他是天才就忽略他话语中所隐藏的可怕的信息吗？可是现在，核能量的地位下降得如此之低，而且还令我们蒙羞。对我们这代人——1945年，当他们扔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我才17岁。我爱看科幻小说，还曾经做梦去其他星球旅行，而且我还认为核能量将会带领我们进入宇宙。我报名进入了莫斯科能量研究院，并且得知那里面保密程度最高的部门就是核能量机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物理学家全都是国家的精英，只有最优秀和最聪

明的人才能进入这一领域。人性被暂时放到了一边。我们的老师回到学校后说，三枚硬币大小的核能量已经足以提供一家发电厂所需的全部能量。听到这样的消息，你怎么可能不头晕！我曾经读过美国人史密斯写的一本书，他在书里描述了他们发明和测试原子弹的过程，以及原子弹爆炸时的情景。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秘密。物理学家的工资很高，而事事保密的作风又进一步加深了这项工作的浪漫程度。物理学成为了所有人顶礼膜拜的焦点，而那个时代也成为了物理学的时代！即使是在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之后，人们也是用了相当长的—段时间才彻底摆脱这种盲目崇拜。他们打电话召集了一些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乘坐专机赶到了切尔诺贝利，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都没有带刮胡刀，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不过是去那里待上几个小时后就回来。在明知那里有一座核反应堆发生爆炸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只会在那里逗留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物理学，他们那一代的科学家都对自己所钻研的学科具有无比坚定的信心。然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却为这个物理学时代最终画上了句号。

你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改变。最近，我阅读了康斯坦丁·列昂提耶夫写的一段话，他写道：人类不断开展各种物理-化学实验，其结果将会产生出一种更高级的能量，干预我们的世俗生活。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在斯大林时代长大的人而言，我们根本想象不出任何超自然能量。从那以后，我只看《圣经》。我和同一个女人结过两次婚。我离开她，然后又回到她身边——在同一个世界里，我们再度与对方相遇。生活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一件神秘的事情！现在，我相信了。我相信什么？我相信，这个三维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拥挤。为什么人们会对科幻作品如此感兴趣？因为人类一直在试图让自己离开地球。人类正在尝试着掌握其他不同的时间范畴，了解那些和地球不一样的星球，而不是只局限于这一个星球之上。西方文学已经开始描写天启——核冬季——就好像他们正在为它的到来而彩排演练一样。他们在为将来做准备。大量核弹头的爆炸将会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火。空气中将会弥漫着浓重的烟雾，从而使得阳光无法到达地球，这一变化将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地球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而且温度还在不断降低。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就一直用这种自己想象出来的世界末日教育后代。然而，即便是在他们摧毁最后一枚弹头之后，原子弹也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关于原子弹的知识不会消失，它还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之中。

你只不过是提问，但是我却一直在和你争辩。我们之间正在进行

一场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辩论。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原子的历史——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军事秘密和祸根，它还是我们的年轻时光，我们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宗教。50年过去了，短短50年的时间而已。现在，我有时候还会觉得这个世界正在被其他人所统治，和他们相比，拥有大炮和宇宙飞船的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小孩。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完全说服自己相信这一观点。

生活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我爱物理，并且曾经以为除了研究物理，我什么都不会去做。可是现在，我想写作。譬如说，我想写其实科学并不喜欢人类——他挡住了它前进的道路。或者，我想写少数物理学家究竟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我想写一种由物理和数学创建的新的专政。一种全新的生活已经向我敞开了大门。

瓦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鲍里谢维奇
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实验室前主任

昂贵的萨拉米香肠

在事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人们的感受可谓是五味杂陈，相当复杂。我记得其中的两种：恐惧和侮辱。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人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政府保持缄默，医生也沉默不语。各地区等待来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则等待莫斯科的命令。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连接着少数几个决策者。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毫无防备可言。这就是那几天里人们最大的感受。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几个人决定成百上千万人民的命运。

与此同时，还有为数不多的个人也完全可以将我们所有人都置于死地。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罪犯。他们只是一间核电站的普通员工。当我弄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异常震惊。切尔诺贝利把人们的心撕开了一条深不见底的伤痕，其造成的伤害甚至超过了科累马事件，超越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个拥有斧子和弓箭的人可以杀人，一个站在手榴弹抛射器后面的人也可以杀人，一个能够操控毒气室的人也可以成为杀人犯，但是他们无法杀死所有的人。然而，一旦他拥有了原子，一个小得肉眼见不到的原子……

我不是哲学家，也不会将问题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我最好还是把我记得的事情告诉你。在最初的几天里，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有些人跑进药房，买光了那里所有的碘片，还有一些人则不再去市场，也不再买牛奶和肉，尤其是羊肉。我们家不想让日子过得太节约，于是我们买最贵的萨拉米香肠，期望看在价格的分上，他们能用好肉来做这些香肠。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恰恰是在制作这些昂贵的萨拉米香肠的过程中，他们混入了不少已经遭到污染的肉，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它的价钱那么贵，购买它的人自然也就更少。事实表明，我们根本就防不胜防。不过，你一定已经知道这些了。我要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要让你知道我们这代苏联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是医生和老师，属于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圈子，我们会在我家碰面，喝咖啡。其中有两个是老朋友，他们中有一个是医生，他们俩的孩子都很小。

“我明天就要离开了，去和我父母一起生活。”我的那位医生朋友

说道，“我会把孩子一起带去。如果他们生病，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可是，报纸上说再过几天，局势就会稳定下来，”另一个朋友说道，“我们的军队在这里，还有直升机、装甲车。他们在广播里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朋友说：“你也应该带着孩子离开这里。离开这儿！把他们藏起来。这不是战争。我们甚至根本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之间，他们对对方说话的语气就变得不客气起来，后来，他们之间的这次谈话最终在相互反斥和指责中结束了。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吗？”

“你背叛了你自己的孩子！你作为父母的天性到哪里去了？狂热分子！”

那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我的那位医生朋友在制造恐慌。我们应该安静地等待，直到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直到他们宣布最后的决定。然而，她是一名医生，她知道得比我们多：“你甚至不能保护你们自己的孩子！没有人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可是不管怎样，你们必须承认你们也很害怕。”在那一刻，我们真的很讨厌她，她毁了这个原本应该很美好的夜晚。第二天，她就离开了，而剩下的人则给自己的孩子穿上漂亮衣服，然后带他们去看五一大游行。我们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没有人强迫或要求我们必须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当然得去！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所有人都应该聚在一起。我们跟着人群，沿着街道一路跑下去。

来自波伦卡娅的一封信

柳德米拉·德米特里耶芙娜·波伦卡娅
切尔诺贝利地区的被疏散者，乡村教师

关于自由，以及一个有关一次平凡死亡的梦

那是自由。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的人。这不是你们这些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只有那些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懂。我见过他们，那些人——他们喝醉了，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他们至今仍然怀念它——自由，还有飞行。没有人能让时光倒退！斯大林统治下的秩序，特殊的军队。可是，你得开枪，你得活下来，然后你就能获得你应得的100克伏特加和一小袋廉价烟草。死亡的方式有上千种，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要你的命，甚至令你粉身碎骨，然而，只要你想办法，并且努力地去实践这些想法，你就能成功地将他们全都哄骗过去——魔鬼、高级军官、战斗、躺在棺材里的人，以及万能的主——你就能够瞒天过海，然后活下来！

自由是孤单的。我知道这一点，所有曾经在核反应堆待过的人都知道。那种感觉就像是身处于最前线的战壕里一样。恐惧和自由同在！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活下去的理由。对于这一点，一直过着普通生活的你根本无法理解。还记得他们通常是如何严格地训练我们、为战争做准备的吗？然而，最后的事实表明，抛开身体，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一切。我还没有准备好。两个当兵的走进工厂，把我叫了出来："你能区分汽油和柴油吗？"我说："你们要派我去哪儿？""你说的哪儿是什么意思？作为一名切尔诺贝利志愿者，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我的军事专业为火箭燃料。这是一个秘密专业。他们直接把我带出了工厂，当时的我只穿了一件T恤衫，可他们甚至都不让我回家换衣服。我说："我需要和我的妻子说一声。""我们会亲自通知她。"大巴车上包括我在内共有15个人，大家全都是预备役军官。我喜欢他们。如果我们必须去，我们就会去；如果有需要，我们就会投入工作；如果他们要我们去核反应堆，我们就会爬上那个反应堆的屋顶。

在那些已经疏散完毕的村庄附近，他们设置了高等戒备的哨点，士兵们手持来复枪坐在哨点内。周围还设有路障。标志牌上写着："道路的一侧受到污染。严禁在此停车或经此出入。"树全都是灰色的，上面覆盖了一层净化液体。见到这一切，你会觉得一切简直不可思议！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不敢坐在地上或草地上，也不敢去任何地方，每当有汽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刻快步跑

开。只要一发现空气中有尘埃，我们就会立刻带上防毒面罩。换班后，我们会乖乖地坐在帐篷里，哪儿也不去。哈哈哈！几个月后，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显得很正常，和你之前生活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开始从树上摘李子，到河里抓鱼，那里的梭子鱼简直大得惊人。还有鳊鱼——我们把它们晒干，然后就着啤酒吃。人们很有可能已经和你说过这些事情了，对吗？我们还踢足球、游泳！哈哈哈。（他再次大笑起来。）我们相信命运，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宿命论者，而不是药剂师。我们已经变得不理智。这就是斯拉夫人的思维模式。我相信自己的命运！哈哈哈！现在，我已经成了二等残废。我很快就病倒了——辐射中毒。在我去之前，我甚至都没有综合医院开具的医疗卡。啊，就让他们见鬼去吧。我又不是唯一一个遇到这种情况的人。

我是一名士兵，我封了其他人的房子，然后自己走进去。那种感觉……有土地，但是你不能在那上面种任何东西——奶牛用头抵着大门，但是门已经关闭，这个房子已经被上了锁。它的奶滴到了地上。在那里，你会有一种感觉！在那些村民尚未被疏散的村子里，农民们会自己酿造伏特加，然后卖给我们。我们有很多钱：这里的报酬是工厂里的三倍，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拿到比普通日常军事津贴多两倍的钱。后来，我们接到了一个命令：但凡喝酒的人都留在第二梯队。那么，伏特加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至少，它能在心理上安慰我们。我们相信这一点，就像我们相信其他事情一样。

农民们的生活依旧平静：他们种植农作物，农作物生长，然后，他们把成熟的作物收割回来，而剩下的一切在没有他们照看的情况下也进展良好。他们和沙皇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关心政府——宇宙飞船、核电站，还有在首都召开的会议，这一切都和他们无关。他们不相信自己生活的世界已经发生改变，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切尔诺贝利世界。他们哪儿也不去。人们死于极度震惊。他们随身带着种子，却不说话；他们还带了绿色的西红柿，而且还把它们都仔细地包了起来。玻璃罐头在火上烤会爆炸，当它炸开后，他们会重新拿一个放在炉子上。在你看来，毁灭、埋葬、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垃圾，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让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让他们继续工作，也终结了他们那种生活所具备的古老含义。我们是他们的敌人。

我想去核反应堆。“别担心，”其他人对我说，“在你复员前的一个月，他们会把你们全都派到反应堆的屋顶上去干活。”我们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按照工作时间表，前五个月，我们协助疏散村民，第六个

月，我们被派到了核反应堆。对于核反应堆屋顶上的工作，我们拿它开过玩笑，也曾经进行过严肃的谈话。在那之后，我们也许还能再活五年、七年。或者，我们还能再活十年。不过，不知为何，人们提的最多的就是“五年”。这个数字是人们从哪儿听来的？他们平静地对我们说，话语中丝毫没有半点恐慌：“志愿者们，向前冲！”我所在的整个中队——我们向前走去。我们的指挥官有一个监控器，只要打开它，他就能看到屋顶上的情况：石墨碎片、熔化了的沥青。“看到了吗，小伙子们，看到那上面的碎片了吗？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清扫干净。还有这里，在这个区域里，这里就是你们倾倒垃圾的洞。”按照指令，我们每次在上面停留的时间必须控制在40秒至50秒以内。可是，这根本就不可能。每倾倒一次垃圾，你都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你需要跑上去，然后回来，你必须要跑上去，然后把那些东西倒掉个人将垃圾装进手推车，其他人则把手推车推到洞口，然后倾倒垃圾。倒完后，你必须立刻跑回来，不能往下看——他们禁止我们这样做。可是，所有在那儿工作的人都会往下看。

报纸上写道：“核反应堆周围的空气是干净的。”我们看完后哈哈大笑，然后就开始咒骂那些记者。空气是干净的，可是我们在那里吸入了高剂量的辐射物。他们给了我们一些放射量测定器。其中一个的最高测量标准为5伦琴，结果，我们刚一拿到，它的指针就立刻打到了读数最上限的位置。另一个的测量标准稍高一点，可以测量200伦琴内的辐射量，但是那个也失灵了。五年——他们都这样说——而且你还不能生孩子。如果五年后你没有死……（他哈哈大笑起来。）在那里，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笑话。但是，无论是说笑话的人，还是听者，大家都很平静，你从他们的神情和语气中丝毫感受不到半点恐慌。五年……我已经活了十年。你看！（他又笑了。）他们给我们颁发了勋章。我得到了两枚。还有很多图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红旗。

有个人失踪了。我们想他大概是逃跑了，然而两天后，我们在树丛里找到了他——他上吊自杀了。你懂的，那里的每个人都曾动过这样的念头……不过后来，我们的教官说，这个人在临死前收到了一封信，他的妻子欺骗了他。天知道？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复员了。可是，我们是在树丛里找到他的。

我们有一个厨师，他害怕得要命，以至于他甚至不敢住在帐篷里。他住在仓库，他在装满黄油的板条箱和肉罐头下挖了一个洞。他的床垫和枕头都是自己带来的，他就住在地下那个小洞里。后来，我们接到了一个命令：组建一支新的队伍，每个人都要上屋顶。可是，

这里的所有人都已经去过那里，然而，他们需要人手！于是，他们就把他叫了出来。他只上过一次屋顶。现在，他也成了二等残废。他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对方，也不会忘却那段时光。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不会忘记这一切。你应该抱这些都写下来。

报纸上的话都是谎言。我从没在那上面读到过关于我们为自己缝制防护装备、铅质衬衫和内衣裤的内容。我们有橡胶手套，里面镶了一些铅。但是，我们的确为自己缝制了铅质的内衣内裤。对此，我很肯定。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给我们指出了当地妓院的位置。我们是男人，而此刻，我们已经离开家整整六个月了，我们已经过了六个月没有女人的生活，而这全都是因为发生了紧急事件。我们所有人都去了。当地的女孩在那里走来走去，但是她们的脸上都挂着泪水，她们一边哭一边说自己很快就要死了。我们有铅质的内衣内裤，我们把它们穿在裤子外面。把这些都写下来。我们还拿这个开玩笑。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美国机器人在屋顶上待了五分钟后就停止了工作。日本机器人在屋顶上工作五分钟后一也不动了。然而，俄罗斯机器人却在那上面足足工作了两个小时！这时，大喇叭里传出了一道命令："二等兵伊万诺夫！两个小时后，你可以下来抽根烟，休息一下。"哈哈哈！（他发出一阵大笑。）

在我们上屋顶工作之前，指挥官向我们下达了一些指令，我们全体人站在那儿，有一些人听后表示抗议："我们已经去过了，我们本应该早就回家的。"至于我，我的专业是燃料，所以他们也把我派到了屋顶上。可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想去那儿工作。我没有提出抗议。指挥官说："只有志愿者才上房顶工作，其余的人可以退后，军事检察官将会和你们进行一次谈话。"那些人站在那儿，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就答应了。如果你曾经发过誓，你就应该做你必须做的事情。我想，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他们完全可以因为我们不服从命令而把我们关进监狱。他们已经放出风声，说这样的罪行将会被判两年到三年的徒刑。与此同时，如果一名士兵接受的辐射剂量超过25伦琴，他的上司就会因为毒害下属也被关进监狱。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的辐射剂量超标，所有人受到的辐射感染都少于25伦琴。你懂了吗？不过，这些人都是一些听话的孩子。有两个人生病了，其中一个说："我去。"而事实上，他那天明明已经上去过了。其他人因此而对他充满了敬意，于是，他受到了奖励：500卢布的奖金。另一个人则在上面挖坑，转眼间已经到了他该下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向他招手道："下来吧。"可是，他的两条腿就像被钉住了一样，双手

则奋力挖土。他要在那里挖出一个洞，从而让我们能够把垃圾倒下去。他一直在屋顶上工作，直到那个洞挖好。他也获得了奖励——1000卢布。在当时，这笔钱足够买两辆摩托车。现在，他成了一等残废。假如不是出于某种担心，你会这么快就付那么一大笔钱吗？

复员。我们都上了车。当我们所乘的汽车在隔离区内行驶的时候，一路上，车顶的警报器都长鸣不止。我回顾那些日子，我发觉，那个时候，某些事情——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其实就近在咫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那些诸如“史诗般的”、“稀奇古怪的”之类的词语根本词不达意。我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体会到那种感觉，即使是在坠入爱河时也不曾有过。

亚历山大·库德里亚金
清理人

死亡的阴影

你需要的是关于那段日子的事实和细节，还是我的故事？举例来说，我本身并不是摄影师，我是在去了那里之后才开始拍照片，因为当时我手上碰巧有一台照相机。当时，我认为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己，可是现在，摄影已经成了我的职业。我无法摆脱我在那儿所感受到的那种新感觉。你认为我说的这些有意义吗？（就在说话的同时，他开始摆照片，很快，桌子上、椅子上以及窗台上就放满了各种照片：和马车轮子一样大的巨大的太阳花、一个建在一座空村庄里的麻雀窝、一座孤零零的乡村墓地，墓地旁还竖立着一块标志牌："高辐射，请勿进入。"一座被废弃的房子，一辆婴儿车就停在这栋房子的院子里；房子的窗户都已经被木条封死，婴儿车里有一只乌鸦，看上去它就像是在捍卫自己的家园。一块已经荒废的田地中央停着一辆老旧的起重机。）

人们问我："你为什么不拍一些彩色照片？彩色的！"可是，切尔诺贝利事件本身就意味着黑暗，黑暗的事件。那里没有其他色彩。我的故事是什么？它只是关于这些（他指了指那些照片）的一些评论。不过没关系，我会努力。不过，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他又指了指那些照片。）

当时，我正在一家工厂上班，并且已经通过书信的方式完成了大学历史专业课程的学习，获得了学位。在工厂里，我是一名二级水管工。他们挑选了一些人，组建了一个工作队，然后飞快地就把我们派往那里，当时的情形就像我们要上前线打仗一样。

"我们要去哪里？"

"他们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我们要去那儿干什么？"

"做他们跟你说的事情。".

"可是，我们都是建筑工人。"

"那你们就去盖房子。你们不是到处盖房子吗？"

我们建造那些辅助性建筑：洗衣房、仓库、帐篷。分配给我的任

务是卸水泥。什么水泥，从哪儿运来的——根本就没人检查。他们把它们装上车，我们把它们卸下来。当你用铁铲铲一天的水泥后，除了牙齿，你身上所有的地方都会被厚厚的水泥灰遮盖起来。你俨然变成了一个水泥人，灰色的水泥人，就连你的特殊防护服也全都变成了灰色。晚上，你抖掉那上面的水泥灰，第二天，你继续穿着它去干活。

他们会和我们进行讨论——他们解释说，我们是英雄，在第一线工作，实现自我。他们说的全是军事语言。可是，一贝克代表什么意思？一居里呢？毫伦琴又是什么意思？我们拿这些问题去问我们的指挥官，他答不出来，在军事学院里，他们从没学过与之相关的知识。对他而言，“米尔”、“微”这些字眼就像中文一样，完全不明白。“你们需要知道这些干什么？你们只要懂得执行命令就行了。在这里，你们是士兵。”是的，我们是士兵——可是，我们不是罪犯。

一个代表团来这儿访问，“放心吧，”他们对我们说，“这里的一切都很好。背景辐射也没有超标。现在，距离这儿四公里的地方，那里的情况很糟糕。他们正打算把住在那儿的居民全部转移。但是，在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他们还带来了一名放射量测定员，他打开了背在肩膀上的一个小盒子，然后拿出一根长长的棒子，在我们的靴子周围晃了晃。结果，他本人一看到读数立刻就闪开了——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然反应，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但是，对你们作家而言，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你认为那一刻的情景能够在我们的记忆中保存多长时间？也许，最多几天而已。俄罗斯人不会只考虑自己，更不会只考虑自己的性命，他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这一特性。我们的政治家们在思考个体生活的价值时总是表现得十分无能，我们也同样如此。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生来就如此。我们是由不一样的物质构成的。当然，在隔离区内，我们喝酒喝得很凶，那是真正的酩酊大醉。到了晚上，你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清醒的士兵。现在，当这些人带上第一副眼镜之后，他们开始变得孤独寂寞起来，他们回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或是谈论自己的工作，诅咒他们的老板。可是，不一会儿，在干掉一两瓶酒之后——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结构就成了我们唯一的话题。我们谈论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还有斯大林。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我们能够打败美国人吗？那时还是1986年——谁的飞机更好，谁的宇宙飞船更可靠？好吧，切尔诺贝利是爆炸了，可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是我们苏联人！我们会一直这样聊下去，直到喉咙沙哑，直到天亮。你能理解这一切吗？你明白吗，当时的事实就是我们手上没有任何放射量测定器，他们也没有给我们某种粉末以防万一。我们没

有洗衣机，所以我们的防护服并不是每天清洗，而是每两个月才洗一次，你懂吗？这是我们最后讨论的话题。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想起来，说一说。真该死，我们生来就是这种人！

在那里，伏特加比黄金更珍贵。你根本就买不到。在我们周围的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喝光了：伏特加、月光、清洗剂、指甲油、气雾剂。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们手里举着装满月光的空瓶子，或是一瓶科隆香水，围绕着这些话题展开绵绵不休的谈话。我们当中有老师、工程师，后来，我们简直就像置身于一支国际化的部队之中：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乌克兰人。我们甚至还进行过哲学辩论——辩题是：唯物主义是如何囚禁了我们的思想，并且限制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其他物体接触，可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恰好成为了我们走向无限的契机。我记得，我们还探讨了俄罗斯文明的命运——那是一种难逃悲剧结局的命运。如果你没有见识过死亡的阴影，你就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切。而且，只有以俄罗斯文明作为理解的基础，你才会开始对这场灾难本身的意义有所了解。只有俄罗斯文明做好了迎接它的准备。我们曾经害怕炸弹，害怕蘑菇云，但是最后的结果却让所有人为之一震。我们都知道一根火柴或一根保险丝都能让一栋房子烧为灰烬，可是切尔诺贝利和这个不一样，它和所有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都不一样。我们听到的坊间传言称，引发切尔诺贝利爆炸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火苗，那甚至根本就不是火苗，而是一道光、一道闪电。那道光不是蓝色的，但是又和天空的颜色很相似。而且当时也没有烟。那些科学家都是神灵，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了堕落的天使，有的甚至变成了恶魔。他们并不了解自然的秘密，过去不懂，现在也不懂。我是一名俄罗斯人，来自于布莱恩斯琴。过去，我们那儿有一个老头，他就坐在自家的门廊上，他身后的房子已经倾斜，眼看就要倒塌，可他却在那里淡定自若地谈论世界的命运。每个小工厂都有自己的亚里士多德。同样，每家工厂也都有自己的啤酒台。我们就坐在核反应堆下。你可以想象那里蕴含了多少哲学原理。

报社的记者来到这里，给我们拍照。来之前，他们设计了一些场景：他们想拍一张关于一栋已经废弃的房间窗户的照片。拍照前，他们还在窗户前放了一把小提琴。后来，他们将这张照片命名为“切尔诺贝利交响曲”。可是，在那里，你根本就不需要特意去制造什么。在那里，无论你看到什么，你都想记下来：学校的运动场被拖拉机碾得凹凸不平；阳台上衣服因为挂得时间太长——超过了一年——已经变成了黑色；被废弃的军人公墓；长得和士兵雕像一样高的野草，以及原子武器雕像上的那个鸟窝。一栋房子的大门已经被砸烂了，房子

里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但是窗帘仍然整齐地被束在窗户两侧。人们早就离开了，可是他们的照片还挂在房子里，就像他们的灵魂。

在那里，你会有一种感觉，一切都很重要、都很伟大。我只想把一切都详细地记在脑海里：我见到这一切时的日期和时间，天空的颜色，还有我的感受。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人类已经永久性地抛弃了这块土地。而我们就是第一批体会到这种“永久性”的人。你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老农民的脸——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幅幅肖像画。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理解这一切的人。他们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他们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和其他人坠入爱河，然后用他们的汗水烘焙出香喷喷的面包，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地生活，并且让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延续下去。他们在等自己的孙子孙女回来。等他们回来后，他们会让自己的后代再继续同样的生活。他们通过将自己融入这片土地的方式来和这片土地道别——他们最终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一间白俄罗斯的农家小茅屋！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而言，家就是一部生活的机器。然而，对这里的人而言，家就是整个世界乃至宇宙。所以，当你驾车在这些空荡荡的村庄里行驶的时候，你会无比迫切地渴望能够遇到一个人。教堂里的东西已经被劫匪洗劫一空——你走进去，蜡烛的气味扑面而来。这会让你觉得自己仿佛正在祈祷。

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开始拍照。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们刚刚安葬了一位曾经和我们一起去那儿的朋友。他死于血癌。我们被唤醒了，然后，我们按照斯拉夫人的传统——我们一起喝酒。谈话由此开始，直到午夜才结束。一开始，我们的话题是他——逝去的人。然而，在那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了关于国家命运和宇宙结构的探讨上。俄罗斯军队会不会离开车臣？会不会爆发第二次高加索战争？或者，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日里诺夫斯基能够成功竞选为总统吗？叶利钦会再度当选吗？我们谈论英国皇室和戴安娜王妃，俄罗斯的君主政体以及切尔诺贝利和其他一些理论。有些人说外星人早就知道灾难会发生，并且将会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另一些人说，这是一次实验，不久之后，许多拥有超常天赋的孩子就会诞生。或者，白俄罗斯人将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像当年的契丹人。我们是形而上学者。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而是生活在我们的梦里，我们活在自己的谈话中。因为，为了理解生活，你需要为这普通的生活添加一些东西进去，即便是当你接近死亡的时候也是如此。

维克托·拉图
摄影师

一个残缺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的是一个残缺的孩子，我依然会像爱正常孩子一样爱他。”你能想象得到吗？她现在才读十年级，但是她竟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她的朋友和她一样，她们都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个熟人最近刚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英俊，妻子漂亮，然而他们的儿子却长了一张一直咧到耳根的大嘴巴，而且还没有耳朵。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探访他们，可是我的女儿并不介意，她能够始终很坦然地直视他们的目光。她想去那儿，也许她只是想去看一看，或者她想尝试着去爱他。

我们原本可以离开这儿，但是我和丈夫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们不敢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都是核辐射的受害者。我们并不害怕对方，假如有人给你一个从他们花园里摘下来的苹果或黄瓜，你会很自然地接过来，然后吃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藏进自己的口袋里或包里，然后再把它扔掉。我们共享着相同的记忆。我们拥有同样的命运。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外来者，我们都是受到歧视的传染病人。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诸如“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之类的称谓。但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你们害怕我们。如果可以，你们很有可能不会允许我们离开这里，你们会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紧张的心稍稍恢复平静。（她停了下来。）不要跟我说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样。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曾经带着女儿逃到了明斯克，去找我的妹妹。然而，我的亲妹妹却不让我们走进她们家，她家里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一次，我们最后只得在火车站过夜。

我有过一些疯狂的想法。我们应该去哪里？也许，我们应该自杀，从而让自己少受折磨？这样的想法只在最初几天出现过。每个人都开始想象可怕的疾病即将出现——那些不可思议的疾病。我是一名医生。我只能猜测其他人在想些什么。现在，我望着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去哪儿，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的女儿曾经参加过一个少年先锋队夏令营，营队里的其他孩子都不敢碰她。“她是一名切

尔诺贝利人。她会放射出一种黑色的光。”晚上，他们让她站在营地的院子里，从而可以让他们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发光。

人们会谈论战争，谈论那些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并且拿我们和他们做比较。可是，那些人是高兴而幸福的！他们赢得了战争！战争给了他们一种非常强大的生命力量，正如我们现在所讲的，战争赋予了他们一种极其强大的生存动力和活下去的信念。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只想活下去、学习，然后生孩子。可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怕。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并且为我们的孙子孙女担心。人们笑得少了，节假日里的歌声也少了。树林取代了之前的田地，这里的风景也变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也发生了改变。所有人都变得很沮丧、很消沉。在这里，你会有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切尔诺贝利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它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你不写我们的故事也许会更好。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害怕我们。没有人会在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中谈论癌症。同样，如果有人被判了无期徒刑，也没有人会在他的家人面前提到监狱。

娜达莎·阿法娜斯耶夫娜·布拉科娃
霍伊尼基的一名村民

指令

我有很多资料，我一直在收集各种资料，至今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一报纸上剪辑下来的资料，我自己的评论。我有很多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们都给你。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离不开它，但是我自己却无法动笔把它们都写下来。我能够战斗——组织游行示威、站岗放哨、获取药品、探访那些生病的孩子——可是我无法把它写下来。不过，你应该这样做。我对此感触很多，一直以来，我都无法正确地面对和处理这些情感，它们麻痹了我的大脑，使它陷入了瘫痪。有很多人一直在执著地关注和研究切尔诺贝利事件，并且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书。但是，我不想成为这种人，我不想成为揭露这一事件的人。

可是，如果我能够如实地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情况会怎样？（思考。）那场温暖的四月小雨。七年过去了，我还在想那场雨。那些雨滴落地后，立刻就像水银一样，聚集到了一起。他们说辐射是没有颜色的，可是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雨落到地上，最终形成了无数绿色和鲜黄色的小水坑。我的邻居在我耳边小声说，自由广播电台报道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我当时根本就没留意她说的话。我坚信，如果真的有事情发生，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他们有各种特殊的装置和设备——特殊的报警信号、防爆庇护所——他们一定会对我们发出警告。我们对此坚信不疑！我们都上过民防课程，我甚至还是这门课的老师。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另一个邻居给我带来了一些粉末。这是他的一个亲戚给他的，而且他还告诉了我粉末的使用方法。他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不过，他要我向他保证一定会保持沉默，不告诉别人——就像水中的鱼儿一样沉默，就像石头一样默不作声！他尤其担心我会在打电话时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

当时，我的侄子和我一起住，他还很小。我呢？我还是不相信。我想，我们谁也不会喝下那些粉末。我们非常信任他们——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年轻的一代人也同样如此。

我还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之初自己见到的一些事情，以及听到的那些传言，并且时常回想当时的情形，从这一个联想到另一个。从眼前的一切出发，回想过去，这有点困难——作为一名作家，我曾经考虑这个问题，我的身体里就好像住着两个“我”：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

前的我，以及事情发生之后的我。而且，站在现在的立场上，你很难确定那个“之前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的观念就变了。

从爆炸发生后没多久开始，我就经常进入隔离区。我记得当我走到某些村子里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那里的那种死一般的寂静令我震惊。没有鸟，什么都没有。你在路上行走，而你的周围——什么都没有。一片肃静。我的意思是，那些房子早就空了，住在这里的人也全都离开了，可是，你看看四周，一点生气都没有，就连一只小鸟都看不到。

我们去了楚迪亚尼村——那里测出的辐射强度为149居里。随后，我们又去了马力诺夫卡村——59居里。这里的村民所吸收的辐射剂量是那些在进行核试验地区巡逻的士兵的100倍。核试验地区的土地——1000倍！放射量测定器在颤抖，它的指针已经指向了极限值，可是集体农庄的工作者已经拿到了地区放射学家签署的文件，上面说吃这里的蔬菜沙拉完全是安全的：莴苣、洋葱、西红柿、黄瓜——所有的蔬菜。所有的作物都在生长，所有的人都吃这些东西。那些放射学家现在又是怎么说的？他们该如何才能自圆其说呢？

在村子里，我们遇到过很多喝醉了的人。他们手里拎着酒瓶，跌跌撞撞地到处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嬉笑，就连女人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挤奶女工。

在一个村子里，我们去探访了当地的一所幼儿园。孩子们四处奔跑，在沙坑里玩游戏。院长告诉我们，他们每个月都会更换新沙子。沙子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你大概也能猜到他们是从哪儿买来的这些沙子。幼儿园里的孩子看起来都不快乐。我们给他们讲笑话，他们还是不笑。他们的老师说：“别试了。我们的孩子不会笑。当他们睡着后，他们会流泪。”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刚刚分娩的妈妈。“是谁让你在这儿生孩子的？”我问道。“外面的辐射剂量高达59居里。”“医生兼放射学家来了，她说我不应该把孩子的衣服晒在外面。”他们试图说服人们让他们留下来。即使是在他们已经将村子的居民都转移之后，他们也还会带其他人来这里种地，收割土豆。

现在，他们怎么说——地区委员会的书记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如何才能证明自己当初说的那些话呢？他们说这都是谁的错？

我保留了许多指令——最高机密指令。我会把它们都给你，你需

要写一本诚实的书。那里面有如何处理受污染的鸡肉的指令。如果需要传递任何带有放射性物质的材料，你应该穿戴防护装备：橡胶手套、橡胶长袍、靴子等。如果辐射量达到了××居里，你就需要把肉或香肠放进盐水里煮沸后再食用，然后把煮过东西的盐水倒进厕所。如果辐射量超过了上一数字，你应该把肉放进骨头粉里，用作牲畜饲料。这就是他们处理肉的计划。来自受辐射污染地区的肉价格非常便宜——它们全都被销往未受污染地区。那些运送这些牲畜和肉的司机告诉我，车里的牛十分奇怪，它们掉毛掉得特别厉害，而且它们总是很饿，什么都吃——垃圾、报纸。喂养它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会把这些牛卖给集体农庄，不过，如果司机想要，他们也可以从中挑一两头牛，运到自己的农场。这是犯罪！犯罪！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辆小卡车。它开得非常慢，就好像它后面放了一副棺材，正准备开往墓地一样。我们拦住了那辆车，我想开车的司机应该是喝醉了，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你没事吧？”我问道。“没事，我刚刚运完受污染的泥土。”在那么热的天气里，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尘土？“你疯了吗？你还那么年轻，你还要结婚、生孩子！”“哪里能找得到开一趟车就能挣50卢布的活？”在当时，50卢布能够买一套新西装。人们谈论得更多的往往是金钱，而不是辐射。为了这多出来的一点点报酬，或者，相对于一条生命而言，这些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那一刻，我感到哭笑不得。

伊莉娜·基瑟勒娃
记者

一个人能够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的力量其实无限强大

我不懂文学，我是一名物理学家，所以我会告诉你事实，也只能告诉你事实。

最终，有人会不得不站出来对切尔诺贝利事件作出回应。这一天终将到来，到那时，他们就必须面对和回答这所有的一切，就像他们对待1937年一样。也许，我们还要再等50年，那时，所有人也许都已经老了，有的可能都已经死了。他们是罪犯！（这时，他突然变得安静起来。）我们需要把真相和事实留下来。我们的后人会需要它们。

那一天，4月26日，我正在莫斯科出差。正是在那里，我获悉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事故。

我立刻给当时还在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杨科夫打了一个电话，他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一次没人接，我又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接电话。我找到了他的助理，我和他很熟。

“我在莫斯科，给我转接斯柳杨科夫，我这儿有一些消息必须马上告诉他紧急信息。”

我当时用的是一条政府专线，可是他们已经封锁了所有信息渠道。只要你一开始谈论这次事故，电话就会立刻被掐断。很显然，他们在监听！我希望弄清楚是谁在听——某个机构。政府当中的小政府。哪怕那个接电话的人是党中央的第一书记也不能例外。我呢？我是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的所长。我是一名教授、科学院的联系人。可是，就连我都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

最后，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终于和斯柳杨科夫取得了联系。我告诉他：“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据我的估算……”一—那时，我已经和莫斯科的一些人进行了谈话，并且已经理清了一些头绪——“辐射云正在向我们，向白俄罗斯方向飘去。我们需要马上实施全民碘防护措施，并且疏散位于核电站附近的所有人员。核电站周围方圆100公里以内的地区都不应该再出现任何人或动物。”

“我已经接到了报告，”斯柳杨科夫说，“那里着火了，但是他们已

经把火扑灭了。”

我已经沉不住气了：“他们在撒谎！他们说的全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会告诉你，石墨一旦点燃就相当于每小时燃烧五吨燃料，你想想那里有多少石墨，会烧多久？”

我乘坐第一班火车赶回了明斯克。在火车上，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里。我测量了儿子甲状腺——那是当时最理想的测量部位——辐射强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80毫伦琴。他需要碘化钾。普通的碘。小孩的服用剂量为2至3颗碘片，将它们溶于半杯水中，然后喝下，成年人的剂量则需要加倍，4至6倍。核反应堆将会持续燃烧十天，在这十天里，每天都需要服下同样剂量的碘片。可是，当时根本没有人听我的话！没有人会听科学家和医生的话。他们把科学和医学全都归入了政治领域。当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人们的想法，以及十年前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已经开始工作，秘密进行调查。除此以外，所有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苏联的原子能安全得就像煤或碳。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第二天，4月27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地区。我去了那儿的一些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以及纳洛夫里亚，这些地方距离核电站只有二三十公里远。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去这些地方时，我带上了所有的设备，这样，我就能测量背景辐射量。这些地区的背景辐射量为：布拉金，每小时30000毫伦琴；纳洛夫里亚，每小时28000毫伦琴。可是，那里的人们全都在外干活，耕地、犁地、除草，为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做准备。他们给鸡蛋染色，烘焙复活节蛋糕。他们说，辐射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我们唯一接到的一条来自上级的信息就是：收割情况如何？现在的进展如何？那里的人们像看疯子一样望着我。“教授，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

于是，我们回到了明斯克。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摆着露天的小摊，出售派、冰激凌、三明治和各种糕饼。而他们的头上就飘着一层厚厚的辐射云。

4月29日——每一件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包括所有数据在内——早晨8点，我坐在斯柳杨科夫的接待区内。我想进去找他，想了各种办法。然而，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在那里一直坐到下午5点半。5点半，一位著名的诗人从斯柳杨科夫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我认识

他。他对我说：“我和斯柳杨科夫同志讨论了一下白俄罗斯文学。”

我当场发作：“如果我们不立刻撤离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所有人，那么，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什么白俄罗斯文学，也不会再有人读你的诗！如果我们不救他们的话，一切都将无法挽回！”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最后，我终于见到了斯柳杨科夫。我把我这几天来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们必须要救那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给那里打了电话——他们已经开始疏散核电站周围的群众。

“你的人（来自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什么要带着放射量测定器到处跑，吓唬人？我已经咨询过莫斯科方面的伊利因教授，他可是苏联辐射防护协会的主席。他说一切正常。现在，国家已经派了一个政府调查团前去核电站调查，就连检察人员都已经赶到了那里。我们还调动了军队，以及所有的军事装备，我们的军队已经赶到了事发地点。”

当时的我们已经摄入了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以及不明剂量的钚（以铀和石墨作为核反应堆主原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会制造出相当于武器量级的钚，而这种放射性金属元素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之一）——总共450种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质的释放总量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谈论物理学，还有物理定律，可是他们探讨的却是敌人，以及如何寻找敌人。

迟早有一天，终会有人对此事作出回应。“你是想告诉我，你是一名拖拉机专家。”我对斯柳杨科夫说——他曾经是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你不知道辐射能够造成什么后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学家，我知道后果会怎样。”然而，从他的观点出发，这又怎样呢？让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学家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不会这样做，不过，他们也并非罪犯。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种无知和盲目地服从。运作机制教会了他们一个道理，而这也成为了他们的生存原则：枪打出头鸟。所以，相对而言，让所有人都高高兴兴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杨科夫刚刚接到莫斯科方面的电话，获悉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升职已经近在咫尺！我敢打赌，他一定已经接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而那个致电给他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在电话里，戈尔巴乔夫会说：你看，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能够保持稳定，不出现任何恐慌，西方世界此时正在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和声音。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不能讨得上级的欢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随之而来的出国考察机会和别墅。如果当时

我们仍然生活在封闭的体系内，那我们的人民将会继续生活在核电站周边。他们一定会彻底掩盖这次事故！还记得吗——基特里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我们依然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里。

在当时进行的民防课程中，按照要求，一旦遇到来自核事故或核攻击的威胁，你应该立刻对全民实施碘预防措施。这里所提到的还只是“威胁”。现在，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他们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此一来，既无须公告，又不会引起恐慌。他们可以把碘加入饮用水中或蓄水池里，又或是直接通过牛奶加工厂将碘加入牛奶中。这个城市里储存有700千克的浓缩碘，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

我的公文包就放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为什么要带着它？因为他们阻止我去见那些重要人物，他们已经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要随身携带放射量测定器，然后把它放在秘书们的甲状腺上，或是那些坐在接待室里的私人司机的身上。当他们看到那上面的读数时，他们会感到害怕，有时候这能对我起到一些帮助作用，他们会放我通行。随后，人们就对我说：“教授，你为什么要带着它到处吓人？你认为全白俄罗斯就你一个人为人民的性命而担忧吗？而且，不管怎样，人总是要死的，吸烟、交通事故或自杀都能夺去他们的性命。”他们还嘲笑乌克兰人，嘲笑他们跪在克里姆林宫，恳请上级划拨更多的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仪器（那里的设备不够用）。与此同时，我们的书记——斯柳杨科夫同志，用了15分钟的时间来陈述形势：“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们自己完全能够处理。”然后，他们对他的言行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们！”许多人就因为这一句赞扬而丧生，但是这又有谁知道呢？

我获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当时都已经开始服用碘片。当我研究所的同事给他们的甲状腺作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甲状腺十分干净，丝毫没受污染。假如他们没有服用碘片，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当这些人进入那些受污染的地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罩，并且穿上特殊的防护袍——当地人缺乏的正是这些装备。此外，他们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个牧场，那里生产的奶制品专供他们自己使用，而这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每头奶牛都有编号，并且有专

人负责看管。他们还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温室，以及特殊的看护。最令人感到恶心的是，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对此作出说明或回应。

很快，他们就拒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于是，我开始用铺天盖地的信件对他们进行轰炸。清一色的官方报告。我把地图和数据发送到了指挥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份报告都包含四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有250页文稿，那里面记录的全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印了两份，以防万一——一份放在我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另一份放在我的家里。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来。我为什么要留副本？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现在，每次离开办公室时，我都会把门和抽屉都锁好，然而当我出差回来后，抽屉里的那些文件夹就会不翼而飞。但是，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萨克人，我继承了哥萨克人的性格。我不停地写，不停地说。你需要拯救人民！他们需要被迅速撤离或疏散！我们不断地去那里出差。我们研究所率先制作出了一张标明受污染地区的地图。整个南部都被标记成了红色。

这些都已经成了历史——一起犯罪的历史。

他们没收了研究所里所有的放射量测定仪器。对此，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直接没收了所有的仪器。我开始接到各种威胁恐吓电话，这些电话都打到了家里：“不要再吓人了，教授。不然，你的下场会很糟糕。你想知道会有多糟糕吗？你会知道的。”有一股势力开始向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施压、恐吓。

我给莫斯科写信。

在那之后，我接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普拉托诺夫打来的电话：“总有一天，白俄罗斯人民会记住你的名字，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应该给莫斯科写信。这样做非常不好。他们现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职务。你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在和谁作对吗？”

我有地图和数据。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进疯人院。他们真的曾经这样威胁过我。而且，他们还可以确保我会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们也曾这样警告过我。他们可以把我拖上法庭，以推行反苏联行动为名对我做出裁决，或者，他们可以因为研究所的库房里少了一盒钉子而将我送入监狱。

最后，他们把我推上了法庭。

他们的目的得逞了。法庭上，我心脏病发作。（他陷入了沉

默。）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了。它们全在这个文件夹里。这里面的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

我们给村子里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们——做检查。从他们身上，我们检测出1500、2000、3000毫伦琴的辐射量。有的甚至还超过了3000伦琴。那些女孩——她们长大后不能生孩子。她们的基因发生了突变。田地里，拖拉机正在耕作。我问和我们随行的工作者："拖拉机的司机有没有防护措施，至少他应该有一副防毒面罩？"

"不，他们没有那些东西。"

"什么，你们没有分到这些防护装置吗？"

"噢，我们有很多。我们手头的防护装置足够我们用到2000年。我们只是没有分发下去而已，不然，人们一定会感到恐慌。所有人都会跑掉，他们会不顾一切地离开这儿。"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教授，对你而言，这一切说起来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业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可我呢，我能去哪儿？"

多么可怕的能量啊！一个人能够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能量其实无限强大。这已经不再是猫腻或谎言，这是一场对抗无辜的战争。

一切就像我们驾车沿着普里皮亚季河前进时看到的情景。人们支起了帐篷，他们举家外出野营。他们正在游泳、晒太阳。现在，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而他们依然什么也不知道，继续在核云层笼罩下游泳和晒太阳。每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走过去，向他们的家长解释这一切。可是，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广播和电视里什么都没说？"他什么也没说。不过，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读出他的内心想法：我应不应该把这个情况上报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头脑中的哪一方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会汇报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这一次，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真相？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如果核电站再度发生爆炸，一切将会再度重演。我们还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我们还是斯大林的人民。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内斯特伦科

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所长

为什么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

那一年是1986年——当时的我们情况如何？这种科技大片中的世界末日怎么就落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我们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与我们身边的一切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表示抗议的方法。我们遵循自己的规则。当他们的精神才刚刚松弛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饮酒欢畅。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的作品，去对方家串门，还会在厨房里没完没了地聊天。我们想获得生活以外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戴着贝雷帽的电影明星——凯瑟琳·德纳芙。我们想要自由。我们中的有些人崩溃了，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我们想，如果它就是如此，如果它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远，那么，就让所有人都下地狱去吧。我们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继续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了，一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就让当权者去担忧吧。这是他们的职责——切尔诺贝利。而且，那里离我们这儿很远。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在地图上找过那个地方，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根本无须知道真相。

然而，当他们在牛奶上贴上“儿童饮用”、“成人饮用”标签的时候——情况又另当别论了。这意味着我们和切尔诺贝利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好吧，我承认自己并非党员，但是我仍然住在这里。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长得这么像甜菜叶？”你打开电视，他们在节目里说：“不要听信西方人报道，他们是在有意挑拨和刺激我们的民众！”直到这时，你才终于确定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五一大游行呢？没有人强迫我们必须得去——没有人强迫我去参加。我们都有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全都错过了这次机会。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的五一游行是参加人数最多，也最热闹的一次游行。所有人都忧心忡忡，人们都想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和大家在一起。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想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吃自己种的萝卜。

我本人是基姆沃洛科诺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当时，厂里还有一群来自民主德国的专家，他们是来为我们安装新设备的。我因此而看到了其他国家的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这一事件中的行

为举止。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之后，他们立刻要求得到相应的医疗检测，放射量测定器，以及限定产地的食品供应。他们收听的是德国广播电台的节目，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事故。当然，他们所有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立刻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给我们买票！送我们回家！如果你们不能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他们提出了抗议，并且给自己的政府发了电报。他们这是在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争取应有的权利，他们并非孤身一人来到这儿，他们是在为自己、为家人争取生存的权利！可我们呢？我们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呢？那些德国人，他们的待遇那么好，他们还表现得如此傲慢——他们简直就可笑至极！他们都是懦夫！他们测量罗宋汤里的放射量，就连肉都不放过！这太可笑了！我们国家的男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人！同时，他们也是一群绝望的男人。他们在和反应堆作斗争。他们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们戴着帆布手套，在已经融化的屋顶上拼命干活（我们都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举起了红旗来证明自己的勇气，就像那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以及那些年迈的卫兵。（思考。）然而，这其实也是一种蛮荒未开化的表现形式，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从不说“我”。“我们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苏联英雄主义！”“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苏联性格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但是，这就是我——“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在这里，观察一个人以及他的情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如何发展和变化？我发现我关注得更多的是我身边的世界。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反应。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它成为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没有它，我们所受的苦难将彻底失去意义。它就像一场战争。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界才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它成了我们和欧洲之间的一扇窗户。我们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我们会为它祈祷。我不敢说出它的名字，但是它就在那儿。

现在，这是我的工作。我走进那个地区，观察那里的一切。现在，隔离区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破旧的小茅屋当中，他们的心中仍然充满恐惧。每次选举，他们都会把票投给强硬派，他们梦想能够回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回到军事时代下的苏联。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生活在军事化的环境中：警察岗哨、身穿制服的人、通行证体系、

配给制以及负责发放国际人道主义援救物资的官僚们。那些援救物品的包装盒上用德语和俄语写道："不得用于销售或交易。"然而，就在旁边的小亭子里，围绕这些物资展开的销售和交易正在进行。

这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演艺秀。我和那些载满人道主义援救的物资及护送人员一道——无论那些物资是被冠以上帝的名义，还是其他什么名称——走进这片地区。那些踩在水坑或泥巴里的廉价靴子，他们身上的外套和手套都是这些物资的一部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他们的眼睛似乎在说话，"不管怎样，那些东西最后都会被偷走。"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种渴望得到什么或抓住什么的欲望——一个盒子或箱子，来自外国的东西。我们知道所有老太太的生活地点。突然，我就萌生出了一个无耻的愿望，就连我自己都为自己的这一愿望而感到恶心。"我给你们看点东西！"我说，"在非洲，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东西。事实上，除了这儿，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200居里、300居里。"我也注意到了这些老太太的变化——她们中的有些人堪称真正的演员。她们把自己的独白牢牢地记在心里，然后会在每一个适当的时候流着眼泪说出这些话。当第一个外国人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老妈妈什么都没说，她们只是站在那儿，默默地流着眼泪。现在，她们已经知道该说些什么以及该怎样说。也许，她们会因此而为自己的孩子多争取到一包口香糖或是一盒衣服。而与这一现状共存的是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她们与死亡、时间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毕竟，她们并不是因为这些口香糖和德国巧克力才拒绝离开她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小茅屋。

在回来的路上，太阳下山了，我说："你看，多美的一片土地啊！"金色的夕阳映照在树林上和田地上，透射出一片金灿灿的余晖，似乎是在和我们道别。"是的，"同行者中的一个德国人用俄语回答说，"这里的景色的确很美，但是它已经受到了辐射污染。"说话的同时，他的手上就握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这时，我才明白这是我一个人的落日。这是我的土地。我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纳塔利亚·阿尔森耶芙娜·罗斯洛娃
莫吉廖夫地区妇女联合会，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负责人

孩子们的话

阿廖沙·贝尔斯基，9岁；安雅·博古什，10岁；娜塔莎·德沃瑞茨卡亚，16岁；勒拿·茹德罗，15岁；尤拉·祖科，15岁；奥利亚·祖沃纳科，10岁；斯内扎纳·基内维奇，16岁；伊拉·库德里亚契娃，14岁；伊利亚·卡斯科，11岁；瓦妮娅·科瓦洛夫，12岁；瓦迪姆·卡尔斯诺索尼什科，9岁；瓦斯亚·米库里奇，15岁；安东·纳什万金，14岁；马拉特·塔塔尔契夫，16岁；尤利娅·塔拉斯基娜，15岁；卡特娅·谢夫楚科，15岁；鲍里斯·什克尔曼科夫，16岁

天上有一朵乌云，雨滴打在身上像小石子一样硬。地上的水坑不是绿色的就是黄色的，就好像有人往里面倒了颜料一样。他们说那是从花朵上落下的灰尘。奶奶要我们待在地窖里，不准出来。她自己则跪在地上，虔诚地祷告。她还教我们祈祷：“祈祷！这是世界末日。是上帝对我们所犯下的罪孽的惩罚。”当时，我哥哥8岁，我6岁。我们开始回忆自己犯下的罪过。他打碎过装覆盆子果酱的玻璃瓶，我没有告诉妈妈我的新衣服挂在了篱笆上，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把这件衣服藏在了壁橱里。

士兵们坐着汽车来到我们这儿。我以为又开始打仗了。他们嘴里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词语：“疏散”、“同位素”。有一名士兵还拼命地追赶一只猫。放射量测定器只要一靠近那只猫就像一个自动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也在追猫。那个男孩倒还好，可那个女孩一直在哭。“我不会把它交出去！”她大声叫道。“快跑，小女孩，快跑啊！”可是，那个士兵的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我听说——那些大人说的——外婆则一直在哭——自从我出生的那年开始（1986年），我们村子里就再也没有孩子出生。我是唯一的一个。医生说我本不应该生下来，可是我妈妈从医院里跑了出来，躲在外婆家里。最后，我就在外婆家出生了。我听他们说过这件事。

我没有哥哥姐姐，也没有弟弟妹妹。可是，我想要一个。

告诉我，夫人，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妈妈生下我？我本该去哪儿？在天上飞？还是应该去另一个星球？

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年，麻雀就从我们小镇上彻底消失了。有一段时间，地上到处都是麻雀的尸体——院子里、柏油路上。它们都是被枪射下来的，然后就被人装进放着树叶的容器里，带走了。那一年，他们不允许人们焚烧树叶，因为那些树叶有辐射，所以当时，他们把所有的树叶都埋到了地下。

两年后，麻雀又回来了。我们高兴万分，兴奋地给对方打电话：“昨天，我看到了一只麻雀！它们又回来了。”

五月金龟子也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也许，要再过100年或1000年，它们才会回来。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我看不到它们了。

9月1日，开学第一天，校园里看不到一朵花。花朵上有辐射。在新学年开始之初，出现在学校里的工人并不是粉刷匠——就像以往那样——而是军人。他们挖掉了鲜花，还挖掉了地上表面的泥土，并且把它们都装进了卡车后面的大拖车里。

一年后，他们疏散了村子里的所有居民，然后填埋了整个村子。我爸爸是一名的士司机，他开车去了那里，回来后把他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我们。首先，他们会在地上挖一个五米深的大坑。然后，消防员会赶来，用消防水管从上至下地冲洗每一栋房子，从屋顶一直冲到地面，从而保证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不会扬起任何辐射尘埃。他们仔细地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一个地方都不放过。接着，起重机会把房子连根拔起，扔进事先挖好的大坑。从房子里掉出来的玩具娃娃、书和瓶瓶罐罐掉得到处都是。那些挖坑的工人们会跑过去把它们全都捡起来，扔进大坑。最后，他们会用沙子和陶土把大坑填满，然后推平。这时，原本的一座村庄消失了，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空地。他们在那块地里撒满了玉米种子。我们的房子就躺在那片玉米地下，还有我们的学校和村委会。我种的植物以及两本邮票簿都在那里的地下。我多么希望能把它们带出来。我还曾经有一辆自行车。

我今年12岁，我是个残疾人。每个月，邮递员都会把两张抚恤金支票送到我们家——那是给我和我爷爷的。当我们班里的女孩知道我得了血癌之后，她们就再也不敢和我同桌。她们甚至都不想碰我。

医生们说我之所以会得病是因为我爸爸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过。我是在那以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他们来找我爸爸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没有听到他收拾行李的声音，我当时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妈妈在哭。她说：“爸爸现在已经在切尔诺贝利了。”

我们在家里等爸爸回来，就像人们在战争年代等待亲人回家一样。

他回来了，然后又开始去工厂上班。他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在学校里，我得意地向每个人吹嘘，说我爸爸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他是一名清理人，而清理人就是那些事故发生后帮助打扫清理事故地点废墟的人。他们都是英雄。所有的男孩都很羡慕我。

一年后，爸爸病了。

我们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当时，他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那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起切尔诺贝利。

他们工作的地方距离核反应堆很近。那里很安静，到处都是一片寂静而美丽的景色——他说。就在他们工作的同时，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改变。花园里的鲜花争奇斗艳，可是，它们是为了谁而开呢？那里的居民已经离开了村庄。他们“清扫了”那些被留下的东西。他们挖掉了已经被铯和锶污染的表层土壤，他们还清洗房顶。然而，第二天，放射量测定器又会“滴答”作响，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

“在离开的时候，他们和我们握了手，给我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对我们的自我牺牲表示感谢。”他就这样一直说。在他最后一次从医院回家的时候，他说：“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再也不想听到任何关于物理和化学的字眼。我要离开工厂。我要做一名牧羊人。”现在，我和妈妈单独生活。我不会去那些科研机构上班，哪怕她要我去。我爸爸就曾经在那里上班。

过去，我经常写诗。我和一个女孩相爱了。那时，我们在读五年级。七年级时，我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死亡的事情。

我在加西亚·洛尔迦的诗里读到“哭泣的黑色根茎”。我开始学习飞行。我不喜欢玩那个游戏，但是除此以外，你能做什么呢？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叫安德烈。他们给他做了两次手术，然后把他送回了家。六个月后，按计划，他本该进行第三次手术。可是，

他用自己的皮带上吊自杀了，就在一间空的教室里。当时，所有人都去外面上体育课了。医生说，他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

尤利娅、卡特娅、瓦迪姆、奥克萨纳、奥列格，现在是安德烈。“我们都会死，到那时，我们就会变成科学实验品。”安德烈过去经常这样说。“我们都会死，然后，人们就会忘记我们。”卡特娅曾经说过。“我死后，请不要把我埋在墓地里。我害怕墓地，那里只有死人和乌鸦。”奥克萨纳说。“把我埋在田里。”尤利娅过去只会哭。当我抬头仰望天空时，天空活了，因为他们都在那里。

一个孤独的声音

不久之前，我还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忘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过上了另一种生活。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开始这种生活的，更没有想明白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活下去。可是，你看看我，我会笑，会说话。然而，我又是如此悲伤，我已经变得麻木。我想找人谈一谈，但是又不想和人类谈。我会去教堂，那里很安静，就像是在大山里，异常安静，在那里你能够彻底忘记自己之前的生活。可是，早上一觉醒来，我的手会不由自主地在身边摸索——他在哪儿？他的枕头在这儿，还有他的气味。窗台上有一只小鸟在跳来跳去，碰响了挂在窗边的风铃，我正是被这风铃声叫醒的。在此之前，我还从没听过这种声音。他去哪儿了？我想不起来了，我记不起所有的事情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晚上，我的女儿会走过来对我说："妈妈，我已经做完了家庭作业。"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我还有孩子。可是，"他"去哪儿了？"妈妈，我的扣子掉了。你能帮我缝好吗？"他走了，我该怎样继续走下去，直到与他相遇呢？我闭上眼睛，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直到我睡着。我睡觉时，他会来找我，但即使出现也只是飞快地一闪而过，很快就又消失了。我能听到他的脚步声，可是他要去哪儿？去哪里？他不想死。他望着窗外，凝视着天空。我在他身下塞了一个枕头，然后又塞了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他就能坐起来了。他已经死了很久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了。我们根本离不开彼此。（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之中。）

不，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哭了。我想说话。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告诉自己说"我忘记了所有的事情"。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的丈夫死于同一年，他们俩一起去的切尔诺贝利，但是她现在已经开始筹划第二次婚礼了。我并不是要在这里谴责她——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要生存下去。她还有孩子。

就在我生日那天，他离开家，去了切尔诺贝利。当时，家里还来了客人，大家都已经坐到了餐桌旁，他向他们道歉。他亲了我。但是，窗户外就停着一辆车，车上的人在等他。

那一天是1986年10月19日，我的生日。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的足迹遍布全苏联，而我会等他回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就像一对相思鸟。我们对彼此说再见，然后又重聚。然

而这一次——我们双方的母亲都感到很害怕，他的妈妈和我的妈妈，但是我们当时都没有感觉到。现在，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哪儿。我本该向隔壁正在读十年级的男孩借他的物理课本看一看，学一学上面的物理学知识。他走的时候甚至连一顶帽子都没有戴。一年后，和他一起去的那些人都开始掉头发，可是他的头发却长得异常浓密。现在，那群小伙子们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所在的那个工作队一共有七个人，现在，他们全都死了。他们死的时候都很年轻，然而，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们。死亡的第一次降临发生在他们回来后的第三年。当时，我们都觉得，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命中注定。然而，从那之后，死亡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这时，其他活着的人开始等待死亡降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我的丈夫是最后一个。他在高空作业。人员疏散完毕后，他们切断了那些村庄的电源，为此，他们需要爬上高高的电线杆。那些电线杆很高，站在那上面，你可以俯瞰整个村庄——死一般的寂静，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他的身高近2米，体重大约90公斤——谁能杀死这样一个男人？（突然，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噢，当时的我简直高兴坏了！他回来了。我们还为此举办了一场舞会，每次他离开家后回来时，我们都会举办舞会。我有一件睡衣，那件睡衣很长很长，也很漂亮。那天晚上，我就穿着它。我喜欢价格不菲的贴身睡衣，我的衣服全都相当不错，但是这件睡衣却格外特别——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我才会穿上它，以此纪念我们俩的第一次，我们俩在一起的第一个夜晚。那天晚上，我用心去体会他的身体，他的整个身体，我轻轻地亲遍了他的每一寸肌肤。有时候，我会做梦，梦见自己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从此永不分离。他走了以后，我想他，疯狂地想他，我从不知道思念竟然会让我的身体如此痛苦。当我们分别时，哪怕只是一小段时间，我都会觉得很失落，我会忘记自己在哪里，也想不起来现在的时间。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淋巴结有一点肿大，那些小结节很小，但是当我亲他的时候，我的嘴唇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你会去看病吗？”我问道。他安慰我说：“它们很快就会消失的。”“你在切尔诺贝利那边过得怎样？”“就是做一些普通的事情。”他的话听上去很平静，既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任何痛苦的情绪。我从他的回答中得出一个结论：“那里的情况和这里一模一样。”在餐厅里，普通工人在一楼吃饭，他们吃的是面条和罐头食品，而那些官员和将军们则在二楼吃饭，除了水果，他们还能喝到红酒和矿泉水。在那里，他们的餐桌上

铺着干净的桌布，而且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然而，楼下的普通工人呢？他们整个工作队都没分到一个放射量测定器。

噢，那时的我多高兴啊！我们还像以往一样去海边。大海就像天空一样，无边无际。和我们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和她的丈夫，不过，她觉得大海很脏——“我们害怕会染上霍乱”。她说得没错，当时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这样的新闻。但是不管怎样，我记忆中的情景和她看到的不同，我脑海中的画面更加明亮，色彩也更鲜艳。我记得大海广阔无边，就像天空。海水湛蓝，而他就在我身边。

我是为爱而生。在学校里，所有的女孩都梦想有一天能上大学，或是加入共青团工作，但是我的梦想却是结婚嫁人。我想爱一次，轰轰烈烈地爱一次，就像娜塔莎·罗斯托夫。只要有爱就行。可是，我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因为在当时，你只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加入苏联共青团建设队。他们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前往西伯利亚，去那就连阳光都无法穿透的针叶林区工作。还记得他们当时唱的一首歌吗：“穿越针叶林区的大雾和气息。”毕业后的第一年，我没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我的分数没上达到大学分数线。于是，我就进了通信站工作。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他。是我向他提出的求婚，我问他：“娶我吧。我太爱你了！”我全身心地爱着他。他是那种长相英俊的男人。我感到我的心在空中飞翔。我对他说：“娶我吧。”（她笑了。）

有些时候，我会想起这一幕，想起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会想办法让自己低迷的情绪振作起来——譬如说，我会告诉自己，也许，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生存形式，去另一个世界继续他的生活。我在一个图书馆里工作，我看了很多书，也遇到了很多人。我想谈一谈死亡，我想了解它。我正在寻找慰藉。只要与死亡有关的事情就能引起我的兴趣——我看报纸、看书，我甚至还会去看电影和戏剧。失去他，痛苦的不仅仅是我的内心，还有我的身体——我不能一个人生活。

他不想去看病：“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这一点都不疼。”但是，他淋巴结上的结节却越来越大，已经宛若鸡蛋大小。我把他硬推进车里，然后开车去诊所。他们向他推荐了一位肿瘤医生。一位大夫看了看他，然后就给另一名大夫打电话：“我们这儿又来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从那之后，他们就不让他离开了。一个星期后，他们给他动了手术：他们摘除了他的甲状腺和喉，然后在那些地方装了一些人工

插管。是的……（她开始沉默。）是的——现在，我终于明白，其实那段时间我也很快乐。上帝啊！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件差事——跑到商店里给医生们买礼物。我买了很多盒巧克力，还有进口的利口酒。我还给护士们也买了巧克力。他们收下了礼物，而他却在一旁嘲笑我："懂了吧？他们不是神。他们已经给我做了化疗和放疗。不管你怎么做，他们在做这些治疗的时候都不会给我糖吃。"但是，我还是跑到位于城市另一边的商店，只为买一些蛋奶酥或法国香水。在那个年代，虽然它们就摆在柜台里，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人，根本就别想买到它们。在他们送他回家之前，一切都很好。

他们把他送回了家！他们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针管，并且告诉我该如何使用它。我需要用这根针管来喂他吃东西。我很快就学会了所有的东西。我会准备好新鲜的食材——他吃的东西必须要新鲜——每天烹饪四次，然后把做好的食物用绞肉机碾碎，倒进一根小针管里，然后再塞进这根针管里。我把针扎进他身上最粗的一根管子里，这样，针管里的那些食物就能被送进他的胃里。可是，他也因此而丧失了品尝和体验这些食物的滋味和香气的机会。我问他："味道怎么样？"然而他却答不上来。

在那之后，我们还一起去看过几次电影。我们在电影院里接吻了。我们的头上悬着一颗不知何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但是我们俩都觉得我们又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会刻意地回避与切尔诺贝利有关的话题，尽量不去谈论它，也不去想它。这成为了我们家的禁忌话题。我不会让他接电话。每次来电话，我都会抢着接电话，他身边的伙伴正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他。在我们家，切尔诺贝利成了一个禁忌。一天早上，我叫他起床，可是，当我把衣服拿给他的时候，我发现他起不来了，而且他也不能说话了。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开口说话。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只有当他受惊，感到极度害怕的时候，他才会这样。是的，他害怕时……（她再度陷入了沉默。）

在那之后，我们在一起又度过了一年的时光。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走向死亡。他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差，但是他并不知道曾经和他一起工作的伙伴有的已经死亡，有的也和他一样，正在等死。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带着那样的想法生活。事实上，这实在太难了，我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你不知道在前方等着你得到底是什么。他们说的和写的都是"切尔诺贝利"。可是，没有人了解它。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副可怕的场景，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出生和死亡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了。如果你问我，去过切尔诺贝利的人回来后是怎么死的，我不会回答你，因为我爱他，我爱他胜过一切，我对他的爱也

超越了一切，甚至超越了我自己的孩子，哪怕他——在我面前——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怪兽，我对他的爱也不会少一丝一毫。他们摘除了他的淋巴结，因为失去了它们，他的体内循环被打乱，他的身体也随之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改变的是他的鼻子——它变得有以前的三倍大；接着就是他的眼睛——他的两个眼球的位置发生了位移，而且还是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现在，他的眼神已经变得和以前不同，我从他的双眼中看到了一些以前从没看到过的东西，那感觉就好像他已经不再是他，而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人正借助他的眼睛向外望。没过多久，他的一只眼睛就彻底闭上了。

我害怕什么？只有他明白我，只有他才能看到我的恐惧。可是，他开始向我提要求，譬如说——把镜子递给我。提要求的同时，他还会用手做手势召唤我。我二话不说，立刻躲进了厨房，就好像我忘了他的要求，就好像我根本就没听到他说的话，也没看到他的手势一样。我用这种方法骗了他两天，可是到了第三天，他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很大的字，并且还加上了三个感叹号："把镜子拿给我！！！"当时，他的身边就放着一个本子、一支铅笔和一支钢笔，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沟通工具，因为他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他已经完全哑了。我扭头冲进厨房，开始用力地敲打那些罐子和铁锅，就好像我根本没有看到他写的那些字，或者我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又在本子上写道："把镜子拿给我！！！"同样的，他也加了三个感叹号。

无奈，我只得给了他一面镜子，家里最小的一面镜子。他盯着镜子，然后就死死地抱着头，在床上滚来滚去。我开始哀求他"只要你的状况稍有起色，我们就一起去农村生活，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子。假如你不愿意在人多的大城市里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可以去那里买一栋房子，去那儿生活。就我们俩。"我并非信口雌黄，我愿意和他一起去任何地方，只要有他在我身边，什么地方都行。他才是最重要。我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哄他。

凡是我不愿谈及的事情，我全都忘了。可是，那些事情发生了。我看得很远，也许甚至超越了死亡。（她停了下来。）

遇到他的时候，我才16岁，他比我大7岁。我们交往了两年。我很喜欢位于明斯克沃洛达科沃大街上的那所邮局，也喜欢它周围的环境。我们经常在那所邮局的大钟下碰面。我住在最糟糕的工业综合区，每次约会，我都会坐5路车。这趟车在邮局那儿没有站，它会一直开到邮局前面的儿童服装店门口才停下来。每次约会，我都会稍稍

晚到一小会儿，这样，当汽车经过邮局的时候，我就能看到正在邮局门口等我的他，这时，我就会想，等我的那个小伙子真帅！在那两年里，我几乎彻底忽视了周围的一切，我不知道冬天是何时降临的，也不知道夏天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他带我去听演唱会，我最喜欢的伊迪丝·皮耶哈德演唱会。我们没有上去跳舞，因为他不会跳。我们接吻，我们在那儿接吻了。他叫我“小不点”。我的生日，我知道这很奇怪，但是我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在那之后，我也曾经尝试着不去相信命运。那天，我在大钟下等他，我们约好了5点见面，可是时间到了，他还没有出现。我一直等到6点，可是他还没有出现，我变得很沮丧，我含着眼泪，慢慢地向马路对面的车站走去，这时，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四周，因为我好像感觉到了一点什么——我看到他正在我身后追我，逆着灯光，身上穿着工作服，还有那双大靴子。我最喜欢看他穿这身衣服，工作服——那是一件水手衫——他看起来帅极了。我们去了他家，他换了衣服，随后，我们决定去餐馆吃饭为我庆祝生日。可是，餐馆不让我们进，当时已经是晚上，被拒的我们站在餐馆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好吧，”他说，他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我们去买瓶香槟和蛋糕，然后去公园，在那里为你庆祝生日。”在星空之下，在幕布一般的蓝天下！这就是他！我们在高尔基公园的一条长凳上一直坐到了天亮。那是我第一次这样过生日，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对他说：“娶我吧。我爱你！”他听了，哈哈大笑：“可是，你还这么小然而，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婚姻登记处。

当时的我简直太高兴了！如果有机会再选择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种生活，即使有人——来自天堂的某人——事先警告我……就在我们结婚的那天，他的护照不见了。我们把他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们在登记簿上记下了我们的姓名——临时的。“女儿，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我妈妈哭着对我说。后来，我们在阁楼的一条旧裤子里找到了他的护照。爱！这不仅仅是爱，而是一段漫长的相爱历程。过去，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翩翩起舞——那时的我年轻、漂亮，而且他爱我！现在，我已经彻底淡忘了那张脸——我曾经拥有的过那张脸——当时，我和他在一起。我从镜子里再也看不到那张脸了。

这就是我能够谈论的事情？我能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吗？有一些秘密——时至今日，我仍然不了解它们。即使是在他弥留之际的最后一个月里，他每天晚上还是会叫我的名字。他感到很绝望。当时的他爱我远胜于之前。白天，我会望着他，无法相信夜里发生的一切。

我们不想分开。我轻轻地抚摸他，亲他。就在那几分钟里，我会想起了我们之间最快乐的那段时光，以及当时的情景，譬如说，他蓄着一脸络腮胡子从堪察加半岛上回来时，我第一眼见到他时的情形——在那里，他蓄了胡子；还有我们一起在公园长凳上度过的那个生日。“娶我吧。”我需要说这些吗？我能说吗？我迫不及待地扑向他的怀抱，就像一个对女人穷追不舍的男人。除了药，我还能给他什么？我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他不想死。

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从没和妈妈说过任何事情。她不会明白我的。她只会批判我、诅咒我。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癌症，而是切尔诺贝利癌症，后者比前者更可怕、更糟糕，而且它还令所有人都感到恐惧。医生对我说：如果他体内的癌细胞转移，他很快就会死，不过，假如它们没有转移，那么，它们就会慢慢地沿着他的身体向上走，一直走到脸部。他的身上开始出现一些黑色的斑块。他的下巴开始挪位，脖子消失了，舌头从嘴里垂了下来。他的血管开始破裂，鲜血从他脸上的各个部位——脖子、脸颊、耳朵——顺着皮肤流了下来，到处都是。我端来了冷水，把湿毛巾贴在他出血的部位，可是，什么方法都不管用。那真是可怕的一幕，整个枕头上都是血，鲜红的血。我从浴室找了一个脸盆，放在他的床头，鲜血一滴一滴地从枕头上滴下来，落在盆子里，就像挤奶女工挤进桶里的牛奶。那个声音，滴答滴答，听起来十分平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田园风光。即便是现在，一到晚上，我仍然能够听到这种声音。在他昏迷之前，只要他开始拍手，我就能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叫救护车——这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暗号。他不想死。他才45岁。我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没有人愿意来：“我们帮不了你的丈夫。”给他打一针就行了！给他注射一些镇静剂。我已经学会了注射镇静剂，可是每次注射都会在他皮肤上留下一块淤青，那块淤青会一直留在他的皮肤上，不会消失。

有一次，我终于叫来了一辆救护车，和救护车同来的是一名年轻的医生。他走到他床边，但立刻就快步退到了一旁：“请原谅我，他去过切尔诺贝利，对吗？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对不对？”我回答说：“是的。”然后，他——我丝毫没有夸张——他立刻就大叫道：“哦，亲爱的女士，那就快点让这一切都结束吧！赶快结束吧！我看过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死亡时的惨状。”与此同时，我的丈夫就躺在一旁，他的意识很清醒，他还活着。不过，至少他还不知道，他也没有想到，他是他所在的工作队里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

还有一次，同行的一位护士来自于附近的一所诊所。她就站在门

口，甚至都没有进门：“哦，我做不到！”她说。那我就能做到吗？我能，我能够做任何事情。我可以怎样想？我怎样才能救他？他在呻吟，他很痛苦，他呻吟了整整一天。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帮助他缓解痛苦的方法：我将伏特加倒入针管，然后输入到他的身体里。酒精能够麻痹他，让他暂时忘却疼痛。我自己根本就不去想这些事情，其他一些女人告诉我，她们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过去，他的母亲还经常来看我们：“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切尔诺贝利？你怎么能那样做？”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够阻止他，至于他自己，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拒绝这一工作要求。那时和现在不同，那时一个军事化的年代。我曾经问过他一次：“你有没有为自己接受这一工作，去那里干活而感到悲伤？”他摇了摇头，回答说：“没有。”他在他的记事簿上写道：“我死以后，卖掉汽车和多余的轮胎。还有，不要嫁给托里克。”托里克是他的弟弟。他喜欢我。

还有一些事情——我就坐在他身边，他睡着了，他有一头很漂亮的头发。我拿起剪刀，轻轻地从他头上剪下了一小撮头发。他睁开眼睛，望着我，他看到了我手里拿着一撮他的头发。他笑了。现在，我还保留着他的手表、他的军人证，还有他在切尔诺贝利获得的勋章。（她陷入了沉默。）我当时是那么高兴！我记得，我在产房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我就坐在窗户边，一直望着窗外，等待他的出现。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看不够他的脸。我想这样的状况总会结束。早晨，我给他带了一些吃的，然后就坐在旁边看他吃东西，同时思考这个问题。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看着他刮胡子，看着他走出家门，走上街道。我是一名不错的图书馆管理员，可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会爱上自己的工作呢？我爱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我只爱他！我不能没有他。晚上，我会大叫，我会把头埋进枕头里，这样我的孩子就不会听到我的叫声。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家，更没有想到我们最终会分别。我的妈妈，还有他的弟弟，他们开始对我说或暗示我，说医生们建议——你知道的——长话短说吧，在明斯克附近有一个地方，那里住的都是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他们可以在那里等死——过去，送到那里的都是从阿富汗战场上回来的士兵，没有胳膊或双腿的士兵——现在，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都被送到了那儿。他们哀求我：“把他送到那儿去吧，那儿的条件更好，而且还有医生照顾。”我不想把他送走，我甚至都不愿听到类似的话语。然而，他们说服了他，他开始要求我把他送走：“带我去那儿。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与此同时，我不断地向单位请病假或事假，一切都由我自己承

担，因为只有当你需要照顾生病的孩子时，你才能请病假，而事假最长又不能超过一个月。但是，他不断地在本子上写要我送他去那儿的话，他恳请我，哀求我，命令我。最后，我和他弟弟一起开车去了那里。那个地方在一个小村庄的边界处，是一栋很大的木房子，房子旁边有一口已经破了的水井。那个地方名叫葛瑞本卡。厕所在房子外面。我看到了一些身着黑色服装的女士——修女。我甚至都没有下车，连门都没有开。那天晚上，我亲吻了他："你怎么能让我这样做呢？我永远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绝不！"我亲遍了他的全身。

他的最后几个星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同时也是最恐怖的几个星期。我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帮助他解完小便。其间，他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睁开，他为此感到羞愧。"噢，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对他说。我亲吻他。在最后一天，在那一刻，他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微笑着对我说："瓦柳什卡！"他叫的是我的名字。他走了，一个人走了，和所有人一样，孤单地离开了我们。他们单位给我打电话："我们会把他的成就荣誉证书带给你。"我对他说："你的同事要来，他们要来给你送荣誉证书。"他摇了摇头："不。"可是，他们还是来了。那些人想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但是他却用毯子蒙住了脸，只有头发留在外面。他们在他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他已经开始害怕见人。我是唯一一个不会令他感到害怕的人。当我们安葬他的时候，我在他的脸上盖了两条手绢。如果有人要我拿开，我会把它们拿走。有一个女人晕倒了。她曾经和他相爱过，而我还曾经因此嫉妒过他。"让我再看他一眼。""好的。"我没有告诉她，他死后，根本没有人愿意靠近他。大家都怕他。根据我们的习俗，为逝者清洗身体和穿衣服的人不能是他的亲人。两名来自太平间的勤杂工问我要伏特加。"我们什么都见过，"他们对我说，"那些被碾碎或斩断的尸体，还有从火场中抢救出来的儿童尸体。可是，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尸体。切尔诺贝利人死后的样子最恐怖。"（她变得很安静。）他死了，躺在那儿，他的身体烫得你都不能碰他。我把家里钟的时间停在了他离开的时间。早晨7点。

他离开我后，在最初几天里，我在床上睡了两天，没有人能够叫醒我。中途，我会醒来，喝一点水，不吃任何东西，然后倒头继续睡。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这一表现很奇怪，就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呢？当我朋友的丈夫快死的时候，他向她扔盘子：为什么她这么年轻漂亮？可是，我的丈夫在临死前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他在本子上

写下：“我死以后，把我的东西都烧掉。我不想要别人像怕我一样怕你。”外面有一些传言，说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即使死后也仍然带有辐射。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死在莫斯科医院里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死后下葬的梅迪诺墓地被测出带有放射性——那座墓地就在莫斯科附近。人们从那儿经过时都绕着走，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把自己的亲人埋葬在那儿。就连死人都害怕他们，哪怕他们已经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切尔诺贝利到底是什么。人们有的只是一些猜测和感觉。回来时，他带回了他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时穿的白色制服。那些裤子，那些特殊的防护服。那套衣服一直被放在我们的储藏室里，直到他去世。没过多久，我的妈妈决定：“我们需要把他的东西统统扔掉。”她害怕了。可是，我想留着它们，哪怕是那套有辐射的制服。然而，这样做无异于犯罪——我还有孩子，他们就住在家里。最后，我们带着他的所有东西出了城，然后把他的东西埋在了城外。我看过很多书，我生活在阅读之中，可是没有一本书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带来了他的骨灰。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用手去感受他，我摸到了一些很小的颗粒，它们摸起来就像是沙滩上的贝壳，这些都是他的臀骨。在那之前，我摸过一些属于他的东西，但是从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或抚摸过他，但是在这里我听到了，也摸到了。我记得他去世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坐在他身边——突然，我看到了一小团烟雾从他身上升腾而起——在火葬场，我又一次见到了它——那是他的灵魂。除了我，谁也没有看见这一幕。我觉得我们又见了一面。

啊，那时的我真的很高兴！那一次，他刚刚出差回来。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计算日子和时间，直到他回家。从生理上来说，我不能没有他。我们曾经一起去乡下看他姐姐。晚上，她对我们说，“我把你的被褥放在这个房间里，而你的在那个房间。”听了她的话，我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根本想象不出我们俩睡在两个房间里的情景。我不能没有他。我们私奔了。他的弟弟也和我们一起跑了。他们很像。可是，如果现在有人碰我，我一定会哭。

谁从我身边抢走了他？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1986年10月19日，他们拿着一张上面印着红色标语的通知来到我们家，带走了他，就像他们要带他去上战场一样。

（我们在一起喝茶，她给我们看了家庭照片，还有他们的结婚照。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她拦住了我。）

现在，我一个人该怎么活下去？我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我还没有说完。那时的我很幸福，幸福得不可思议。也许，你不应该把我的名字写下来？还有很多秘密——人们会在祈祷时讲述自己的秘密，他们会用很小的声音把它们说出来，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到。（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不，把我的名字写下来，让上帝知道这一切。我想弄明白。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饱受这种折磨？让我们受折磨是为了什么？一开始，我以为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黑色的不属于我的东西。是什么拯救了我？是什么把我重新拉回到生活之中？是我的儿子。我还有一个儿子，我们的儿子，他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他已经长大了，但是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孩子阶段，他依然还是从一个孩子——五岁大的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要和他在一起。我想用我的公寓换一套诺威金附近的公寓，因为精神病医院就在那附近，而他就在那间医院里。医生向我下达了命令：如果你想让他活下去，就必须让他住在这里。每个周末，我都会去那里看他。他会跑上来和我问好：“米萨爸爸呢？他会来吗？”除了他，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谁会这样问我？他在等他。

我们一起等他回来。我会小声地念诵我的切尔诺贝利祈祷词。你看，他正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瓦伦蒂娜·蒂莫夫耶夫娜·帕纳谢维奇
清理人之妻

结束语

过去，我经常四处游历，辗转于那些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之间，但是在这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见证人。我的生活已经成了这一事件的一部分。我住在这里，和所有的一切在一起。

我们这片土地上引爆了350颗原子弹。人们已经开始过一种核战争之后的生活——尽管他们谁也没有留意到这场战争是从何时开始的。

现在，这片土地已经成了来自其他战场上的人民的避难所。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难民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伯卡茨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车臣逃了出来，他们逃离了枪林弹雨，来到这片已经荒废的土地上，住在那些已经废弃但没有被特种部队毁坏和埋葬的房子里。现在，生活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当中的俄罗斯人数已经达到了2500万——相当于整整一个国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除了切尔诺贝利，他们无处可去。在他们听来，那些关于当地的土地、水和空气能够杀人的传说和传言就像童话故事一样神奇而美妙。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他们相信这些故事——故事的内容就是人们如何用枪杀死另一个人。

过去，我常常认为自己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并且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清楚地表达出来，或者说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说出来。我记得，当我在撰写《锌男孩》的时候——那是一本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书——我去了阿富汗，他们给我看了一些他们从阿富汗战士手中缴获的外国武器。看到那些武器，它们那精致的外形令我大吃一惊，而更让我惊讶的是人类的思想竟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当时，有一位军官就站在我身边，他说："如果有人踩中了这颗你认为漂亮得就像圣诞装饰品一样的意大利地雷，眨眼间，他就会变成一堆肉泥。你只能用勺子把他的遗体从地上一勺一勺地舀起来。"当我坐下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我是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想：你能够走得很远很远，所以我就把那堆肉泥写进了书里。然而，隔离区——那时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个彻底脱离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世界——它所拥有的能量和意义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文字乃至文学。

三年来，我开车到处走，寻找那些人，和他们聊天：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科学家、医生、士兵、飞行员、矿工、难民、定居者。他们的命运、职业和人格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可是他们回答的都是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我常常想，相对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海中的那些模糊的情感、传言和印象其实更接近事实真相。为什么要重复那些事实——正是它们掩盖了我们的情感。令我着迷，念念不忘的也恰恰正是这些情感的演变历程，以及从人们在谈及这些情感时无意中表露出来的某些事实。我尝试着去寻找这些情感，然后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保护。

这些人目睹了某些事情的发生，然而至今为止，其他人却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有一种感觉，我正在记录未来。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